

我祖母之死

刘文彩孙子的讲述

讲述人：刘小飞

1946年生



这么多年来，我心里实在是堵得慌，憋得难受，我好想把我所知道的真相全部写出来。

我爷爷结过五次婚，大老婆吕氏没几年就病故了，估计是死于肺结核病，当时肺结核病在中国是很常见的病。吕氏生了一男一女，也夭折了，可能是吕氏在哺乳期间把肺病传给了他们。我听家里人讲，爷爷年轻时身体非常强壮，个子也高大，他后来死于肺病，估计也同吕氏有关。

吕氏去世几年后，爷爷又娶了大邑县三岔乡的一个姑娘，她比他小17岁。这个姑娘便是我祖母杨仲华。

我祖母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在持家、发家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办事也风风火火。我爷爷敬重她，生活中让她三分，甚至七分。两人在一起生活也算和谐，因为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家业搞好。

爷爷最小的弟弟刘文辉在宜宾发迹后，需要一个人给他管经济、税收。1922年爷爷便去了宜宾，随后又把祖母接去了。

1929年，爷爷在宜宾遇到了一个叫凌君如的女人，是个风情女子。爷爷决定把她娶作三房太太。祖母为此同爷爷吵了一架，然后到成都文庙后街52号公馆里独居，后来十多年两人很少见面。

爷爷随后还娶了凌君如的表妹梁惠灵，即四太太，在她俩离去后又娶了一个比他小25岁的贫苦人家的姑娘王玉清。

爷爷虽然有好几房太太，但他的七个子女（四男三女）全部是我祖母杨仲华所生。所以，祖母在刘家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爷爷去世后，祖母便成了一家之主。我是祖母二儿子刘元华唯一的儿子，从小家里便十分宠爱我，其他孩子都请保姆带，但我例外。在孙辈中，我是唯一由祖母、妈妈、姑姑亲自带大的孩子，

也是最小的一个孙儿。爷爷在世时有三个孙儿三个孙女，他去世后他的后人就再没生出孙儿了。

正是由于我成天在她们身边，所以看到、听到了不少事。

爷爷是1949年10月去世的，那时正是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祖母不懂政治，为了避战乱，她准备变卖财产带着子孙到海外去。她把此事告诉刘文辉，刘文辉劝她不要走，准备一起去投共产党，并要她装得象没事一样，不要让蒋介石方面看出异样，到时他会通知她撤离。我爷爷同刘文辉关系最好，祖母也是，她当然听从刘文辉的劝告和安排，刘文辉一句话就让她留了下来。

刘文辉在弃蒋投共的当天派人来通知祖母撤离。祖母当即跑到打金街姜亲家的家里躲藏。第二天蒋介石的部队就查抄了刘氏家族在成都的所有公馆，并四处追捕刘氏家族成员。祖母吓坏了，第二天天未亮，她就带着儿媳仓惶出逃。她们在田间小路上走了120里，深夜才到达娘家大邑三岔乡——当时那里是很僻静的地方。祖母是半小脚，一路上的狼狈可想而知。

四川解放后，祖母回到成都。但是，我们的房子已经被解放军占了，守门的士兵不准我们进去。四川刚解放时，被没收的只有国民党的党产、政产，其他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的财产都没动，没收他们的财产是土改之后的事。但是对我们，当时就下手了。我们只得回到安仁镇的庄园去。



刘文彩庄园正门

紧接着土改。当时，所有地主都要被押回原籍去退押（金），接受农民批斗。可是，唯独不要我们刘家的人回去。为什么？因为我爷爷是家乡公认的刘善人，在家乡做了很多好事，家乡的老百姓，包括很多穷人，任何人向我爷爷求助，没有哪个是空手而归。即使是在文革高压时期，当地老百姓也说，刘文彩在时我们都有饭吃，都是吃饱了的。所以，把我们弄回家乡去斗有很大的阻力。土改期间，我们一家是在成都城里挨的整。

策划整我们的人，就是我爷爷当年救助和保护过的中共地下党人周鼎文。

家里人不让我看到土改那一幕血腥，但是，我还是看到一些。

祖母被抓走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几个背着枪的民兵打上门来，他们把我爸爸和我小姑姑从床上抓起来，押走了。后来得知，是抓他们去看我祖母受刑！

祖母半夜里还被反吊在梁上，痛苦万分，那群人很得意，专门把她的子女叫来观看。他们在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们是否流露出不满、悲痛。如果他们敢，下场就是同他们的母亲一样。我爸爸和姑姑竭力控制，不敢露出悲伤。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我一定控制不住，一定受不了！我难以想象，要折磨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的子女抓到现场观看，我不知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在大邑县捆绑吊打时，也喜欢这样搞。后来他们在“刘文彩庄园”搞阶级斗争展览时，还专门布置了一间刑室，说是当年刘文彩折磨贫下中农的地方。其实，本地的贫下中农都说，刘文彩从来不打人。那间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运用在了我们刘家人的身上。

父母们不要我看，他们把我藏起来，但我还是看到一些，因为这种事不是偶尔发生。比如，我亲眼见到了祖母回来时的模样——脸色惨白，披头散发，头垂得很低，走路十分吃力。我祖母是个有身份、十分爱整洁的人，我第一次看见她那种模样。祖母如何受刑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如果不是受到非人的折磨，她决不会是那种样子！

我还记得，在土改快结束时，我小姑姑的保姆专门从乡下来，当时我在场，看见她几乎要给小姑姑跪下了。她说：“对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组逼我说的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她说了什么我不晓得，我只记得小姑姑脸上



刘文彩庄园一角

没有任何表情，她走后小姑姑也一动不动。保姆看见我们住的房子，当场就哭了：“唉呀，三小姐，你们咋住在这么破烂的地方？”

她是一边哭一边走的，如果她对我们没得感情，她不会从大邑步行到成都来给我小姑姑赔礼道歉。我想，是政治压力强加在她良心上，逼得她没办法。

土改把我们家收缴得一无所有，祖母最后一枚藏在她发髻里的金箍子（即金戒指）也被收走了。

大概是在土改刚结束时，祖母又被抓去吊打。当时我已经在重庆——家里人不要我看到那一幕，把我送到重庆刘文辉家里。那时土改已经结束了，其他地主都没有再斗打，为什么突然又整我们呢？

刘文辉在重庆时，刘伯承、邓小平对他说，只要你把金银珠宝和所有钱财交出来就没事了。刘文辉就将财产全部交了出来。刘伯承、邓小平后来返还了一些金条给刘文辉作为奖励。就是这些金条，给刘家的人带来了灾难！

四川省当局在得知刘文辉手中有这些金条后，不好直接找他索要，就在成都把刘文辉的亲人（哥哥、嫂嫂、侄儿侄女们）抓起来逼要“罚款”。他们动用酷刑，逼迫受刑的刘家的人给刘文辉写信，要他交出那些金条来作为赎金。信就是在吊打现场逼着写的。

刘文辉懂得起，把那笔钱交了出来，这下他的亲人们才得以解脱。

土改后，我们是一无所有了，刘文辉的财产也没有了，他住的是公房，每月靠共产党发给他的400元钱生活，一直到他死都是这样。一个家财万贯的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转眼就被土改整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

我们全靠刘文辉每月寄生活费来，一家人才活出来。

但是，祖母没能活出来。土改结束后不久她就死了。家里人不想谈她的死因，后来妈妈告诉我，祖母在土改期间被打成内伤，这要了她的命。

我祖母是个很有志气很有尊严的女人，当受到侮辱时，她不愿低声下气。不低头就要付出代价，祖母付出的代价就是她的生命。她死时还不到50岁。

采访时间：2008年7月19-20日

地点：重庆市渝北区

采访后记

第二次到地震灾区采访时，同行的朋友刘绍坤告诉我，他同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联系上了，对方很愿意接受采访。

刘文彩的孙子？我有些惊喜；

他还敢谈？我有些不信。

刘文彩的大名从小如雷贯耳，没想到有一天会见到他的孙子。

我所采访的地主后代大多仍生活在惊恐中，刘文彩的后代还敢畅所欲言？

结果，他不仅敢谈，而且还敢专门进入庄园去公开给参观者讲解！

他说，刘家的后人大多吓怕了，包括他还健在的父亲刘元华。“他们连家乡都不敢回。我不，我要谈！我要把真相告诉世人，这些年来，我憋得好难受！”

在安仁镇采访时，他好几次悲愤难抑，泣不成声。

我们约好，待我写完地震采访稿后就同刘绍坤去他的住地（四川隆昌）作进一步的采访。

回到重庆后，他好几次打来电话，催我早点去。

正当这时，同我一起采访刘小飞和地震灾区的朋友刘绍坤被中共公安抓捕了，罪名是“煽动（地震死亡）学生家长上访”。

“煽动”一事同我也有关联，我算是“同案犯”。还有，抄他家时肯定也抄出了我的一些“材料”，加上我已有被抓捕的“前科”，因此，心中惶惶不安。

我不敢住在家里，跑出去东躲西藏了好些天。

.....

后来，刘小飞亲自来到重庆，我们在重庆渝北区一个隐蔽的地点见了面，在一起又谈了两天。

以上这篇采访录，是他讲述的一小部分（其他部分收集在笔者“惊天动地《收租院》”一书中）。

刘小飞说，刘氏家族是一部厚重历史，他所讲的这一点远远不够。

说来也是。想当年，共产党为“塑造”刘文彩是前后花了几十年时间，并动用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国家资源。

不过，眼下只能如此了。这一小点文字，还是东躲西藏，在几个不同的地点完成的。

最后，我要向仍在狱中、前途未卜的朋友刘绍坤表示深深的关切和敬意。

是他的介绍，有了这一系列采访。

是他的正义和良心，让他身陷囹圄。

（记于2008年7月25日刘绍坤被抓捕一个月之时）



刘小飞一辈子单身，他说，那些年政治压力太大，他青春时代正是阶级斗争狂热时期，他于是选择了独身。音乐是他的“情人”，也是他的“终身伴侣”。

2008年6月，他在他爷爷64年前修建的大礼堂里弹奏钢琴。该礼堂与学校里当年修建的所有校舍房一样，在大地震中完好无损。

我为啥终身独身

讲述人，刘小飞

在人间，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哪个不想要爱情？哪个不想要婚姻？哪个不想要家庭？我又不是残疾，又不是五官不正。但是，我不敢！

我妈妈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郭阿姨，她有一个女儿叫李婉英，长得非常漂亮，小时很像美国那个小明星邓波儿。她比我小六七岁。她们也是成都人，暑假时，郭阿姨就把李婉英送到我家来，让我带着她。

那个年代，刘文彩已经被当局塑造成一个人间恶魔，刘家的人被整死不少。所以，郭阿姨很为我和我家担心，不知我们会遭到什么迫害。那时，到处都能看到这种迫害。一般的地主和地主家庭，都往死里整，何况像我们这种被宣传得如此可恶的地主。

记得是在1979年，李婉英给她家里提出，要嫁给我。她为什么要嫁给像我这种人？有几个原因：一是我以前带过她，从小青梅竹马；二是我长得还不错；三是我们两家关系很好，我母亲与她母亲像姐妹一般。



小时的李婉英

可是在那个年代，我连起码的人身安全感都没有，我怎么敢走出这一步？对我来说，社会上所有的门都关闭了，我能活到什么时候都不知道，我还敢去奢望爱情，奢望一个家庭？我敢吗？！

我对她说，我不敢结婚建立家庭，我说我没有起码的安全感，我能活到哪一天都不知道。

你知道湖南道县大屠杀、北京大兴县大屠杀吧？大杀地主和地主家属！我们当时要是在那个地方，我会是首先被拖出来杀的人，我们全家会被斩尽杀绝！这种事情在中国发生了多少？有多少没被揭露出来？现在很多人对这种事无所谓，漠不关心，但我们不一样，几十年来，刀口一直是对着我们的。当局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来妖魔化刘文彩，来迫害刘家，这些年我们怎么活过来的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



年青时的刘小飞

我那时没得安全感，我到现在都没得安全感！

可能很多人不清楚，由于我坚持要揭露《收租院》的真相，恢复我们刘家的清白，有人便对我下手——诱使我前去安仁镇，给我下了毒。我如果不是逃得快（凌晨出逃），后果不堪设想。

（注：2014年8月，有几个人打着调查刘文彩庄园真相的幌子，将刘小飞诱骗到大邑县安仁镇，以他失眠为由，给他了一种“特效安眠药”，刘小飞服此药后，头痛欲裂，嗓音哑涩，通宵失眠。）

所以，现在我都是这种感觉：每一步都充满危险！

我为啥终身独身，我刘小飞又不是残疾，又不是五官不正。可是，我不敢！爱情婚姻家庭，我再想要都不敢要。

本来，我同婉英从小青梅竹马，有兄妹感情，她母亲同我母亲也亲如姐妹。这种亲上加亲，再好不过了。但我多年一直胆战心惊……

当时，我对她说了这个情况，我说，我不敢结婚。没想到她坚决得很，她说：“我非小飞哥不嫁！”

我拒绝她以后，就不敢再到她家去了。没想到她真是“非小飞哥不嫁”。这事对她打击很大，她一直不嫁人，大约七八年后，她在抑郁中去世了。

她妈妈最痛爱的就是这个女儿，婉英的离去，给她打击很大，造成她未老就痴呆了。

李婉英真的是一个美人儿，我记得她暑假到我们家来，在食堂排队打饭时，人人都要看她，逗她。

是我害了她，还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害了她？



在抑郁中去世的李婉英

采访时间：2014年11月22日

地点：重庆市渝北区

采访后记

为采写《收租院》（中共当局塑造的反映大地主刘文彩罪恶的泥塑）的真相，我七次前往大邑县安仁镇。在那儿我结识了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我们相交七年，交谈多次，他极少谈到他的个人生活。

2014年8月，刘小飞被一伙来历不明的人下了毒之后，主动在电话上对我谈起了他的“爱情故事”，并传来了李婉英的两张照片。

我表示希望面谈。

几个月后，他来到重庆，我录下了他的讲述。

他最后的话是：“我后来也有走进婚姻的机会，但我都放弃了，除了我没有安全感以外，走不出李婉英的影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永远记得她三岁时第一次走进我们家时的情景……”



当年中共当局动用国家机器，铺天盖地宣传地主刘文彩残酷剥削农民。
（关于其真相可参见笔者的调查采访录“惊天动地《收租院》”一书）

刘家几个后代的遭遇

一，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被官方从原籍发配他乡，他被迫远逃到四千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立大队落户。刘世伟为人友善，从不与他人结怨。由于《收租院》的宣传，说刘文彩迫害农民，那里农民便把刘世伟全家杀了。他的老婆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被斧头劈死，刘世伟则被用绳索勒死。

二，刘文彩的小儿子刘元贵被成都铁路局弄去劳改，死在外地。

三，刘文辉住在成都的夫人李助干也未能幸免。1965年，四川当局把年逾六旬的李助干强行押解到农村监督劳动，据说还把她弄去游街批斗。刘文辉的长女刘元愷去找四川省委统战部，但没人理睬，直到刘文辉找了中央统战部后才把她放回来。身心受到伤害的李助干于数月后郁郁死去。

四，刘文辉的长女婿，起义将领伍培英在1966年被逼自杀。

五，起义将领刘元璋的四妹刘元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当晚9岁的小女失踪，至今音讯全无。

六，抗日将领刘湘的侄子刘世海自学英语，当局怕他向外国来宾用外语揭露刘文彩的真相，便把他抓到高山劳教所关押，邓小平上台后才放出来，但刘世海已被逼疯。一天夜里，一辆公安的车把他拉走，至今下落不明。（刘小飞提供）



中共塑造的地主刘文彩残酷剥削农民的大型泥塑《收租院》

一个被打残的 地主孙儿

讲述人：陈德章
1949年生



1943年，刘文彩修建中学时需要土地，为此，他以三倍的土地（大约40多亩）换取了小地主陈绍凤位于现在安仁中学的10多亩地。1949年共产党来后，陈绍凤理所当然地被划成地主。如今，陈家所有的人都已死去，只剩下一个1949年出生的孙子陈德章。

1955年，尚未满6岁的陈德章被打成终身残疾。

土改时我还很小，只记得当时打锣，叫大人去开会，就是斗争会。后来听说，会上他们逼爷爷奶奶交金银，有人说他们把银元埋在河坝的某个地方了。爷爷奶交不出，他们就用大粪从他们嘴里灌进去。

不过，他们当时没被整死，爷爷死于1958年，那些年他伤心得很，得了肺病，没得钱医，1958吃的也开始困难了。我记得他吐泡泡痰，一吐一大盆。他死的时候52岁。

奶奶是1959年饿死的，她的死我记得最清楚。当时我们吃人民公社集体伙食，越吃越没得吃的，到后来吃糠。奶奶死那天她煮了一锅胡萝卜缨，当时我已经残了，我一拐一拐地走过去爬上去看锅，里面全是萝卜缨，一颗米都没有，比现在猪吃的都差，也没多少，那点叶子，我一个人吃都不够。当时我不懂事，现在回想起来好凄惨！

我奶奶一口没吃就死了。（陈德章满眼含泪）

我爸爸？他1954年就被抓走了。我爸爸叫陈启贤，生我时他才19岁。他是地主子女，经常被拉去干义务劳动，又受气。爸爸脾气倔，他不服，不服有什么好处？贫下中农不收拾他收拾哪个？大概是1954年，我都懂事了，他被抓去劳改，去的新疆，从此再没回来，1969年，他死在新疆劳改队，那一年他刚刚40岁。

我记事时就记得爸爸过得很苦，爷爷挨打受苦我没见到，爸爸我记得。他们

叫他去推煤，炼钢用的焦煤。他天不亮就走，很晚很晚才回来，一天在路上就要走100多里，他说给我买东西回来，但从来都没买过，每次他晚上回来我们都睡了。后来他在新疆劳改队给我寄过10元钱，那时我脚痛，他寄钱给我医。当时10元钱要当现在的100元钱。

我妈妈在他去劳改前就同他离婚了。爸爸性子比较刚烈，他在家发牢骚，说：“地主子女就是坏人？真的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妈妈在学校教书，思想先进，她把爸爸的话汇报了，一下子矛盾激化，于是他们离了婚。

爸爸不把我给妈妈，后来妈妈再也没管过我，大饥荒那几年我孤零零一个人，饿得要死她都没管，我对她没得感情。

我是怎么残的？那是1955年，当时我还没满6岁，同一群娃儿在外面耍，想不起为什么事争闹了几句，一个大娃儿，他有十多岁了，他骂我：“你一个地主娃儿还敢翻天？！”他操起一根扁担狠狠打来，我腰杆上一阵巨痛，从此我就残废了。

（注：从那一天起，陈德章就再没有长高，他的身高永远停留在1955年6岁时。）

我们哪里敢去找对方？地主子女嘛，打残就打残了，没得办法，没得人敢为我们说话。那些年，只要说你是地主，是反革命，周围的人只有喊打的，没得哪个敢帮你撑腰。我奶奶实在想不过，去找了杨志清（音），当时他是村长，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最初我脚还不痛，后来痛得惨，走路一瘸一拐的。我上小学，要走长长一段路，痛苦得很，不想去回想。我只读了几年小学，地主子女，一律不准读初中，当时都是这样。

我最惨的就是奶奶死后那些年，孤零零一个人，身子残废，又正是三年大饥荒。我被送进孤儿院，那儿每天吃6两米——16两种的6两，不到现在10两种的4两，煮饭的再克扣一点，实际吃到嘴里的只有三两，每天一团饭几口就没有了。我出去找胡豆叶、萝卜缨吃，还到河里去抓小鱼、螃蟹烧来吃。也没得穿的，冬天打赤脚，冷得发抖，去捡了一双别人扔掉的烂袜子套在脚上，生了一脚的冻疮……当时在孤儿院的还有刘文彩一个管家的孙女，叫薛本清（音），那个管家劳改死了。

1968年，我从孤儿院出来，孤零零的一个人，什么都没有，没有家，没有吃的，



陈德章在他的白铁铺里

生产队挖洋芋（土豆）就扔给我点洋芋，挖红苕就给我点红苕。四周的人还要指指点点，说这是个地主崽子。

我咬紧牙自己挣生活，能干的我全部都干。没劳动力我就编筐、编背篼卖，不找生产队。从那时起，我一直自力更生，自己劳动养活自己。后来分了七分田，我也下田干活。现在有人说，你是残废，找政府吃低保，我不，我开个白铁铺，干手上活，每天能挣个二、三十元。

40多岁时我找了个女人，她带了个娃儿来。老婆很勤快，我也亡命干，别看我残，我能够挑七、八十斤。从此我们三口人在一起生活，算是有了个家。

采访时间：2008年6月7日

地点：大邑县安仁镇迎宾路

采访后记

在5.12地震灾区采访时，听说刘文彩当年修的中学完好无损，我便前去查看。果然，校园里除了前几年当局修的两栋房子成了危楼之外，刘文彩在1943年修的所有房屋都安然挺立。在那儿，听人说，校门对面那间白铁铺子里的残疾人，是一个地主的后代，安仁中学原来的十多亩地，就是他爷爷的。

我走进白铁铺，找到了身高只有六、七十公分的陈德章。

他一摇一摆地走着，从屋里给我们拖出椅子，然后坐下同我们交谈。

他一坐下来，只看上半身，一点没有残疾的模样。相反，他看上去五官端正，目光有神，眉宇间有一种浩然的大家之气。

可惜，那一扁担，让他的疼痛伴随了他终身，而身子，则永远停留在了6岁的高度。

辞别时，他起身一摇一摆地走到门口送我。我望着他低矮残疾的身躯，突然想到：《收租院》里那些雕像，是泥巴的塑造，而眼前白铁铺里的他，是血肉的真实。



中共塑造的地主迫害农民的泥塑《收租院》

抗日将领刘湘侄孙的 悲喜人生

讲述人：吴世跃
1949年生



一、 我的家史和父母们的遭遇

我叫吴世跃，现年61岁，住在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距刘湘老公馆几步之遥。我母亲叫刘秀容，是刘湘大弟弟刘成章的女儿。

当年，我母亲嫁给了邛崃县冉义乡的吴家。冉义乡距安仁10公里，据说母亲出嫁时，送亲的队伍有三、四里路长。

母亲嫁过去只有几年时间，就遇上了1949年的“解放”。本来，刘湘的夫人一再叫我母亲全家同她一起去台湾，但母亲放不下家里这份产业，还有，她对共产党和即将到来的“解放”是咋回事完全搞不懂。

不到一年，“解放”就来了，镇压、搞土改、追金银、评地主……

吴家是当地的一个豪门大族，有田土上千亩，建有学校、粮站。我曾祖父吴天宇（音），外号“吴叫花子”，因为他爱跟穷人打交道，每当有叫花子（乞丐）上门乞讨，他都吩咐煮饭给他们吃。最特别的是，他还要把自己的饭端到门口同叫花子们一块吃，长期如此。“吴叫花子”的名声传得很远，周围几个县都知道，就是现在到冉义场上去都打听得到。



刘湘上将（网络图片）

他的儿子，即我爷爷吴仁安，外号叫“吴欢喜”，他最喜欢去给人家调解纠纷，成天笑嘻嘻的，所以人们叫他“吴欢喜”。

我爸爸叫吴庆华，解放前是大学生，1949年时还没毕业。但是，我爷爷非要他回乡当乡长，爷爷把他的名字填上去，他还没正式去上任就“解放”了。

吴家的很多人都被抓来关起，其中有我爷爷、我爸爸、我妈妈、我么爸吴纯一等等。

爷爷、爸爸、么爸三个人是同一天被枪毙的，爸爸死得最惨。那是一个冬天，在冉义河坝开批斗大会，爸爸他们跪在地上。工作组的人事先给一个叫龚玉华（音）的人作了工作，叫他来批斗我爸爸。龚玉华来了，提了一个我们这儿叫“火提子”的烤火篼篼。批斗完后，准备枪毙人了。龚玉华把“火提子”上面的灰扒开，把里面的炭火吹得通红，然后一把将我爸爸的后领子扯开，把通红的炭火从他颈子倒下去。炭火把爸爸的后背烧得吱吱吱的，他痛得滚倒在地上。他们把他一把提起来又跪下，爸爸受不了，拼命挣扎，又翻滚在地，又被提起来，如此几次。有人看不过了，开了枪，点的心——打心脏。这样才结束了他的痛苦。

接下来打我么爸，他是打的头。枪响后，头炸开了，骨头、脑水爆得到处都是。他妻子在场，看到这一幕，把围裙解下来，将么爸的头骨、脑水包裹在一起。

政府出了点钱，叫当地一个疯子把我爸爸和么爸从河坝拖到坡上埋了。这个疯子姓郑，还活着，前几年他带我去指了埋我爸爸和么爸的那个坑坑，我才开始上坟。

土改中，吴叫花子的后人共有11个被枪杀。他们是：吴泽芝、吴志诚、吴福田、吴三素、吴世昌、吴必成、吴炳生、吴作成、吴仁安、吴庆华、吴纯一。

我七爸吴俊成的妻子吴杨氏土改时被关在乡公所，逼要金银财宝。看守她的人见七伯娘长得漂亮，就把她强奸了。七伯娘被放出来后，觉得没脸回去见人，跳井自杀了。

强奸她的人叫李清银（音），是冉义九大队六队的人。七爸吴俊成在饥荒年饿死。

我妈妈也被关押，同七伯娘关在一起。她被整整关了一年，天天逼要金银财宝。能交的都交了，还是逼，她交不出，又吊又打，受不尽的刑。她头发又脏又乱，身上长满虱子，一身臭气，象个乞丐。

一天下午，她突然回来了，对带我的保姆说，她是请假回来看娃儿的，还得再回去。当天晚上她并没有住在家里，她走了。走前她对保姆说，如果第二天早上她没回来，就请保姆把我带走，当自己的娃娃把我抚养成人。

当晚，妈妈去了一个叫金三跃（音）的家，金三跃全家都曾在我们家当过长工，工作队把金三跃提起来当了武装队长，还发了枪。妈妈当晚同他们摆了一阵龙门阵（聊天），半夜里，等他们睡沉了之后，她用背我的一根背带，吊死在金三跃的床栏上。

第二天一早金家的人发现后，赶紧把妈妈放下来，另找一根绳子，把妈妈吊到猪圈的茅厕上，然后去找村长苏吉武。“村长，村长，刘秀容吊死在我家

的猪圈里了！”

村长来后，说：“死都死了，喊人来把她埋了就是了。”

我的父母就这样走了。据我们吴家的老人，80岁的吴继成（也是地主）说，我爸爸死时25岁，么爸只有22岁，我妈妈死时具体年龄不详，但肯定也只有20几岁。

二、我被收养和被遗弃的经历

保姆听说我妈妈吊死，吓坏了。这个时候，吴家的人被枪杀的枪杀、关押的关押，长工们也早走了，她一个人，十分害怕。于是，她收拾起东西，甩下我，独自走了。

那时我还不会走路，饿得在家哭，哭得昏天黑地，没人理，不知过了多久，一天还是两天，我从屋里往外爬。是从后门爬出去的，记得翻过了一个门坎。

我在门外的路上爬了一阵，不知怎么就滚到路边的一个沟里去了，全身糊满了烂泥。

那天是赶场，瞿家有一个叫王素芳的女人赶场时从我家院子前路过，她听见有娃儿的哭声，伸头一看，看见了我。她说：“这娃儿滚得这么脏，可怜。”她把我抱起来。

王素芳正被培养当妇女主任，曾经到我家来看守过我们，因此她认得我是刘秀容的娃儿。

王素芳有个嫂嫂，结婚五、六年了都没生娃娃，她把我抱起时就打算把我给她嫂嫂。她先把我抱回家，把我洗干净，然后给我吃饭。她先把吃剩的半碗肉端上来，我迫不及待伸手就抓，饭还没来我就把肉抓来吃完了，可想我饿到什么程度。

吃完饭，她把衣服给我穿得巴巴适适的（整整洁洁的），抱我去找她嫂嫂。

她嫂嫂听说我是地主的娃娃，爸爸又是遭枪毙了的，不敢要。怎么办呢？不能把我又丢掉，王素芳看我长得很乖，也舍不得。于是她



吴世跃在他当年被收养的瞿家旧屋前（2009年8月）

去找村长苏吉武，问他怎么办。苏吉武说：“大人有罪娃娃没得罪，他才这么大点，也没享到什么福。这样吧，明天上午8点钟开大会，我在会上说说这事，你把娃儿抱来。”

第二天在会上，苏村长当众说：“王素芳抱了个娃儿，是吴庆华和刘秀容的儿子，现在吴庆华枪毙了，刘秀容自杀了，娃娃没了父母。王素芳有个女儿，没有儿子，干脆就把这个娃儿给她当儿子，同意的举手。”

所有的人都举了手。

王素芳好高兴，这么顺当就抱了个儿子。这时，她嫂嫂瞿杨氏后悔了，想要得很。但是王素芳不干了，她自己想要。

就这样，我成了瞿家的人（王素芳嫁给瞿家），我的名字改为瞿炳良。

王妈妈领养了我之后，接二连三地生孩子，我九岁多时，她又生了六个，加上以前的一个女儿和我，共有八个娃儿。这个时候遇到了“粮食关”（即三年大饥荒），家里吃饭困难，王妈妈拖不起了，决定把我送走。她对我说：“你有个姑姑嫁在冉义黄福联（音）家，你到她那儿去。”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姑姑，我小时候憨乎乎的，什么都不懂，没有任何人指点我。为什么呢？因为瞿家的人不愿意其他人同我说话，怕别人告诉我我的真实出身，吴家的人更是不敢接近我。所以，我只知道王素芳是我的亲妈妈，其它什么都不晓得。

那天我被带到姑姑家，姑姑独自一人躺在一间烂茅草房里，床是一块木板搭的，被盖都没有。姑姑已经病得起不了床，她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我不晓得你还活着。”

王妈妈走后，姑姑说：“那个角落里有个小罐罐，装米的，你去看一下，里面还有没得米，有米的话就打点来煮饭。”

我去把米全部挖出来，只有半碗。我把米煮稀饭，煮好后有三碗多。当天就吃了这点稀饭。

第二天，一点米都没有了，早上我去地里找了点牛皮菜回来，煮来吃了，就再没办法了。姑姑病得重，我看这儿呆不下去，独自一人离家出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我姑姑。好多年后，我才弄清楚，姑姑是我爸爸的妹妹，叫吴素华，排行第四。土改时她也被划成地主，关押起来受了很多刑罚。土改的人把她捆绑在树上，逼要金银财宝。他们算账说，姑姑有多少田，请了多少长工，剥削了多少年，该交出多少金银。土改工作组的人发动农民去斗打。他们把姑姑衣服脱了，用猪背上的鬃毛穿入她的乳头。有人还从茅坑里舀来屎尿，撬开她的嘴，硬给她灌下去。

姑姑当年是嫁给冉义黄家的，姑父在土改后不久就死了，姑姑没有小孩，无依无靠。我流浪几年回来后，王妈妈告诉我，我走后姑姑被送到人民公社办

的“幸福院”，在那儿姑姑只住了两三天就死了。姑姑的全部家产就是那两间烂草房，她死后队上把它拆了作柴烧。

三、外出乞讨，九死一生

我从姑姑家跑出来后，不晓得往哪儿走，心想，沿着大路走，也许找得到吃的。

一路上我饿得心慌，只捡到一点萝卜根根吃。我走到高桥场，到饭馆门前去守候，果然守到别人吃剩的一点菜汤汤。我去端来喝，唉呀！那个味道我从来没吃过，安逸（爽）！

从此，我开始了舔盘子的乞讨生活。

我在高桥讨了几天饭，饭馆的服务员赶我走，不准我在那儿要饭。我只得又走，往邛崃县城走。

邛崃城里也不准我要饭，我只得又走，沿着大路往雅安走。

流浪路上，我吃水沟里的水葱子、路边的马边草、芫须草。听人说，一种叫猪鼻拱（即“折耳根”）的草草可以吃，我挖来吃，咦，清香清香的，还好吃。一路上，我只要听说哪种植物可以吃我就挖来吃。水沟里的水葱子、田里的乌瓜子、路边的野草草、山上的野果子野花花、水苔藓，还有树皮，我都剥来吃过。

到了雅安，咦，不错，这儿饭馆多，也不赶我走，我在雅安呆了一段时间。

我东混西混，晚上什么办？夏天，我跑到捩了谷子的谷草堆里去睡，蚊子咬不到。冬天，我钻到别人烧灰窑的窑子里。有时在别人屋檐下的草堆里过夜，但这种时候不多，因为主人发现了要打，把我当小偷。（我第二次出来流浪时还把我当特务抓来关起）

下雨的日子最苦，没找到过夜的地方只有顶着淋。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避难处，就是坟墓。川西荒弃的坟一头有一个敞口，可以钻进去睡。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三个多月吧，我天天钻到坟墓里睡。我要等天黑了，往往是等群众睡了才摸到坟地里去，因为让群众发现了的话



吴世跃在他当年睡过的坟前（谭松摄）

会把我当盗贼打。我永远记得第一次钻进去的情景。我躺下后，四周漆黑，我想看点光亮，心里安稳些。我伸手乱摸，抓到一块石头，我把石头垫到后脑，这样，头高一点，可以从敞口看到外面的一点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把垫到后脑的石头搬过来，一看，“石头”原来是一个死人的头骨！我那时小，才十来岁，也不晓得害怕，第二天晚上照样爬进去。只是，这次我先用草草把坟里面的块块渣渣扫出来了之后再睡下去。

在流浪讨饭的那几年里，我好多次昏死过去。有时是饿昏了，有时是淋了雨感冒发烧，有时是又饿又病。有一次我昏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这个叫花子要死了，已经在这儿睡了两、三天了。”嘿，我没死，几天之后我又慢慢醒过来。我爬到沟沟边，喝了点水，有了点精神，又爬到田边扯草草吃。那时田里麦子正在灌浆，我爬过去扯下一把麦穗，用手搓，吹一吹，一口吃下去。那个浆浆清香清香的，好吃！

我还在田里扯“乌瓜子”剥米米吃。嫩的就直接吃，老的就扯草草来烧起吃，这样要香一些。

野草草野果子吃多了，经常拉肚子，粪水从肛门流出来，我一点知觉都没有，裤子打湿后，觉得冷，才发觉。我的肠胃病、风湿病就是流浪生活落下的。

那些日子，我瘦得皮包骨，衣服破破烂烂，一身又脏又臭，过路的人看见我，远远地捂着鼻子绕开走。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太脏，于是，有河，或者有水沟的地方，我就脱了洗。衣服洗后晒在地上，我光着身子找个地方躲起来，直到衣服晒干。

有一次我看到河里有人扑通扑通游得很欢快，我不会游泳，但憨乎乎地跟着跳下去，结果一下子就沉了下去。旁边的人见我半天不起来，晓得出事了，一个人钻下水把我捞起来，扛到岸上压我肚子，我吐了好多水才活过来。

这次流浪，到底是几年我记不清了，大概有五、六年吧。但我记得流浪的路线：邛崃——百丈——铭山——雅安——天全——泸定——康定——炉霍。当时，我不知道我刘家的身份，更不知道刘文辉有个儿子就在炉霍县，而且是供销社的主任，否则，我一定要去找他，人生的命运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后来外面不准流浪了，要遣返，我便回到生产队。

四、地主子女，生存这么艰难

我回到生产队劳动时，大约十五、六岁。那时，一切靠工分吃饭，一天的满分是10分。同我一样年岁的人，贫下中农子弟评8分，我是地主子女，只评4分，

最多5分。我干的活比他们（贫下中农子弟）重，比他们多。为啥呢？因为地主子女不敢有丝毫的偷懒，更不敢讲价钱，重活累活我都得去干，否则就要挨批斗。

每年冬月间或腊月间年终结算，算工分，我一年到头干得比他们多，但工分少一半。工分少，分粮就少，根本不够吃。每年都是如此。我一分了粮就计算，多少斤谷子，一年有多少天，一天可以吃几两，一顿又吃多少。算下来，一顿只能吃一两多谷子。因此，回到生产队干活，仍然挨饿，我干活时，常常饿得虚汗直流。这样干了几年，实在拖不下去，于是我第二次出去流浪。

我仍然沿着上次的路线走。翻越二郎山时，我钻到山洞里过夜，一天夜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朝洞口走来，我听见呼哧呼哧的气息声。我想可能是头熊，闻到我的气味了。我吓得跳起来，一把抓住洞口的一根树枝，拼命地上下左右乱舞！

那黑乎乎的东西退走了，我还在乱舞，根本没看清是不是熊。那一夜我不敢睡，紧紧握着树枝，睁大眼睛一直坐到天亮。

我这次流浪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原因是我被抓了。

那一天我流浪到泸定，饿慌了，我身上还有讨口时别人给的一点钱。我找到一户人家，对他们说，能不能给点吃的，玉米馍馍、稀饭羹羹都行，我可以付点钱。

他们给我了吃的，我坐下来享用。

正吃着，几个民兵突然冲进来把我捆绑起来。原来，这户人家认为我是伪装成叫花子的特务，他们在给我饭吃时就向公社汇报了。

我被押到公社，又押到泸定县城，他们让我老实交待，我如实说了，但他们高低不相信，认定我是伪装了的特务。我被押到雅安专区，雅安打电话到邛崃，最后落实了我的身份——一个没有家的、无人照管的孤儿。

雅安把我放了，我没有马上回来，雅安是个要饭的好地方，饭馆多，剩的菜菜汤汤也多，我吃了这家吃那家，甚至抱着泔水桶一阵猛喝，泔水桶里有油水，味道也不错，回想起来比现在的肉还好吃。这样，回生产队之前，我吃得脸上还长了点肉。

回到生产队后，生活仍然十分艰难。这时，我听人家说，在成都，鸡蛋可以换粮票和布票。我决定试一试。第一次我身上只有10多元钱，我买了点鸡蛋到成都去，果然换到了粮票、布票。我把粮票拿回来卖，嘿，还挣了几个小钱。我来了劲，开始学做生意。后来，我花20多元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这样就更方便了。我开始挣了一些钱。可惜，一次在路上，我被工商所的人抓住了，所有钱和东西全部被收缴。他们说，想要回钱和东西，必须开来“三级证明”。“三级证明”指的是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证明。我怎么敢去开？我出身又不好。

所以，我第一次“下海”就输得精光。

莫法，我又出去流浪，这是我第三次流浪。这次时间更短，没多久就被国家抓起来关押在成都多宝寺。我被关押了近三个月，放出来时我头发长得很，一身肮脏。

从多宝寺释放回到生产队后，人们不敢同我说话，我在生产队抬不起头，只得去跟一个木匠师傅学手艺，主要是拉锯子改木板。我干了一年多，只吃饭，没有工钱。后来，国家不准“五匠”人员（木匠、铁匠、泥瓦匠等）“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又被清理回来。

还是得做生意才能生存，我又买了辆自行车。

我白天劳动，晚上悄悄去买一些蔬菜，等别人睡了再把菜驮回来，天不亮就赶到雅安去卖，同时把雅安的烟酒带回来卖，比如8分钱的经济烟、4角钱的芒果烟、2角4分一包的飞燕、5角钱一包的大前门。买烟要排队，一次只能买5包，我就一次一次地排队买。烟买回来后我不敢公开卖，只能打给贩子，价格可以翻一倍。

在偷偷摸摸做生意的过程中，在眉山、雅安、彭山的路上，我先先后后被工商所收缴了四辆自行车和好几百元钱，辛辛苦苦挣的一点财产转眼就没有了。不过，人还没有被抓、被打。

真正把我整伤心的还是生产队。

“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时，大队书记龚年笙和生产队长王良清说我投机倒把，把我抓去“学习班”批斗。同时，他们抄了我的家，把我的几十斤麦子、一百多斤谷子和一辆新自行车全部抄走了（自行车从此成了大队干部的公车）。

我被捆绑起来批斗，那天晚上，斗争会结束后，他们用一个拌桶把我盖起来，关在保管室。我双手反捆在身后，闷在拌桶里，夜里，屎尿都拉在裤裆里。第二天，保管员瞿留生来掀开拌桶，把我放出来。

我又一次一无所有，家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我跑到一户姓冷的夫妇家，他们给我煮了饭吃，看我实在没法，两口子商量后又给了我一升米。多年来，我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

我把那升米吃完后，没办法了，不得不又一次外出流浪。



采访时吴世跃专程来到冷家

地主子女，生存得好艰难！

五、捆绑吊打，逼我走上绝路

1976年，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年。

一天，几个公安人员突然把我抓起来，铐到安仁镇付安乡一幢房子里。这幢房子是当年刘湘手下一个叫刘麻子的连长修的私宅，现在还在。

在那儿，我遭受了我一生中最惨痛的吊打！天天皮鞭暴打，还用扁担砍，一身打得稀烂。

他们为什么下狠劲打？因为我不承认偷了供销社的布。

在付安街上有一个供销社，1976年7月28日，供销社的布被偷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是我偷的，因为我曾到处流浪，又是地主子女。那个年代，地主子女，人人都可以欺负。

我们问我7月28日在哪儿，在干什么。我想不起了。我一辈子没读过一天书，日子过得稀里糊涂，某天某日真是记不起。

说不出来，又不承认，几天几夜连续吊，暴打！打得我尿尿失禁，拉在裤子里，右膀和右手腕也被吊脱白了（后来是赤脚医生给我接好的）。下手最狠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公社的武装部长史国强，我永远记得。

六、七天后，他们突然说：“地震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这一下我猛然想起了，1976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那天我印象深，当



吴世跃在当年吊打他的公馆前（2009年8月）



当年吴世跃在这儿受刑（谭松摄）

时我正住在雅安车站后面的一个招待所，地震发生时，那门格吱格吱地响。

我赶紧把“不在现场”的证据告诉他们。第二天他们去调查了，我所说的是事实。

但是，他们仍然不放我，仍然把我铐起，只是没有再吊打了。

那天中午送饭时，他们把我手铐打开一只，另一只仍然铐在楼梯的栏

杆上。吃饭时我发现地上有颗铁钉子，我悄悄把它捡起来。当天夜里，我用钉子挖砖缝的石灰，然后取下一块砖。接着又挖，总共挖下六、七块砖，人可以钻出去了。

但一只手还铐着。为了活命，我拼命往外拉，手磨得鲜血直流，我还拿钉子戳，最后终于挣脱了手铐，但手上留下了终身的伤痕。

我逃出去之后，不知往哪儿走，绝望得很，我萌生了死的念头。

我回到家，买了20多粒“敌百虫”，晚上关上门，一口气全部吞下去。

我们瞿家有个嫂嫂，她每次到民安村时都要来找我摆摆龙门阵。也是我命不该绝，第二天她刚好来了，她看快中午了我门里面还是关着的，她从门缝看，看见铺盖好象裹着人。她拍门，又喊，都没应答。她估计出事了，赶紧去把大队赤脚医生吴世龙叫来。吴世龙来把门砸开，见我牙齿咬得紧紧的，于是撬开我的嘴，灌水，不知又灌了什么药，半天后，我又活过来。

六、艰辛的寻亲之路

在我走投无路时，有人告诉我，我有一个哥哥，在峨边茶厂工作，我非常高兴，当即决定去投奔他。

我没钱乘车，但我知道青龙场有火车，以前我在那儿卖过菜。我到青龙场爬上一列火车，是货车。到乐山附近时，我被车站派出所发现了，又被关起来。几天之后，落实了我的身份，要遣返。我不干，说我的哥哥叫吴世伦，在峨边茶厂工作，我要去找他。派出所果然又查到了我哥哥，但是不准我去找他。为啥？因为他正在峨边劳教，是个劳教分子。

派出所给我买张车票，非要我回来。

我上了车后又溜下来，爬上开往峨边的车。

这次是列客车，查票查得紧，第一次我在厕所里躲过了，第二次躲不过，眼看又要被抓，被关，押回去又要被当成小偷、扒手。那种绝望的感觉又涌上来，不活了！跳车，摔死就算了！

我从车窗跳了下去。

嘿，不知过了多久，我又醒过来，身上除了脚上的伤（伤痕至今还在），其它都完好。

但是，去找哥哥的梦破灭了，我不得不又回到了家乡。

回来后仍然莫法，这时，又有人给我说，安仁镇是我外婆的老家，王玉清是我外婆的亲戚。

王玉清！她的名字响得很哪，刘文彩的五姨太，到处都在批斗她，她还是我

的亲戚？！

我反正无路可走，去找找她。我从冉场步行，一路走一路问，最后打听到王玉清在蔡场5大队3队。

王玉清住在一间矮小房子里，虽然贫穷，但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见面，彼此都不认识。我把我的情况说给她听，但是，那时我对我妈妈家的情况也不太清楚。我告诉她，我只听说刘湘是我的外爷爷（我外公的哥哥），我不知道我该叫她祖祖呢还是婆婆，还是其他什么。我说，我搞不清楚，要你才搞得清楚。王玉清问：“刘湘是你外爷爷？那你妈妈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她叫刘秀容。”王玉清一听就拉着我的手说：“噢，刘秀容是刘湘的亲侄女嘛，是刘湘大弟弟刘成章的女儿。那你该叫我祖祖。”

我于是就叫她祖祖。我告诉她我的经历：流浪呀、舔盘子呀……她一直抓着我的手，眼泪直流，说：“唉呀，你这娃娃，你是我们刘家的么孙子，你100根头发里就有50根是我们刘家的……”

她煮饭给我吃，吃了中饭也不让我走，又留我吃晚饭。

她有两个鸡在生蛋，她把全部鸡蛋煮给我，共有10个。接着把晚上没吃完的饭捏成两个饭团，在火上烤黄后塞给我带走。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亲戚的款待，听到这么和蔼温柔的声音，我一个长期流浪，看惯了冷眼，饱受了呵斥的孤儿，心里觉得好温暖！

王玉清对其他人也很和气，群众都说她好。后来她从蔡场搬到安仁，每个月都要到我这儿来耍，我也经常送些东西给她。我有亲戚去看她，她把贡的东西拿下来，非要招待我们吃了才准走。每年年关，她觉得她是个老辈子，还要给我们发压岁钱。改革开放后，我做生意已经在挣钱了，她还要给我发钱，50，100地发。她还教我，说共产党好。我说：“对，好，好。”

那天分手时，她叫我到安仁去找刘世孝。“他是你亲么舅，你大舅还在不在就不清楚了，他叫刘世泽。”她还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哥哥，全名不知道，只知道叫“昭昭”，她曾经在刘家公馆里逗过他。



青年时的吴世跃

我好高兴，找到亲人了！

我赶到安仁，打听昭昭和刘世孝。我先问刘世孝。别人说，他在红旗坝（就是现在的十字口）。我赶到那儿一看，正在开批斗大会。我问刘世孝，别人说：“站在那高板凳上的就是。”

我第一次见到么舅，他正站在高板凳上挨斗，有人正用刷条子鞭打他。

我不敢认他，也不敢说我是他侄儿。

我就问昭昭，得知他叫吴世昭。我找到他的家，二十多年了，我们两兄弟第一次见面！

二哥本来也出生在冉义，但还不到一岁时就到了安仁外婆家，从此再没回去，也不敢回去，冉义的家在哪儿他都不晓得。外婆姓郑，1960年时饿死了。

二哥同大舅的一对儿女刘忠民和刘凤鸣住在一起。大舅和大舅妈在饥荒年时双双饿死。他们为了救儿女，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儿女吃。大舅和舅妈是地主分子，不敢去开点荒地种点蔬菜，更不敢出去偷点瓜果小菜，只有活活饿死。我后来听说，他们被从刘湘公馆里赶出来后，长期没有住处，日子非常凄凉。在外教书的二舅刘世清（早已去世）回来看到这种状况，把手表卖了，买了几间破草房，他们才有了个住处。

我妈妈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出生在刘湘公馆里，我妈妈是老二，解放后他们几乎都被打成地主。

位于安仁镇的刘湘公馆



二哥的家空荡荡的，什么家具都没有。我那表妹盖的是一床破棉絮，到处是洞，那张板板床也破破烂烂。

当天，二哥凑了点钱，去买了半斤米，再弄了些红萝卜煮在饭里招待我。饭煮得还干，他们自己吃的都是清汤汤。

我无路可走，想投奔亲人，但看到这个样子，知道没法了。吃了那碗红萝卜饭后，我又走了。

七、山上遇险和大哥之死

离开二哥家后，我去找以前我跟过的木匠师傅，求他带我出去干活，这样我又混口饭吃。

但这次我差点又丢了命。

那天我们去天全青龙山上改木板，走在悬崖边上，我脚下一滑，从悬崖上摔

下去，下面有十多丈深，我双手抱着头，翻滚得昏天黑地，然后人事不醒。师傅认为我没救了，他爬下悬崖，把我翻过来，一看，还有气，赶紧背我下山。

街上，有人出了个土办法，把山上的艾麻草割一大把来，脱光我衣服，全身用艾麻草抽打。嘿，过了一会，肿就有些消了，我人开始动弹。但是，脸和头还是肿胀。又想一个办法：把挖了麝香后的空壳壳（獐子的肚脐眼）切开，放在大蒜里磨，磨成浆后抹在头上、脸上。果然，两、三个小时后，我醒过来，又一次从鬼门关折回来。

我回到生产队后，遇到国家要在邛崃五面山修玉溪河，每生产队派5个劳动力。我被派到工地上担泥巴。

这个时候，我大哥吴世伦从劳教队里释放回家，他来找我。

我这才知道大哥的身世。

大哥比我大4岁，土改妈妈被关押时，带哥哥的保姆胡大婶婶便把哥哥领走了。后来，他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叫红庙子的破庙里。饥荒年，哥哥饿得没法，跑出去偷了点蔬菜吃，因此被抓去峨边劳教。劳教回来后，红庙子已经被拆了，他没住的地方，去投奔二哥，发现那儿没法安身。他来找我，见我也是一贫如洗，他很绝望，把劳改队发的一件衣服送给我就走了。那是一种牛皮纸衣服，现在还没得这种衣服。

离开我后，大哥去邛崃找三姑姑，三姑姑家也很穷，大哥把身上仅有的十元钱用完后，在新津南河跳河自杀了。

工地上有个姓吴的再义人，人们叫他吴连长，他有一定的权，我于是壮起胆子去找他。我对他说，我父亲也姓吴，点名时叫我瞿炳良是因为我是瞿家捡回去的。我父亲叫吴庆华，是吴大院子里吴叫花子的后人。吴连长一听，说：“唉哟，我同你爸爸还一个包包里用过钱！”

第二天，吴连长就把我提起来搞后勤。我先煮了三天饭，他见我还老实，便安排我去当采购，这是个美差，我高兴得很。可惜，又是因为地主子女这个老问题，我失去了这份美差。

一个姓汪的营长，听别人反映，一个地主子女在搞后勤，他便找个理由撤我的职，他说我偷了菜板。我没偷，不承认。一天晚上，一个叫吴子明（音）的老乡来叫我走，我说我不走，我没偷。他说，你还不明白，没偷也要整你。我一下子想起上次“偷布”的事，马上软了。当天夜里，吴子明把我送下了山。

八、我的婚姻和“翻身”的日子

从玉溪河工地回来后，有人来给我介绍个女人，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

我以前也谈过几个女朋友，女方对我的人品、相貌、办事能力等都没有意见，但是，一说到成亲，女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反对，说嫁给了我就是地主婆，将来要吃亏，要挨批斗。最长的一个我谈了一年，她很想嫁给我，可最后她还是放弃了。

这次，当介绍人把她带来时，我已经 30 岁了。

她来相亲，一件好点的衣服都没有，裤子烂成刷刷，鞋子是个烂筒靴，到处是破洞。衣服补疤重补疤。她没有妈，只有一个爸爸，爸爸烂酒（酗酒），成天叫她做事，做不完就打。我这儿有吃的，她一来，就不愿走了。

我说：“你不回去怎么行，我们刚见面，手续都没办，连你爸爸都还没见过。”我叫介绍人带她回去。介绍人有点怕她爸，不敢。

我决定鼓起胆子上门去见她爸。我先买了 8 斤半肉，我听人说，“8”是吉利数字，“半”表示“伴”（老婆）。还有，双数也吉利。我到医院去找了两个瓶子，打了两斤酒，买了 40 个鸡蛋，20 把挂面，都是双数。

我见到她爸，送上这些礼物，他一下子就满意了，留我吃了中午饭。就这样，我有了老婆，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几年后，老丈人去世，我回到安仁找我么舅，从此住在了安仁。

这个时候，已经是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年代了，做生意不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被抓、要被收缴。我以前流浪时走过很多地方，清楚哪些地方有什么特产，价格怎样。我们这儿 1 斤米换 3 斤土豆，每斤还要补 5 分钱差价。在天全 1 斤米可以换 8 斤。我把米拿到天全去换土豆，把土豆拉回来换米，我不要差价，土豆又好，很多人都找我换。

接下来我又做水果生意，我跑泸定、康定、石棉（石棉出核桃），又跑阿坝州的小金县，小金县的水果又好吃又便宜，我赚了不少钱。

做生意的人多了，产地的水果价格涨起来，我于是转到云南，把云南的菠萝、香蕉、芒果等等，一车一车地拉回来，又赚不少钱。后来，听说越南的水果便宜，我办一张出境证，到越南去采购。越南的水果果然比云南便宜，还可以到树上去选摘。我选了一些长长大大的香蕉，拉回来我自己给它取个名字叫“香蕉王”。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这种香蕉，稀奇得很，也好卖得很。我批发兼零售，又赚了大钱。

我水果生意做大了，人手不够，便把老婆娘家那边的人雇来当帮工，我成了一个小老板。老婆回娘家，穿的都是时髦货，我每次去，都提着好酒好肉。她娘



吴世跃夫妇和他们的

屋的亲友们高兴得很，也羡慕得很，连连说：“她嫁好了，嫁好了！没成地主婆，成了老板娘！”

就这样，我一步步挣下了眼下这笔家业，包括在安仁镇中心地带（也是与我妈妈出生地——刘湘公馆——一街之隔）的三个旺铺和住房。

采访时间：2009年8月18日、19日、20日

地点：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16号/
四川省邛崃县冉义乡

采访后记

这是一次除秀山胡祖暖外最长的个人采访——前后跨越了三天，地点分为室内、街上、和野外（坟地）。

吴世跃没有读过一天书，地名和人名都只知道音。但是，同他接触，分明感到他的聪明和灵气——这是不是那斩不断的遗传基因的缘故？

吴世跃个子比较矮小，这自然是多年“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啃草根的“长征”所致。他说，他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想来也是。

不过，细细端详，你能看到他眉宇间有一种端庄、一种稳沉和一种大气，这不是一般的流浪儿所能具有的。虽然，不时有一种仿佛根深蒂固的悲苦，乌云般笼罩在他脸庞。

不管怎么说，他活下来了，并且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板。他的店铺，与他母亲的出生地——豪华的刘湘公馆——仅一街之隔。

有人说，吴世跃的创业，比他外爷爷刘湘（国民党上将，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赫赫伟业更加显赫，更值得书写。

看看他的一生，此话似乎不无道理。



“吴老板”在他的一个门面前。
(2009年8月)

第五章

几个残存的地主庄园及其人物命运

1949年之前，在中国的乡村，可以见到不少大大小小的地主庄园。这些庄园，集建筑艺术、手工雕刻、儒家文化、传统民俗等于一身，再与四周的自然环境巧妙融合，构成“天人合一”的宁静与优雅。人们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到千百年来那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

1949年，中共夺得天下，暴力革命劈天而降，打断了千百年来的那种和谐，那种“一脉相承”。

房子分了、家具搬了、树木砍了、艺术毁了、书籍烧了……

土改未毁的，大炼钢铁毁了；大炼钢铁未毁的，“文革”毁了；“文革”未毁的，“经济开发”毁了。

大大小小的地主庄园，终于一步步玉殒香消灰飞烟灭。

庄园的主人——地主们，命运不如他们的家园。他们大多在土改时就一步到位地“玉殒香消”，未能目睹其家园的一步步衰败，子孙的一掬掬血泪。

由于种种原因，本章所展示的这几个庄园我都未能深入采访，连究竟被杀了多少人都没有统计到。眼下，只能提供这么一点皮毛，但愿能引起几分联想。



彭家大院残存的一道侧门

血红的彭氏古祠



2003年3月，三峡大坝蓄水在即，无数古镇古迹、奇石美景将永沉水底，我只身穿越整个峡江，带着一种“执手相看泪眼”的惜别悲情，按动快门，作一点挂一漏万的存留。行到云阳县，听说在江南岸，距那著名的张飞庙约十多公里的山中，有一座雕栏玉砌的古老祠楼，其建筑艺术、其雕刻水平、其人文内涵，居整个川东地区之首。我当即渡江，沿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土路，找到了那藏匿在山中的百年古祠。在那儿，我看到了一楼残败的民间工艺，也听到了一段血红的人间悲剧。返渝后，这段“血红”堵在心头，不思量，自难忘。一个月之后，我又重返彭氏古祠，用相机和笔记下了这即将被岁月的江水永远淹没的“古迹”。（这也是我作土改调查的开始。）

一，西风残照 彭氏古祠

1760年，一个叫彭自圭的人千里迢迢从湖北大冶来到四川。他先在万县龙驹坝卖烧饼，后又为别人当“扁担”（苦力），挑棉花贩运到湖北利川。数十年风雨，一辈子辛劳，到他60岁那年（1800年），已是“万元户”的彭自圭开始建造宅院。这一造，整整造了60年，历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到同治三年（1864年），一座川东地区首屈一指的祠楼和一座拥有15个天井的大宅院巍然耸立在长江南岸的群山之中。

60年，几代人！当地流传：建造时石匠带的十几岁徒弟，完工时白了头，

徒弟的徒弟又带了徒弟。

彭氏宗祠建在四面环山、三面绝壁的山丘上，山下有瓦砾溪潺潺流过，四周竹木簇拥，人文与自然景观巧妙地融为一体。祠楼建筑面积2651平方米，由前门厅、正门厅、享殿、戏楼、天井、城墙、围墙、厢房、箭楼及四角炮楼构成。祠楼属石木结构九级楼阁式，三重檐四角攒尖顶，下六层为石砌墙底，全楼高37米。



彭氏宗祠里残存的戏楼

迈进厚厚的石门槛，左右廊下檐椽间，是一块块云纹形垫木，两面雕刻着各种栩栩如生的花鸟虫鱼。中心主楼下六层是重达吨余的方石垒砌，二、三、四层，每层四面八扇石窗。底楼四面墙壁上镶嵌着一方方青石，上有当时川东著名书法篆刻家彭聚星、刘贞安等撰文镌刻的梅兰竹石，此外还刻有“勤创业”、“正心术”、“和邻里”、“慎交游”的长篇家训。现在，镌文虽然残缺，雕刻尽管破败，但却让人感到极强的儒家文化气息和浓郁的民间艺术美感。

彭氏古祠楼，包含了多少民间艺人、手工匠人的智慧和心血！

可惜，它虽然巍然挺立在天地山川，一眼望去还颇有气势，但却“病入膏肓”了：戏楼部分坍塌，檐下的匾不知去向，后墙上那块九平方米的金粉精绘百寿篆被人毁损，雕花玉砌被“红卫兵”砸烂，层层上好的楼板前几年被拆去作了它用，四角炮楼现存一座……



彭氏古祠里刻有“戒骄奢”戒文的石碑

村长陈大贵说：“1987年，祠楼被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县上拨了2000元来补了个漏，1997年立为四川省保护文物，2000年立为重庆市保护文物，保护级别增高了，来参观的人也多了，常有官员的小车开来，但是，再没来一分钱。”

不过，古祠楼还算幸运的，虽然病病恹恹，总还“活着”。（1985年，凤鸣区有些领导想要用祠楼的石料和木料修学校，准备将祠楼全部拆毁，幸亏区委书记戴修强力排众议，“刀下留楼”。）

与祠楼一箭之遥的彭家座堂（住宅大院）就没有这般的幸运了。这座占地2000多平方米、拥有15个天井、三道豪门、无数艺术雕刻的宅院土改时被“五马分尸”，然后被分而食之。如今，仅有一道侧门还比较完整地立在天地间。

住在院内的邹新久老人是土改时分“胜利果实”者之一。他分了左厢的几间房，上世纪七十年代又花800元从政府手里买了几间。他把那些拱门、雕栏、



石刻通通拆了，修了一个经济实用的大猪圈。我在他的“新居”里看到墙角屋檐到处都是残存破碎的“石刻艺术品”。

宅院没分完的中间部分属于区财政所，上世纪八十年代，财政所一股脑儿把它变成了银子，买方把那些雕花艺术一股脑儿变成了两幢灰白色的砖房。陈氏的百年老宅和“民间工艺”终于灰飞烟灭。

地主子女彭义尧说：“我小时候，那些檐、梁、柱都有雕刻，还涂有金粉，印象最深的是晚上月亮出来，照在飞檐梁柱上，金晃晃的，美得很……”

座堂宅院里，以前还有无数的雕花木椅，龙凤古床，都是精美的手工艺术品。彭义尧的妻子贾绍英说，她记得有一张大床，浑身都是雕刻，床前还建有三道雕有人物和花鸟虫鱼的门。这些地主财产要么作为“胜利果实”分给了“翻身农民”，要么作为“封资修”的黑货被红卫兵砸得一干二净。不过，我在半山腰一个叫彭林之老人的家里，见到了幸存的惟一的一架古床，该床已有 180 年历史，是彭林之祖奶奶留下的。彭林之说，文革时他把床拆散了一块块藏起来，古床因此得以保存。

烈日高悬 玉殒香消

1949 年，共产党来了，彭氏家族的 30 多条生命骤然消殒。

在彭氏古祠下、在残破的宅院里、在农家小坝上，我逐一采访了彭氏第六代子孙彭义尧、彭兆民、贾绍英、陈邦英（彭定国之妻）；当年民兵李朝富、邱德才；土改时分“胜利果实”的贫下中农邹新久、村长陈大贵等。下面是采访到的被打死（整死）的 30 多人中的一部分。

彭义尧的父亲叫彭达楠，共五兄弟：彭达楠、彭达杞、彭达桑、彭达渠、彭达操。1950 年，五兄弟同时被抓，几个月后被枪杀于云阳县凤鸣镇李市乡。彭

达楠的二儿子，现年 67 岁的彭兆民老人讲述了 50 多年前的那一幕：

彭兆民：解放不久就开始打（杀）人，第一次打了四个，其中有我老汉（爹）的叔伯兄弟彭绍文。彭绍文是乡长，肯定要被打。但他没干任何坏事，他有文化，不准打架斗嘴，我记得他最恨吃鸦片，同后来政府提倡的差不多。他遭打时 30 多岁。

我老汉他们关在凤鸣，有 15 里，我天天去送饭，同那个 99 团搞熟了。我最喜欢打篮球，那个团长也喜欢打篮球，我们经常在一起耍。后来他们部队要走，专门拿兵来喊我去耍最后一回。他说，他很想把我带走，但是莫法子（没办法）。他告诉我，你不要承认你是地主，你老汉剥削人，你是读书娃儿，没剥削。

我老汉那一批打了十个，除了老汉五兄弟，还有一个县长，记得姓薛，一个科长，也姓薛，一个叫张志帮（音）的国民党军官，还有一个不认得。我亲眼目睹了那个场面，打完一喊散会，我就上去了。

我老汉的（枪）眼子打得好，后头一个眼，前面额眉处一个眼，脸没烂。有的打得只剩半边（脸），有的脑壳盖盖都没得了。那个县长头打烂了，全是血，他太太上来，哭得伤心，认不出哪个是她男人。我说我来帮你认。她哭得站不住，扶倒我的肩头，问：“你是哪户的？你认得？”我说你男人到我们院子来打过麻将，我认得。

据说那个县长救过刘伯承的命，他把刘伯承藏在自己家里，躲过大难。分手的时候他们两个约定，今后你有难我要保你，我有难你要保我。县长被抓后给刘伯承写信求救，但是没有救到他的命。

我还记得那个 50 多岁的李老大，是个下力人。他走上来，掏出一大把草纸给我老汉他们擦血，民兵不准。李老大跳起来说：“不说别的，我一个下力人，每回进他们彭家大院，至少都给我泡了杯浓茶，这就对，对得起人。我买点草纸给他擦擦血，我相信你把我也打了？！”

我老汉他们五兄弟都是我找人拖去埋了的。怕不怕？不怕不怕，有啥怕的！现在哪个想？有个莫子（什么）话说！那个政策来了，你哪个做？你还反抗得了？



彭兆民在他家门前

采访后记

彭兆民的家紧靠在彭氏古祠的高墙外，是一个阴暗、潮湿、低矮的偏棚，他没有儿女，老婆多病，家里几乎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夜深沉，孤灯昏暗、静寂，彭兆民显得比较兴奋，难得有人在冷冷清清的夜晚，走进他冷冷清清的偏棚，陪他悠悠闲闲地抽烟聊天。

聊的是那一幕家族的血腥，但我看不到一点沉重和悲愤，老人仿佛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毫无新奇的故事。

“毛主席来了，好哇，分东西！”

80岁的邱德才老汉是我偶然在古祠的大门外遇上的。他告诉我，他们邱家同彭家一样，都是从湖北来四川的。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邱德才：“解放了，毛主席来了，好哇，分东西！那个大院、田土，都分给我们，翻身嘛，过幸福日子。”

“你觉得该不该分？”

“该呀，他剥削嘛。他们彭家酿酒，不喝酒，我们邱家的人喜欢喝酒，被彭家剥削，穷了嘛。”

“除了剥削，他们彭家是不是干了很多坏事？”

“坏事倒没得，老爷还和气。这座楼子（即彭氏宗祠）他们拿来办了个小学，叫私立育才小学，都可以读，不要学费，但书本费要个人出。”

“那你认为杀他们全族冤不冤？”

“有啥子冤嘛。他们彭家的运到头了，该家破人亡。彭家到解放那年是‘达’字辈，‘彭’遇‘达’肯定要遭殃（注：“彭”与“盆”同音，而“达”在四川方言中的意思是“摔”。“盆”一“摔”就破。）那个时候，分东西，高兴得很哪，积极。杀人嘛，上面的政策。我是民兵，彭达楠他们五兄弟就是我亲自押到刑场的。”



邱德才

“黄姑娘”遇难记

第一次采访时，我听说了一个叫“黄姑娘”的故事，正是这个故事，促使我又来到彭家楼子，从此开始了对土改的调查。

这一次，我从彭义尧（“黄姑娘”的大儿子）、贾绍英（彭义尧之妻）、陈邦英（“黄姑娘”的三儿媳）、陈大贵（村长）、李朝富（当年的民兵）等人

的口中详细了解到了“黄姑娘”的一生。

“黄姑娘”叫黄世英，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5岁那年，她被卖到彭家大院当丫头。十多年后，黄姑娘出落成一个漂亮而丰满的大姑娘。老爷彭达楠悄悄对黄姑娘施以“恩爱”，黄姑娘怀上了身孕。

怀孕被发现后，黄姑娘被拖到天井跪下，她不得不招出了老爷彭达楠。既然是老爷，人们便不好多说。家族经过协商，同意把黄姑娘作为彭达楠的小老婆，但仍需继续干丫头的活。

1949年，黄姑娘已经有了彭义尧、彭兆民、彭定国三个儿子。

土改时，男人被枪毙了，黄姑娘全家被扫地出门，住到了大院对面一个山壁下的凹洞里。几个月后的一个傍晚，黄姑娘劳动回来，几个民兵说她偷了红苕根，把她抓到彭氏古祠的高墙内。在遭受了整整一夜的折磨后，黄姑娘走完了她30多岁的人生。下面是黄姑娘大儿子彭义尧的讲述：



把她抓到彭氏古祠的高墙内

彭义尧（1936年生）：妈一夜都没回来，我们也不敢问，地主嘛，要哪个整就哪个整。我们没得吃的，最饿饭就是刚解放那几年，比后来的饥荒年都凶（可怕）。那时我们小，求不到食，天天吃野葱、折耳根、黄豆叶、豇豆叶、四季豆叶。妈哪里敢偷红苕？不整死你？

那天早上，李朝富他们在楼子上喊，叫我去把妈背回去，说她得了病。我



彭义尧：“地主嘛，要哪个整就哪个整”

跑去看，妈好像没气了，但身子还是软的，人还没有冷，还背得，硬了就背不起了。我才15岁多，又饿饭，她搭在我肩上，我半背半拖地把她弄回到壁洞。她没吭一声，也没睁眼，我想她当时可能已经死了。

是我埋的她，就埋在壁洞下面的河沟边，只有一床席子裹我妈。

哪个弄死的？那几个民兵不懂事，用钢条捅她的下身，小腹来血，遭捅死了。

几个民兵？那天晚上有四个，谭善富、李朝富、谭远余、还有一个忘了名字。现

在只有李朝富还在，就住在对面山坡上。找过他没有？找他有莫子用？

狗鸡巴你不懂阶级斗争嗦！

第二天一早，我下到埋过黄姑娘的河沟边。默默站了一会，然后从她住过的那个岩洞处攀岩上去，寻找山上李朝富的家。在半山坡上的一家农舍前，我找到了李朝富。



黄姑娘一家在土改时住的岩洞

李朝富：解放后我在共产党里头干了二、三十年，土改分果实，清匪反霸当民兵，发了步枪。那个时候积极得很，又不评工分，自觉自愿闹革命。地主解放前享福，我们受好多年的压，他那个日妈的，该杀！我们打了（彭家）几十个。我们武装队那个白（音）队长，抓的地主有个光身子，白队长说他冷，还给他衣服穿。我说，狗鸡巴你不懂阶级斗争嗦！你是个莫子武装队长？！政策都不懂，脑筋不活动，他是阶级敌人，是嘛？他剥削你，是嘛？白队长后来受处分……

我打断他，问起黄姑娘的事。李朝富高亢的声音一下子低下来，有些吞吞吐吐，几乎听不清。

李朝富：“她是害病死的，几个娃儿拖起，没得吃的……”



李朝富

问：“她死在哪里？”

李：“死在楼子头仓房里。我说把她放了，喊她娃儿来把她妈弄回去。”

问：“楼子里有几个民兵？”

李：“四个。胡云松（音）是队长，我是副队长，他们几个都死了。”

问：“你们打没打黄姑娘？”

李：“没打。黄姑娘不讨厌，她是个当丫头的人，罪恶不大。她当不到家，是大妈当家。”

（我追问没打怎么就死人了，李朝富避而不答。）

就是这样整死的

2016年8月10日，我第三次来到彭氏宗祠，在楼子里，遇到了村里70多岁的邱河法老人



我们邱家入川比彭家还早。彭家酿酒，卖酒，买土地。那时收成彭家收租40%，佃户得60%。

土改时我还小，只有几岁，大人带我去看过斗地主的大会。具体怎么整地主我不清楚，只是听说整得狠毒。黄姑娘挨了好多斗，搞“猴儿搬桩”，整得惨。

问：听说黄姑娘就是在这个楼子里整死的。

邱：是的，不仅把她强奸了，还用钢条从她下身穿进去。

问：当时有四个民兵参与，其中有李朝富你知道吗？

邱：嗯，那时有李朝富。这些历史你怎么清楚？

问：我第一次来时就听说，说用钢条捅她下身，捅出血了，是吧？

邱：嗯，就是这样整死的嘛。

问：李朝富他们把黄姑娘整死后受处分没有？

邱：那受什么处分？整死地主反而还有功。李朝富后来当了队长、社长。



彭氏大院的进门



彭氏宗祠残存的围墙

算了，莫说了

陈邦英（72岁）是黄姑娘的三儿媳。13年后我再见到她时，她已经白发苍苍。此时，黄姑娘的大儿彭义尧、二儿彭兆民、民兵邱德才、李朝富等都已不在人世。



陈：这个院子和那个楼子，是我公公的爸爸他们修的，他们三弟兄，彭伯海，彭伯英，彭伯涵共同修建的。以前这儿很大，有15个天井，一直修到后面山坡上。

问：黄姑娘是你婆婆吧？

陈：是的，她是小妈，大妈姓涂，土改向她要金子，她吓得上吊死了。

问：听说黄姑娘死在那个楼子里了。

陈：莫说，算了，说起心里难过。不想说，那个时候时代不同，没得办法。

问：黄姑娘长得可以吧？

陈：我嫁来的时候她已经死了，他们说，黄妈人材不错哟，高高大大的。

问：是不是用钢条捅她？

陈：是的。她儿子把她背回来，血淋淋的，背到那个沟下面来埋的，裹了床烂席子埋的……算了，莫说了，人走都走了。

问：她的坟后来迁到一个石壁里了？

陈：迁坟是我去的，他们成分不好，不敢去，我是贫农出身，我敢。我在土里捡她的骨头时，光着手刨，胶手套都没有。现在他们三弟兄都不在了，上坟都是我去，给黄姑娘上坟，也给大妈上坟。

问：李朝富呢？

陈：李朝富也死了，长疮烂死的，全身到处都烂。做人呐，不要去害人、整人，要讲良心。我们良心好，我的后人都可以，我的孙孙高考考了683分。



陈邦英在残破的彭家大院前讲述



陈邦英的家就在那道唯一幸存的“豪华”侧门下。她最初不要我进去，说屋里又破又脏。她提起丈夫彭定国时很伤心，说他是个人好人，又心灵手巧。但由于是地主子女，被迫去山里井下挖煤，吸了大量煤尘，肺烂了，死得很痛苦。

1976年，葬黄姑娘的那块河沟地要开发种庄稼。彭义尧几兄弟怕挨斗，不敢去迁母亲的遗骨，黄姑娘的三儿媳陈邦英仗着是贫下中农出身，扛一把锄头，挖出了黄姑娘的遗骨。彭义尧选了一处人不容易去的陡斜岩坡，在石缝里重新葬下了母亲。他说：“这个荡子(地方)要得，妨碍不到别人，不会有人来挖地。”2003年4月15日，老人带我一步一步下到了岩坡，拍下了这张照片。



采访时间：2003年3月10日，
2003年4月15、16日
2016年8月10日
地 点：云阳县里市乡黎明村彭氏庄园

采访后记

云阳著名的水下石林在三峡蓄水前被切割了；云阳刻有历代古人诗词的龙脊石被江水永远埋葬了；彭氏古祠和发生在它里面的故事呢？

十三年前，2003年3月，我第一次到彭氏庄园，偶然听说了黄姑娘的死因，当天我就决定马上进行土改调查。但是，当时有其他人在场，而我还处在“取保

候审”时期，因此只得返回。

一个月后，我独自悄悄来到彭氏庄园，开始了前后长达十余年的调查走访。可以说，是黄姑娘“促使了”这部土改采访调查录的开始。

十三年后，调查录早已完成，我开始着手制作土改纪录片，为拍摄外景，我第三次来到彭氏庄园。

十三年前，楼子里的上好木板被乡政府拆去作了它用，百年古祠在风雨中艰难地支撑；十三年后，旅游业是个来钱的行业，为此，当局派来一个施工队，要把古祠变成筑巢引凤的梧桐。

十三年前，我曾在楼子外的破房前同黄姑娘的二儿彭兆民屈膝夜谈；十三年后，彭兆民老人已然作古，他的破房前散乱着河沙水泥。

十三年前，在古祠前偶然听一个农民说起了死在里面的黄姑娘，十三年后，又在这儿偶遇邱河法老人。不出所料，老人也知道黄姑娘在楼子里的遭遇。

十三年前，我曾问彭义尧：“你们都知道是谁害死了你母亲，后来双方又在同一个生产队，天天见面，有什么感觉。”彭义尧回答：“那个时代是这样嘛，没得办法。”

十三年后，我向陈邦英问起黄姑娘的死，她反复说：“算了，莫说了，那个时候时代不同，没得办法。”

我第一次离开古祠的当晚，云阳大雨倾盆，第二次离开时烈日如火，第三次离开时，夜色苍茫。

陈邦英送我到路边，我望着她和她身后寂静的田野，不由心生感想：这片古老的土地，多么利于罪恶的生长和生存。

补记

据彭家后代和村民们说，彭氏家族五十年代被打死（含自杀）的有30多人，但是，我没能一一采访到详情，村长带我跑了好几家去找彭氏宗谱，都没找到。有些遇害者的名字，彭义尧、彭兆民老人也记不清了，以下是他们记得起的几位：

彭寿柏，与彭绍文同时被杀，死时20多岁。

彭河生，单独一个人被枪杀，年龄不详。

彭叔康，死在劳改队，死时年龄不详。

涂延桂，彭达楠的大老婆。民兵逼她交金银，她交不出，恐惧中上吊自杀。

此外，连同已知的彭达楠、彭达杞、彭达桑、彭达渠、彭达操、彭绍文、黄世英（黄姑娘）共十一人死于土改运动。

陈氏庄园，残照悲烈

——重庆市涪陵青羊镇陈氏大庄园的艺术雕刻及人物命运

在乌江与长江交汇的涪陵，有一个青羊镇，该镇曾有十个大地主庄园——统称“陈万宝庄园”。

以前有一个说法：川西刘文彩，川东陈万宝。

1949年，共产党来了……

几十年风雨掠过，血红残照里，默然回首——

人，杀了；

财产，抢了；

坟，“敞”了；

文化，毁了；

……



陈氏庄园里的残墓前，竖立的石柱雕名为“华表”，是地位、身份的象征。

陈氏家族唯一残存的庄园

在乌江与长江交汇的涪陵，有一个青羊镇，1720年，一个姓陈的人（族谱上称他为“我仁公”），携妻带子，一人一个盐蛋做菜，由贵州思南安化县入川。

他们风餐露宿，一路坎坷，来到青羊乡安镇坝的古墓台、黑箐子等处。

山川秀丽，风和云祥，我仁公一下子爱上了这片土地，于是停止漂泊，扎根耕耘。

岁月悠悠，陈氏传到了第五代“万”字辈。数十个同辈人中，出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陈万宝（1807—1876）。此君头脑精明，视野开阔，善经商，有文化，经过数十年辛勤经营，他将整个家族和产业推到一个崭新的高峰。

钱财、田土、粮食、连同传统文化、建筑艺术，齐头并进，陈氏庄园在乌江东岸光彩四射。

到1949年，陈家已发展到拥有10个大庄园，田地40余万亩，年收租谷40多万石，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子孙遍布海内外的繁华境地。



石龙井庄园残存的戏楼



十大庄园之一的大路片庄园残迹

当地有个说法：川东陈万宝，川西刘文彩。

这一年，共产党来了，枪声爆响，杀声四起！陈家的人，死的死，抓的抓，逃的逃，散的散……

地主陈一村、陈德宽、陈德厚、

陈德宣、陈世屏等人倒在血泊中；

地主陈德宗、陈希颐、陈渊明等人被抓入大牢；

……

十所豪宅大院，无论是分给农民的“果实”，还是收缴为国家的“财产”，或者是把“果实”又收回来作为国家的“财产”，没有一个完整的保存下来。

土改后，“国家”和农民没有认识到这些“果实”是珍贵的文物和精美的手工艺品，有的被火烧，有的被变卖，有的被拆毁。如新屋嘴等宅子被烧毁了；如陈昌应的宅子被粮店拆了，木料卖成了钱，守门的石象又被酒厂拆了一对……古老的家具更是被农民廉价出卖，一张雕了八仙过海的木床，20块钱就卖掉了。还有的人把做工复杂、雕刻精美、大得像一座小房似的床劈了当柴烧，说放在那里占地地方，碍手碍脚……

现在，尸骨最全的是石龙井庄园，但也只剩下残破的半壁河山。

我曾先后三次进入石龙井庄园，用目光和心灵触摸这惟一幸存的“半壁河山”。

石龙井（现称为“陈万宝庄园”）修建于1862—1874年。据记载，为修建这座庄园，300多个木石工匠用了12年时间，共耗费白银10万余两。它以前占地11亩，有房间120间，建筑总面积1万余平方米。庄园内，戏楼、天井、花园、水池、仓库、碾坊、槽坊、圈舍等一应俱全，其工艺水平、艺术手法堪称我国清代川东民居建筑的典范之作。



残存的石坝庄园一角



幸存的“半壁河山”

石龙井的整体布局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建筑讲求对称平衡的特征。不仅房屋呈对称分布，就是每一间房屋的一垛垛墙、一道道门、一扇扇窗，甚至房顶的一根根梁柱，窗前的一幅幅窗花，也都呈对

称分布。天井和花园也如此，左边是牡丹园，右边是芍药园；左边是荷花天井，右边就是菊花天井；左边有樱花园，右边就有兰桂园。陈万宝还在园子里栽种了两棵枣树和两棵枇杷树，取枇杷结子多和枣与“早”的谐音，希望自己的后辈子子孙孙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庄园后边的石壁上开凿出的两眼水井，一年四季泉水长流，旱季不枯，雨季不溢。任凭怎样取用，水位都不会降低半分。当地流行一种传说：这井底藏着两条石龙，常年累月向外吐水。这也就是“石龙井”名字的由来。



戏楼上的残雕

石龙井庄园的雕刻艺术十分精湛。

院坝前面的戏楼上，前后的屋檐上、挑梁上，四周的木栅栏上，随处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图案。尤其是戏台前的横梁上，雕镂着一出完整的戏剧故事和热闹的饮宴场景。几十个人物各具情态，人物衣饰折皱历历在目，神态动作栩栩如生。虽然岁月的风吹雨打褪去色彩，露出木头本色，但却更显古朴。

可惜，这些雕刻损毁严重，已经残破不堪。两重的八字门上，本来有着木雕的门神，文革时被人用刀削去，只剩一片凌乱的刀痕。门神常见，但多是张贴的木版年画，直接刻在门上的门神浮雕就很少见。院内的石雕也支离破碎，缺胳膊少腿，抱着小猴的母猴大多母子离散，石狮子见首不见尾，戏台上的木雕人物大半没有保住脑袋。

可它残存的雕刻依然是那么美！

天井里有几口保存相对完好的石缸，它们有的浅雕、有的浮雕、有的圆雕、有的镂空，手法不同，风格各异。芍药园天井中的云浪朵石花缸，缸沿内雕刻的狮子和犀牛，皆作盘卧之状；缸身上雕刻的六幅人物故事，都采用浮雕手法。兰桂园天井中由6个花瓶组成的石缸，则采用阴刻手法，雕刻有兰草、菊花等图案。牡丹图还刻有



后院天井中的石雕荷花缸

刘禹锡的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戏台两旁边各有一个长方形鱼缸，上面雕着蝙蝠、荷、桃等，即使布满青苔，也仍可看出雕工的细致精湛。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后院一个天井里的石雕荷叶鱼缸，花叶千姿百态：正面、反面、侧面、盛放的、含苞的、半开的，无不刻得细致入微。鱼缸里面还雕有青蛙、龟等小动物。四周还有一些石柱围绕着鱼缸，听说以前上面放着石花盆，雕得也非常美丽，后来东一个西一个被人抱走，现在上面放一些盛土的搪瓷盆子，胡乱种着一些花花草草。

鱼缸所在的天井有一个入口，两旁由两个石狮把守。和传统中凶恶的守护石狮不同，这两个狮子充满母性的温柔，它们伸着舌头，胸前都有着一个小石狮，正仰着头舔食它们舌上的食物。

以这样的形式守护鱼缸，动物植物都非常和谐宁静。

院坝和天井的石栏上，雕刻着两两相对的石狮、石猴、石麒麟，以及蟠桃、佛手、石榴等仙界珍果。它们都是在石栏上面直接雕刻出来的，与石栏组成一个珠联璧合的整体。



写满了毛主席语录的庄园得以在文革中幸存

庄园梁柱纵横、檩椽密集，大小木作结构均采用当地盛产的优质柏木。加之做工精巧、工艺考究，榫缝结合紧密牢固，虽经历百年风雨沧桑，却没有一根房梁和柱子歪斜、坍塌。

庄园内每一间屋子的窗花图案也丰富生动：有的是彩蝶、玉兔、飞鸟、奔马等动物；有的是荷花、牡丹、兰草、紫藤等植物；有的则展现春、夏、秋、冬四季意境。这些装饰，与房屋外边的大自然和谐统一。

庄园的墙基、天井、栏杆、院坝，几乎全部用青砂条石铺就，最大的石头重达10多吨。这么巨大的石头，在没有汽车和起重机的140多年前，是用什么工具运来，无人得知。

石龙井之所以逃过了文革的劫难，全靠有人在它的四壁上写满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如今，这些语录尚残留在庄园褐红色的木墙和灰白的石壁上。

由此，这个集古代建筑工艺和文化艺术于一体的古老庄园得以幸存下来，并于1987年被列为涪陵县“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1995年，涪陵一位分管文化与教育的共产党官员一声令下，这个逃过了文革浩劫的“文物保护单位”被活生生拆毁了一半！

（“文物保护”在权势面前不过是一个听人使唤的丫环。人都可以随便杀，庄园又算什么？）

陈氏家族气势不凡的十大庄园，终于只剩下了石龙井一个残破的“半壁河山”。

陈家曾有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坟茔。那是一部集儒、道、释为一体的“阴宅文化”。现在，绝大多数坟墓已被毁，其中包括巨大的陈万宝本人的坟墓。（它在“农业学大寨”时被农科所拆毁，石料等作了它用。



据说，该墓巨大，仅墓前的石坝就占地几亩，墓上的雕刻更是精美绝伦。）

残存的墓茔也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它们全部被“打开”过。（当地人叫“敞”坟——即把墓挖开，或炸开，搜寻里面的财宝。）

好在当时人们对墓上的石刻艺术和文化不感兴趣，没想到那也可以拆下来卖钱，另外，如果它碰巧又躲过了大破“四旧”的疯狂，那么，就还能看到一点祖先“阴宅文化”的文化遗痕。

很幸运，我看到了。



陈氏庄园残存的坟茔，它孤零零立在乡间杂草乱藤中，夕阳如血，孤光自照……

二声枪响，一道奇冤

——记陈氏“止庐”院主陈一村

陈一村（世哲），早年外出读书，曾就读于上海黄埔军校，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专攻法律。

在一次返乡途中，陈一村所乘坐的船被土匪抢劫，此事对他刺激很大，遂决定归隐乡间，远离尘世。他将自己居住的“朝门”庄园改名为“止庐”，并题写了一副对联和一段文言镌刻在石门上。该石门尚存，只是字迹很有些不清，全文如下：

入望皆智水仁山好诵韩公磐谷序
所载是刚经柔史堪称董子读书堂



题词（主人自题）：

庐以止名，言其静也。夫今日何日？滔滔之日也；今世何世，扰扰之世也。此而不务其静，胡以自爱？此地“止庐”建此庐，

以遂？澗之思。身静则不劳，心静则不争。林泉自适，息交绝游。虽非桃源，亦无殊于栗里。渊明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其所情景此乎。

陈一村在家乡办了一所小学“华楠学校”（抗战时期），亲自编写教材并任教，为乡村教育出钱又出力。

1951年，土改工作组将陈一村抓起来，匆匆忙忙枪杀。下面是一位当年曾当过共产党某官员警卫员的唐炳合老人的口述（青羊镇文化广播站记录）：

“……工作组的刘云户、X炳全等10余人，就令将陈一村押到四合头庄园参加了1000多人的批斗地主大会……。斗后将陈关押在四合头，第二天早上七点，先枪毙，后开（批斗）会。是石大开打第一枪，熊一开填枪。（凭此次“英勇”，熊一开当上乡长。）

……接着去陈一村家抄家，砸烂立柜，第一层是共产党的书，第二层是共产党的党旗，第三层全是共产党的书和文件资料。另外，在楼房的墙上，发现陈一村特地嵌入了几块刻有五角星的石块。工作组进一步了解，发现陈原来一直都向着共产党，向往共产主义美好明天……

讲述和资料提供者：熊中圣（44岁，青羊镇文化广播站干部）；
陈昌龄（83岁，陈氏庄园最后一个老地主）

一张年历，四条人命 ——记陈万宝庄园最后一个老地主

讲叙人：陈昌龄



“四十多年了，我一想起就伤心。”

在涪陵青羊镇外约一公里的地方，从公路下去，沿一条田间小路，拐几道山弯，来到一个小村子。

村子很小，只有三、四户人家。经人指点，我在村另一头的一间平房里看到了他。

不需询问，一眼便认定是他了。

老人戴着一副眼镜，穿一件干干净净的白衬衣，从里间的灶房走出来。

四周一切都是地道的农村特色：柴火、猪圈、粪池、菜地，但老人斯文清秀，一副老年学者的儒雅像，与周围环境形成反差。

陡然见到陌生人，老人一怔，随即很礼貌地把我们请进屋。

屋子很小，分里外两间，里面是灶房，外面是卧室，屋子没有天花板，也没有窗户，抬头便见到屋瓦。

有人来看他，老人很兴奋，连忙给我们端凳子。问起往事，老人一下子变得很沉重，但终于断断续续讲出了他和他一家的遭遇。

我不想提以前的事，前不久，镇上的干部叫我写点回忆（陈万宝庄园现在有些名气，当地领导想搞旅游开发）。我不写，想起过去的事就伤心。人老了，不愿太伤心。

我给你说说，有些话你不要记。

我们陈家是个大家族，你看看这两本族谱就清楚了。家族很重视教育，子女都要送去读书。解放前一年，我在成都光华大学读书，学的是经济。1948年12月28日，我在重庆同董筱兰（1927.6.4—1960.1）结了婚，她是成都双流县人，高中毕业。结婚时我26岁，她21岁。

婚后我同妻子回老家拜见母亲，本想下半年返回成都继续学业，不料家里出了一些事，母亲要我留下来处理。这一耽误就遇到解放。共产党、解放军来了，我被划为地主。他们把我抓去关了七天，但没有杀我。这可能同我一直在外读书有关。后来，1956年到1959年，还让我当了三年小学代课教师。

1959年，突然给我加了三条罪名，一是砍伐森林，二是大鸣大放攻击党，三是……你看，想不起来了。总之，三条都是不实之词，很荒唐的。比如砍树是队里批了派我去砍的。他们把我捆绑起来，押到龙潭去批斗，并根据这三条，判了我二年管制。

紧接着就是那场大饥荒了！那个饿呀……我们当地主的就更惨，全家10个月没吃一粒米……我人饿变了形，皮包骨，路都走不动仍然强迫我出工劳动，我说我没得力，那个武装（即民兵）抓起耙子劈头盖脑就是一顿打。我看那阵势，不逃肯定要死在这儿。于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同我的一个亲戚，他身体还比较强壮，连夜往涪陵逃。

那一路上刻骨铭心！到处都是死人！那些死人都没有衣服，衣服被活人扒走了。当时我就想起孟子见梁惠王时说的话“民有饥色，路有饿殍”。

哪个不死人嘛，那些年，从生产队起，大队、公社、区、县，层层往上虚报产量，不多报不行，要挨整。

天要亮时我们逃到蒲江，那儿有我一个亲戚，他给我吃了两个红苕。第二天到涪陵，从涪陵乘船到重庆。



陈昌龄的卧室、厨房以及门外一个没有养猪的猪圈，这便是这个陈氏大庄园最后一个老地主的全部家产。

重庆的亲戚看到我那副模样，很是吃惊，他们听宣传，以为农村好得很，我去了，是个样板。亲戚给了我一块钱，我坐车去了井口，我有个亲戚在那儿当农场的场长。他收留了我，给我一口饭吃。大约半年后，我接到信，说我妻子董筱兰饿死了。我慌忙往家赶，但还没到家，就被抓起来，说我是盲流，抓去干义务劳动。

我一边干活一边申请，请求回家照看三个孩子。后来，终于批准我回家。

我走到上面那个坎子边时，遇到队里的一个人，他冲我说：“陈昌龄，你还回来啥子嘛，你一屋人都死完了。”

我身子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

（老人哽咽，说不下去。）

邻居说，她们饿得受不了，捡沟沟里的菜叶子吃。先是三岁的么女饿死，她妈妈埋的她。接下来就是妻子饿死，邻居埋的她。再接下来是二女饿死，她姐姐扛着锄头去埋她，大女还不到十岁，她去埋六岁的妹妹……

（老人再一次说不下去）

最后轮到我大女了，我叫她么么，她读书成绩最好，非常聪明。那时办了医院，他们把么么送到医院，她死在那儿。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一想起就伤心，不想提。我当年写了几句话，几十年了我还背得，背给你听听：

五九年，灾祸临
瘟疫祸及各家门
妻埋女，甚伤情
从此永别幼女生
邻葬妻，叹可惜
两女哀哀无母依
次女死，长女葬
荷锄埋妹尽胞情
长女逝，整10龄
邻里皆叹这家人
妻女逝，我幸存
人亡家破何欲生
人亡家破何欲生



我想死了，不活了。

老人背到最后一句时，声音异常沉重地补充说：“我都不想死了，不活了。那时无所谓，死就死。我们那个集体食堂，120多人吃饭，饿死了80多人。”

但是老人活下来了，孤身一人到现在。问起他后来为什么不找个伴，老人回答说：有人给我介绍了黄家的一个女人。黄家是一个大家，有18口人，饥荒年之后只剩下4口，黄亚香（音）、XXX、XXX、XXX（未能记下名字）。那个女人的丈夫进了劳改队，死在里面。我没有同意，主要是她没文化，我希望妻子有文化。

改革开放后，给我摘掉了地主的帽子，但没给我安排工作，本来我是大学生，最适合搞教育，但他们说我58岁了，干不了几年，就要成为国家的包袱。这样，我只好在家里养鸡。60岁那年，我外出打工，到重庆一个亲戚办的小厂里搞财会。



“解放”五十多年来，党的光辉第一次照到了陈昌龄的家——一张2005年的年历。五十多年来，“一张年历，四条人命”。

没干多久，厂效益不好，办不下去，我又回来了。现在我是村里的“五保户”（即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区里每月只发给我80元钱。这点钱很紧，因为我连柴火都得花钱请人搬。现在眼睛又出了毛病，白内障，看不清东西，去年7月1日摔了一跤，现在都没好……

对了，今年2月1日春节前，镇里面有几位领导来看了我，给我送了张日历来，这是几十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采访时间：2005年4月27日

地点：重庆市涪陵区青羊镇安镇四社

采访后记

去寻陈昌龄的路上，我慌慌张张，躲躲闪闪。两年前，我主编的《中华手工》杂志上刊登过一篇关于陈万宝庄园的文章，那上面面对当地乡政府颇有不恭之词。这次又来，自然是“不受欢迎的人”。在镇上，我为求资料同个别人有了接触，消息传出，有关部门的领导反应强烈，“个别人”叫我赶快走人，于是我落慌而逃。

不幸的是，我因此失去了采访被枪毙地主陈世哲儿子陈立群的机会；幸运的是，有关部门和人员没有追上来，使我得以在镇外几里路的乡下采访到了陈氏庄园最后一个老地主。

离开陈昌龄时我心神不定浑身无力，那条通往公路的山道显得十分漫长。脑海里幽灵般地浮现出母亲埋葬三岁女儿，姐姐埋葬六岁妹妹的情景。万般无奈中，突发奇想——把这几个名字镌刻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纪念堂上吧，她们是：

董筱兰，母，饿死，1960年，33岁

陈小三，女，饿死，1959年，3岁

陈素敏，女，饿死，1960年，6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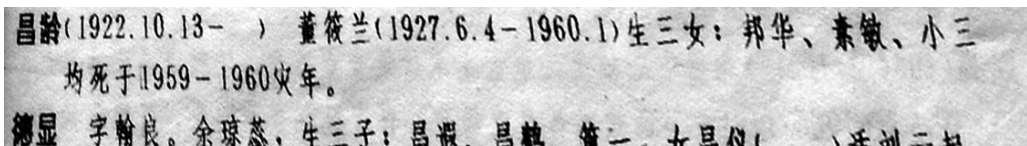
陈邦华，女，饿死，1960年，10岁

地点是重庆市涪陵区青羊镇安镇四社。

并且，请陈邦华在另一个世界里，告诉那位“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她埋葬她妹妹时的心情，以及目睹母亲饿死时的感受……



谭松在陈氏庄园采访



此为陈氏族谱第43页上关于陈昌龄妻女死亡的记载

补记:

采访了陈昌龄后,我便同他保持了联系,并每月给他寄一笔生活费。可惜,一年多后我又一次失业,又一次漂泊在外,因此失去了同他的联系也没再去看他。

2016年8月,为制作纪录片《血红的土地》,我到青羊镇拍外景,我专程去了陈昌龄的村子,期望他还活着。

可是,他已经在七年前(2009年)去世了。

我站在八月的烈日下,心中一阵阵的悲凉。这位孤寡老人,是怎样度过他人生最后的日子呢?

我更感到内疚!

他每次收到我寄的钱,都要走到街上去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后来我突然不寄了,也没给他说明原因,自己就默默地消失了。还有,我感觉到他在孤寂中,特别想同我交谈,可是,我采访后再没去看过他。

很多事,一旦过去,就永远过去,再也无法弥补了。

我站在他遭受苦难和他妻女遇难的山坡上,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让千千万万的人,看到他的讲述。



当年一别,便是永别



陈昌龄家门前的田地,远处,就是陈万宝庄园

共产党，你看不清楚

讲述人：陈德孚

陈万宝第四代子孙，84岁



我是陈万宝的第四代子孙。陈家的辈数是20个字：我章兴字万、荣华世德昌、邦国安定远、朝廷文字光。

陈万宝是万字辈，他入川后，第一辈分了两房，第二辈分了三房，我爷爷就是第三房，也是么房。共产党搞土改前，我们这一房算得上陈氏家族的首富，新屋嘴就是我们家的庄园。

我们家族共有十大庄园，分别叫戴家堰、石龙井、四合头、李家湾、老寨、唐坎、朝门、新屋嘴、石坝、大路片。

我爸爸这一房在新屋嘴庄园。

新屋嘴庄园以前气派得很，大门两边建了两个亭子，中间是一条龙，两边有两个老头在钓鱼，还有很多雕塑，现在全部毁完了，



只剩下大门处这一坡石阶



残存的李家庄园

只剩下大门处这一坡石阶。以前我们这儿环境美得很，青山绿水，到处是树木，那边一片全部是柏树，我们新屋嘴这一片全部是松林，朝门那边全部是杪树。鸟也多，到处是白鹭，像这个季节，各种各样的鸟，天空中密密麻麻的，还有鸱从天上冲下来抓小鸟，观看起来精彩得很。如果环境不毁，庄园不毁，现在搞旅游是个好地方。

土改来了，我爸爸陈建侯是大地主，他先被关押，保释出来后又被抓走，最后被枪毙，他死时才39岁。当时我也吓倒了，我跑出去躲了，否则——难说！

我妈被抓到太平、新龙等地去斗了几十天，但

她没有吃太大的苦，一是她历来就是个行善的人，周围群众都清楚，对她没得一点恨，也正因为如此，没把我们赶到烂草棚去住。二是我们家的金银早在土改之前就被驻在我们这儿的解放军搜去了，这事大家都知道，所以土改时没有追逼她金银。

除了我爸，我记得还杀了陈克益（音）、陈文昭、陈德厚。对了，还有陈一村。陈一村是我么爸，他从黄埔军校毕业，这次我到广州专门去查了，黄埔军校有他的名字。抗战时期他领头创办了华楠学园，第一年就在我们新屋嘴庄园办学，后来把庙子里的菩萨搬出来，就在庙子里办学。当年我就在华楠学园读书。那时拿得起学费就拿，拿不起就免费，不择贫富，任何人的子女都能入学。



石龙井庄园

除了地主，我们这儿还杀了一个叫杨茂青的人。

杨茂青是个穿“半截鞋”（痞子型）的人，共产党利用他，给他封一个“剿匪主任”。他要抽鸦片，就拿鸦片给他抽。等把土匪收拾完了，就轮到他了。那天开会，他还在主席台上坐着。主持会的刘XX说：“我们这里面还有没有坏人？”其他人说：“有！”“哪一个？”“杨茂青！”这一切都是事先定好了的，马上就抓起来，好像是在第三天就把他枪毙了。他的儿子也被枪毙了。

共产党，你看不清楚。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4日

地点：涪陵青羊镇陈氏新屋嘴、李家湾

采访后记

这是我第四次到陈氏庄园，距第一次采访已经过去了13年，当年把石龙井（陈氏家族最后一个完整的庄园）拆了一半来修建的那所学校，现在又拆了。空地上，荒草萋萋。

据说，当地政府想搞旅游，投了巨资，要重新修建石龙井庄园。

我走访了几个残存的庄园：戴家院、李家湾、朝门、新屋嘴、石坝、大路片。在新屋嘴时，一位当年分地主房子的杨姓农民很热情地给我介绍他当年搬来时新

屋嘴的气派和布局。然后，他又带我去看庄园残存的碉楼。

我们沿着一条石板路往山坡上走。

在碉楼破败的底楼里，偶然遇到了84岁的陈德孚老人——土改时他们一家被“恩典”地赶到这儿居住——直到现在。

老人同那位杨姓农民一样，很热情，不仅顶着烈日去给我指看庄园遗迹，还专门带我去看李家湾庄园残存的木雕。

土改时，老人已近20岁，看到和听到的事不少，但是，当我问起当年怎么整地主时，他把头扭到一边，说：“不说那些事了，没得意思。”



一直住在破败底楼里的陈德孚



为了旅游，现在又把学校拆了

陈万宝后裔座谈会摘录

2004年11月2日上午，青羊镇文化广播站召集了由陈万宝后裔陈德树（陈万宝五世孙）、陈德钧（陈万宝五世孙）、陈昌裕（陈万宝六世孙）和陈多群等人参加的座谈会，内容是关于陈万宝庄园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意義。但在会上，其中一人讲到他祖父时有这么一段话：

“此公（他）将陈家勤俭持家，耕读为本，宽厚待人的传统传承下来，从一起吃饭不能浪费一粒饭，（到）对人讲究礼貌。此公讲话，其子孙伺立一边，学习上虽然请了家教，但还亲自考核。主要是（读）“四书五经”。对长工不打骂，不呵斥，平时省吃俭用，喝老荫茶，不抽大烟，不喝酒，不打牌，只会骨九。每年的冬腊月，讨饭的乞丐坐在马桩坝，每天施舍200—300斤大米给这些人，做

到有求必应。稍有欠收，对佃户均作让步，每年应收租 2000 多担，实收 1000 多担，同佃户基本平分。”

下面是调查到的陈氏庄园 1949 年后部分被枪杀和抓入监牢者的名单（陈昌龄提供）：

陈一村（字世哲）——1951 年被枪杀于青羊道班。

陈德宽——与陈一村同时遇难。

陈德厚（字泽环）——1950 年被枪杀

陈德宣（字问照）——1950 年被枪杀

陈世屏（字建候）——1951 年 4 月 5 日被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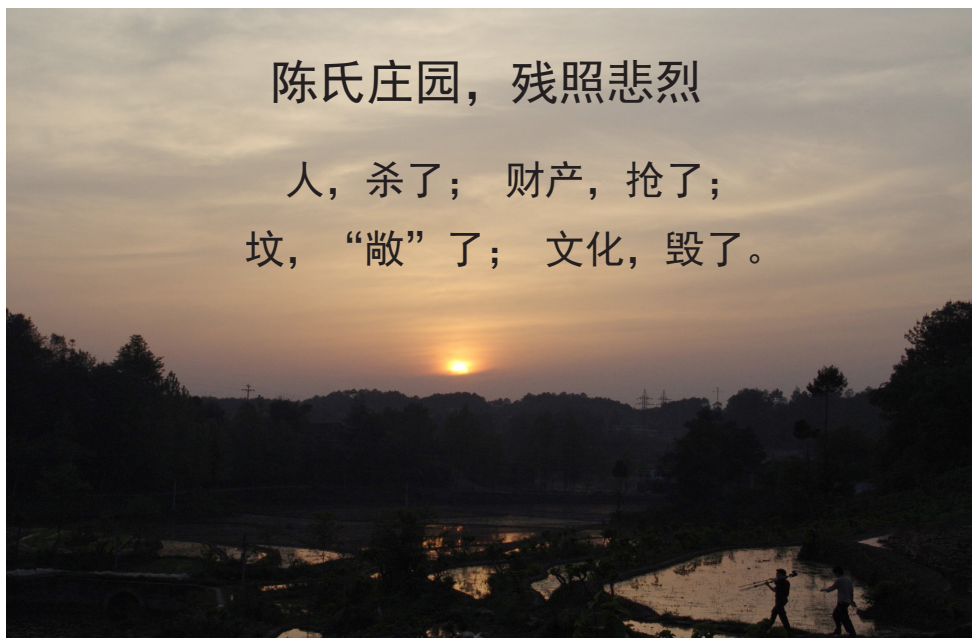
陈德宗（字秉衡）——判无期徒刑，抓入新疆劳改，后音信全无。遗有一女。

陈希颐——就读于成都光华大学，在云南昆明当过编辑，死于青海劳改地。

陈渊明——入狱劳改后再无音讯。老婆改嫁了。

陈德如——在青羊镇陪杀场，但幸免于死，几年前去世。

陈开明——陪杀场



摄于 2005 年 4 月陈氏庄园外



“焚火”之后的大水井地主庄园

在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的莽莽群山之中，有一个建于清道光 and 光绪年间的古建筑群——著名的大水井古建筑群。

2006年7月15日，我来到这个已辟为旅游景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睹了一群伤痕累累的古建筑，听到了一段血泪斑斑的土改史。

一、伤痕累累的古建筑

清乾隆26年（公元1761年），湖南岳州府（现岳阳县）人李廷龙、李廷凤兄弟由湘入川，落业在川东、鄂西交界的大水井。兄弟俩艰苦创业，发家致富；其后代读书耕田，人才辈出。到清末取消科举制度时，李氏前后五辈人共考取秀才七十多人，廪生十余人，举人一人，进士一人。这在一个偏僻的土家山乡，堪称空前壮举。至1949年，李氏家族历经了廷、祖、永、远、胜、先、宗七代人，建成了以李氏宗祠为中心，外加八个庄园的庞大建筑群，成为一方豪强。



庄园残屋

大水井古建筑群由李氏

宗祠、李亮清庄园、李盖吾庄园三部分组成。它占地2万余平方米，有房屋近300间。据说它当年“规模庞大、气势宏伟、工艺精湛、环境秀丽，为鄂渝边境古建筑之明珠。”

我先来到建筑群中的李亮清庄园。

站在公路边望去，一个中西合璧的大院落静卧在农田和苍翠的山峦之间，古旧的木板楼墙与白色的西式壁墙反差强烈，也算颇有特色，但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宏伟气势”。

从悬有“青莲美荫”仿石匾额的朝门进入庄园，眼前是一个青石铺就的200平方米的院坝，一条欧式柱廊横贯左右，连接两边的土家族吊脚楼。庄园共有24个天井，174间房屋，多为二层或三层楼房，设有大厅、套房、客厅、小姐房、账房、仓房、缝纫房、工匠房、磨坊等。据说，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走马转角楼”、“一柱六梁”、“一柱九梁”的建筑格局，所有建筑没用一颗铁钉，全部采用的木骨架，按“风水”、“八卦”及地理条件，环环相扣，互相依托。

然而此刻，这颗“明珠”已破败不堪，以至毫无“明珠”的感觉。乳白如玉的仿石匾额“青莲美荫”在1949年后受到破坏，被刷上石灰，周围的装饰全部被毁。当年小姐的绣楼歪歪斜斜，爬上去，已有楼板塌陷之忧；170多间房屋，大



李亮清庄园大门



李亮清庄园

多残败破损。一间门窗均有雕花的“雅间”不知被何人长期用作厨房，那曾经精美的木雕工艺被浓浓的黑烟和油烟熏染得不忍卒读。庄园前的牌坊被拆除，屋内家具、古玩无一幸存，李廷龙的墓碑被打碎成三段，《魁山堂记》匾额被锯成几块，用来垫粮店的磅秤……庄园“精雕细刻的柱础，玲珑剔透的窗棂，造型奇异的廊柱，曲径通幽的走廊，精致豪华的陈设”如果不是为招徕游客的华美之词，则一定是庄园往日的辉煌。

在庄园的主殿里，摆放着一些老式桌椅、床、窗棂、门扇、楹联、牌匾，其中大多破损残缺。据介绍，这是为了“发展旅游经济”，从四周农民家里收购来的。半个世纪前，“翻身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撵走了，或者杀死了（详见后面“血泪斑斑的土改史”）庄园的主人——地主，住进了这座豪宅，他们只住不修，又随地取材，庄园日渐衰败。待“文革”的革命烈火熊熊烧来，大量精美的石雕、木雕被铲除，牌坊、凉亭被拆除，书籍字画被焚毁，这颗从清朝中期就开始打造的“明珠”终于气息奄奄，神韵尽失。

李氏宗祠距李亮清庄园200米，建于1846年，这是一个小城堡式的建筑，城墙长约400米，高8米，厚3米，墙梯依山势逐级升高，角梯皆为整块巨石建成，依次布设枪炮孔108个，严密地封锁着所有的通道，可谓壁垒森严。祠堂正面东侧有口小井，周围也用巨石砌起了高高的围墙，围墙正面刻有“大水井”三字，这也正是大水井名字的来历。

宗祠的建筑模式模仿成都文殊院，主体是三大殿（前殿、拜殿、正殿——即“祖宗殿”），四排厢房，有6个天井、60多间房屋。三大殿是教化族人、祭祀祖先，商讨族务的活动中心。



李氏宗祠大殿

同李亮清庄园一样，宗祠也是满目残败破损，正门旁还残留着文革时的狂热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步入三大殿，空空荡荡唯有柱梁兀立，往日各殿拥有的许多朱底金字楹联、匾额，大多不见踪影。唯拜殿中堂的一副木刻楹联虽被岁月洗得惨白，但字迹还依稀可辨：“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还有，拜殿的屏风墙上分别墨书着斗大的“忍”、“耐”二字，下面分别设置了“廉泉井”和“让水池”，喻示家族的清廉礼让。与祠堂内其它破败不堪的建筑相比，三大殿还保存了一个颇有气势的大架子，可以让人想象它当年的风韵和气派，尤其是残留在檐柱间的十余个扇形穿插枋，其雕刻十分精美，透射出浓郁的文化和艺术美感。厢房的破损更为严重，看上去也更凄荒，那一个个沉于房基之下的天井十分独特，配上两头的雕花窗棂和头顶上的屋檐，别有一番韵味，可惜天井里荒草萋萋野藤蔓蔓，消解了它应有的儒雅灵秀。

为了开发旅游，一个修复李家宗祠的工程队已经进驻祠堂，一群民工正在大殿里敲打搅拌。地上，堆着一排排十分粗糙的石木雕刻——一看就是那种缺少

文化更缺少敬虔的“批量产品”。

为“旅游经济”而修复的古建筑还会有那种传统文化的古韵和玲珑剔透的工艺吗？

李盖五是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他的庄园座落在群山环抱的高仰台，由于距离较远且天色已晚，因此未去探望。据说他的庄园占地2000余平方米，有房屋40余间，其建筑特色，雕刻工艺丝毫不亚于与之遥相对应的大水井。



残留在檐柱间的扇形木雕

二、血泪斑斑的土改史

1949年，共产党来了！

李氏家族的辉煌轰然崩塌，满箱的契约焚毁了；所有的财产收缴了；整屋的书籍烧成了肥田的纸灰；偌大的庄园被分而食之，住进了新的主人……最不幸的是那些大小地主们，他们或被杀、或被饿死、或被斗打、或被烧烤……

50多年后（2006年7月），我在利川市找到了当年的土改民兵、《大水井李氏宗祠及庄园历史写真》一书的作者向贤早先生，聆听了一段血泪斑斑的家族史。

讲述人：向贤早

土改时大水井农会干事和民兵
李亮清家佃户，1933年生

我的曾祖父曾经担任过大水井李氏家族的帐房，他给我讲了不少关于李氏家族的事，我自小与李亮清家的小姐少爷很熟悉。土改时我在农会作干事，也是民兵，做了一些工作，如在龙门没收大小地主的五大财产，参加斗地主等。



李亮清后人的命运

李亮清是个能干人，家业在他手里一步步发达，拥有了4000多亩田地，还在奉节城买了一个绸缎铺，在云阳买了两个盐井。当时，李亮清庄园里每天有近百人进餐。李亮清活得不长，只活了56岁，在解放前一年，1948年去世了。（幸亏去世了！）

说一下解放后他子女的遭遇吧。

李亮清共有三个儿子，九个女儿。他的大儿叫李蔚廷，他是挨的第一炮（枪），就在大水井操坝打的。问他有没得金银，他说没得了，我修房子，用完了。罚他的款，他交不出来，就把他枪毙了。

打李亮清的大儿媳妇刘温贤（也就是李蔚廷的老婆）我也是亲眼见到的。先是呼口号：“打倒刘温贤”、“刘温贤老妖精”、“砍倒大树有柴烧”等等。然后把她拉出来，把衣服裤子全部扒光，一丝不挂，人们涌上去一阵痛打，就在李家祠堂前打的，打得惨，但是没有打死，好半天她还睡在地上“呼噜”“呼噜”地哼。后来刘温贤被枪毙了。

李亮清的二儿叫李次候，解放后他逃走了，他2000年才去世。但是他留在乡下的老婆彭吉征受了很多罪，待会我给你讲。

（注：田赤、方国剑、孙孺著的《大水井古建筑群》一书中说，李次候毕业

于国民党中央大学，曾在重庆渣滓洞主管无线电通信，解放后坐过一段时间的监牢，出狱后到新疆的一个电台工作。李次候的儿子李宗农讲了他父亲的经历，见后面“大水井，我所知道的故事”一文。）

李亮清的三儿李询尧还是个学生，他被吊起来逼问金银，他受不了刑，就说有金银，埋在哪儿哪儿，明天一早带他们去挖。实际上他没有金银，第二天过不了关。夜里他翻墙逃跑，民兵发现了在后面紧追，李询尧从楼上摔下去，头摔在石板上，当场摔死了。

李亮清的女儿也被弄来斗。八小姐李先信被吊在中梁上追问金银，正



夕阳下的李亮清庄园

在这时奉节县的杨县长来了，他说：“你们不斗当家的斗学生？（八小姐）这种人应当把她瓦解过来。”这下才免了他女儿们的罪。

李亮清的坟被挖开，他衣服还是好的，头上有个顶子，外面抹了点金，剖开里面是木渣渣。

农民斗地主还是积极，一是想当干部，二是想分地主的财产，三是斗倒地主不交租。当时还有一个“焚约大会”，所有地主、农民都来，那真是热火朝天。会场上挂着标语：“要回农民的血汗”。地主装文约（契约）的箱子全部端来，农会主席一个一个地问：“你是不是地主？”他问到杨田坝的地主李银州（音）时，李很有礼节，他双膝跪下说：“我家有500石租，算个老大地主。”农会主席说：“那就把你的文约拿出来。”

李从箱中取出文约，有一尺多厚。

李亮清的文约有三箱子，是他家小姐拿出来的。当天当众烧毁地主所有的文约，烧得满坝子都是香味！为啥？文约上盖得有政府的印章，那印泥里掺得有银珠和香片，所以烧起来香味扑鼻。

土改时折磨地主的刑罚多得很，我亲眼见到的有这些：

一、吊半边猪——把一只手和一只脚捆在一起吊起来。

二、抬穿心杠子——把手脚捆起来，用杠子从中间穿过去，抬起来摇晃。

三、骑洋马儿——用两个长板凳一正一反重迭，将受刑人的两个大拇指夹在两个板凳中间，受刑者坐在板凳上压自己的拇指。

四、吊鸭儿凫水——将人反捆起来悬空吊。



五、猴儿扳桩——将两个大拇指用麻绳紧紧捆在一根木棍上，木棍中间破开，强行嵌入一个木楔子，然后用锤子将木楔往下砸。

六、挂尿桶加纸木灰——把半桶尿挂在受刑人颈子上悬在胸前，受刑人头啄（垂）下来脸冲着尿桶，然后把一大堆烧过的纸木灰猛地一下倾入尿桶中，纸木灰“轰”地一声冲起来扑得地主满嘴满脸。

七、喂羊屎——羊屎干了看上去就象鸦片颗粒，把羊屎塞入地主嘴里，强迫地主吃下去——专门整吃过鸦片的地主。

但是，我见过的最惨的刑罚我叫不出名字。

那一天逼地主李亮清的二儿媳彭吉征交出金银，彭吉征交不出来，那个民兵把四块砖头烧红了，把彭吉征衣服扒了，强迫她双膝跪在两块烫砖上，双手撑在两块砖头上，象狗一样趴跪着。然后把一盆火笼——里面烧的炭火——放到彭吉征的乳房和肚皮上。我在旁边亲眼见到，烤得那个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吊鸭儿鬼水

人人都是父母所生。我不是地主，我不怕人说我包庇她，我转身就出去找李金斗，他是区长。我对他说：“遭了也，今天有个地主恐怕要死在那个火坑上，已经烤得滴油了。”

李金斗走进彭吉征受刑的屋子，叫民兵都出去，然后把彭吉征拉起来，问她：“你到底还有没有金银？”彭吉征说：“没得了呀，修了房子，又买了地，没得

了呀。”李金斗给她一家人开了一担谷子的条子，把她们弄到李子坳去劳动，彭吉征这才捡了条命。今年三月她家八妹还对我说：“伤透了心哟，晚上跟她睡觉，她喔火连天地惨叫，一个肚子烂得糊了了（血肉模糊）的，奶子都烂落完了。”



彭吉征几年前在奉节去世了，烤她的那个民兵还在，叫许定胜（音）。

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的命运

李氏家族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李盖五，他是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

民国时期，连年战乱，各种各样的武装、土匪兴风作浪，到处烧、杀、抢、掠，老百姓苦不堪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川、鄂两省边境上就有势力较大的匪帮贺国祥和利川境内的“神兵”等。这些兵匪们杀人放火，为非作歹，老百姓深恶痛绝。

李盖五出生于望族书香门第，很有才华，他能言善辩，生性胆大。他同贺国祥、同“神兵”交战，也打其它土匪，打出了威风，土匪们一般不敢骚扰大水井，因此，可以说李盖五保了一方平安。李盖五1930年当了奉节四区区长，1935年当了奉节县团务委员长。（注：当时大水井所在的柏杨镇属于奉节县，1953年才划归湖北利川。）

（《大水井古建筑群》书中说：末代族长李盖五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其经历之曲折，是小说家也难于想象的。由于李盖五是开明绅士，解放后又主动交

出财产，因此进驻大水井的工作队领导汪华源、李金斗很快与李盖五交上朋友。))

解放后，李盖五很为共产党做了几件大事。

1950年2月10日，奉节县甲高乡的大地主王学初联络奉节江南各乡，还有云阳、利川各乡的反动头目，策划反革命暴乱。3月12日，甲高乡倒龙湾最先暴乱，仅仅4天就蔓延到



十年后，2016年，我重返大水井，拍下李盖五庄园大

江南的19个乡，人数达到3000多人，他们杀了奉节县副县长韩广民等干部6人。3月16日，他们与李氏家族的李汶州等取得联系，指使李汶州去给李盖五作工作，邀请李盖五出来领头。李盖五深明大义，大骂李汶州：“胡闹！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你这几个人，几条土枪成得了事？！”

李汶州等人走后，李盖五将他们的阴谋报告了中共柏杨区委书记王书琴。区委先下手为强，立即调动部队，将准备暴乱的分子一网打尽，使当地又避免了一场劫难。

后来江南暴乱的土匪也被肃清，王学初被抓住后枪毙。

李盖五还救过共产党的韩副县长。那是1950年，韩副县长、李盖五一行四人由吐祥乡去奉节开会。



庇护了李氏家族的坚固城墙，没挡住土改的腥风血雨

走到亮风台时，突然从山上冲下来一群土匪，为首的大叫：“谁是韩副县长？”韩说：“我是。”李盖五赶紧向前，高声说：“我是！”只见土匪大刀一挥砍来，李盖五举刀相迎，同时大声吼道：“你们是猪的槽头血作痒，想找



为发展旅游，花了几百万人民币修复的李盖五庄园，

死？！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你们赶快回去搞生产。不要胡闹。这是共产党的干部，给你们穷人办好事的干部。”

土匪们听了他的话，一个一个的溜了。

李盖五不仅帮共产党，还同共产党的土改干部联姻。他作媒把他叔伯兄弟李汶州的女儿李先兴嫁给李金斗。李金斗是从山东来的干部，在我们那儿

当区长，他来了之后，把他老婆离了，另娶了李汶州的女儿。

李盖五为什么作这个媒？他想结交共产党的区长，保大水井的清宁平安。由于李盖五有功于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打算免他的死，于是把他弄到奉节的安坪乡去帮助搞土改，算是躲起来，避开家乡的清匪反霸斗地主。但是，李盖五名声太大，大水井农会（主席叫王道玉）说李盖五是大地主，非要把他弄回来斗。他们三次向奉节县政府要人。共产党虽然想免他的死，但又不愿受到群众反对，于是就把他交了出来。不过他们要求：一、不得捆绑吊打；二、不准枪毙。

李盖五被押回来后，关在他家的一个粮仓里，没有枪毙他，但是，七天七夜不给他饭吃！他饿得把残留在碓子（一种舂米的用具）里的一点生包谷米都抠出来吃光了，没水喝，渴得喝自己的尿。

在临死的那天凌晨，他悄悄把仓板拆下来，探出去拖看押他的民兵的枪。民兵惊醒了，问他：“你拖枪干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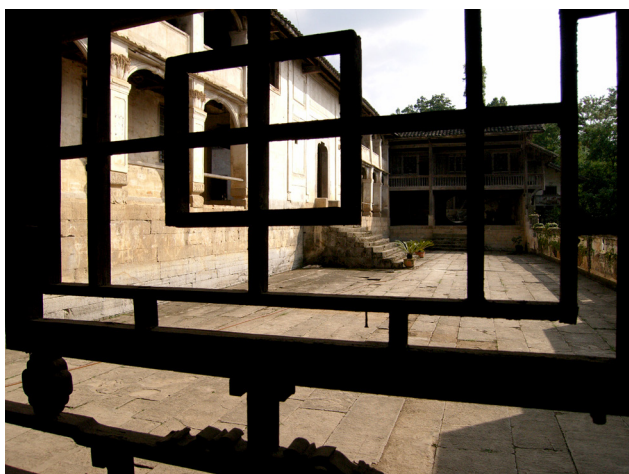
李说：“我……我拖枪打人。”

“你打哪个？”

“我……我看得起哪个打哪个。你们这……这些家伙，不是老子保一方平安，要撵得你们鸡飞狗走。老子死……死了之后，也要在鬼门关等……等你们。”

李盖五说完就死了。

民兵汇报上去，农会中有



阳光洒在已作为旅游景点的李亮清庄园

信迷信的，感到害怕，于是决定焚尸。他们用桐油、菜油，就在他庄院门口，架起干柴烧，最后整个人烧得只剩下碗大一块，丢在庄院后的水沟里。所以后来他儿子李先伟（音）清明回来扫墓，只有在水沟边挂青（即祭祀）。

共产党区长李金斗的命运

李金斗是区长，权力很大，审判地主他当庭长坐在前头，两边各坐一个陪审员，地主跪成一排，要杀哪一个就喊某某人入庭，入庭后只有几句话就完事。枪毙李蔚廷时，李金斗就是这么几句话：“农民弟兄们，大斗、小斗、加紧斗、使劲斗。斗不出来，交给我们法庭，判他的罪，杀他的头！”接着把李蔚廷抓来问：

“你当乡长，抓了多少壮丁？揪了多少人下龙桥河？”我记得李蔚廷还答了两句：“我没有揪人下龙桥河呀。”

后来要枪毙李汶州，也就是他的岳父，专门叫李金斗去执行。政府要观察他，看他是不是同地主睡一头。那时，

哪怕你是区长县长，只要同情地主就要遭撤职。审判枪毙李汶州那天我在场，李金斗问：“你当乡长，派款子、抓壮丁，杀害了多少农民？”李汶州回答：“区长（他还是喊的区长，没有提女婿），我没有杀农民。”我记得他还说：“区长，我（死后）要求弄回去埋。”

枪毙打的李汶州的脑壳，打得脑花到处散起。

印象最深的是李汶州的女儿李先兴，也就是李金斗的新婚妻子，当时也在场，她眼泪双双直往下滚。

不过最后还是同意把李汶州弄回去埋，就埋在洋沱坝。

那天只打（杀）了李汶州一个。牢里头关满了地主，就关在大院里，有几十个，要杀那个拖出来杀就是。我们这一带有48户大小地主，光收缴的铺盖就是200多床。

李沛东是龙门乡公所的调解委员，李盖五



李亮清庄园，



的弟弟，他没得一点罪恶，但是，那时是只准错杀一千，不准放走一个，于是把他也抓来杀了，就在大水井枪毙的。

李家土改被打死的地主有李鸿钧、李沛东、李汶州、李蔚廷、李沛诚等，大概近10个吧。

李汶州的儿子李炼梧（音）被抓来用烙铁在他脸上烙些疤子，第二天他满脸流脓地被抓到刑场上去陪



李氏宗祠

杀场，不过没有杀他，因为他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学生，记得当时有政策，学生娃不杀。

李金斗大义灭了亲，但并没有保住他的官职，因为他毕竟娶了地主的女儿。他老婆刚生了第一个娃儿，上面就责令他好好反省，于是他给娃儿取名“李反省”。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娃，上面把他撤了职，弄到山脚坎去当工人。他干脆给第二个娃取名“李撤职”。

补记：由于向老先生马上要动手术，八点半便开始输液，只得匆匆结束采访，李氏家庭族中一个重要人物李孟洋未能详尽了解。

采访时间：2006年7月16日

地点：湖北省利川市人民医院住院部

采访后记

2003年3月，我在三峡库区采访时就听说湖北利川有一个叫“大水井”的大地主庄园。根据经验，有地主庄园的地方，一定有土改的血腥，心里，便暗暗埋下了前去采访的愿望。但是，直到三年后我才动身前往。

可惜，我来晚了，遭受烧烤酷刑的彭吉征老人几年前去世了，再也无法倾听一个苦难女人的经历。庆幸的是，我在利川人民医院找到了向贤早老人，并赶在他动手术前采访了他。



李氏宗祠

向贤早老人记忆清晰，他不仅小时经常同庄园里的小姐少爷们一块玩耍、不仅当过土改民兵，亲身经历了整个土改，而且前些年还专程到李氏的八大庄园考查，走访了当地的老农和李氏后裔（正因为如此，他写出了《大水井——李氏宗祠及庄园历史写真》一书）。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对大水井如此复杂而厚重的历史，我没能长夜畅谈、多方了解，这肯定会遗漏许多重要情节。还有，向先生收集的不少有关李氏家族的老照片我一张也未能目睹。

眼下，也只有暂时如此了。

返回的路上，我在横跨渝鄂的七曜山上停下来。回眸望去，利川大地，山峦起伏，苍翠满目，风光十分秀美——多么让人难以离去的土地！

补记：向贤早老人于2009年去世

大水井， 我所知道的故事

讲述人：李宗农
1946年生



一，我们李家的家史

我们的家史是我偶然听我爸说的。

他从劳改农场回来后什么都不说，从不讲他过去的经历，我妈也不讲，他们不想讲过去的伤心事。1987年，有一个姓罗的人从利川来奉节找到他，说他是利川农业局的，奉命修县志，请父亲提供李氏家族的情况。那天我农活都没去干，在一旁听他讲了一整天。

我们老家在湖南岳阳一个叫洗脚河的地方，清乾隆年间，李家生活困难，听说川东一带地广人稀，几兄弟便想到川东来谋生。李家的字辈是二十个字：正世光廷祖，永远胜先宗，兴隆昌万代，国泰定英雄。进川来的是第四辈“廷”字辈。三弟兄李廷龙、李廷虎、李廷凤在来川的路上，老二李廷虎因病去世了。李廷龙和李廷凤在奉节上岸，但那时奉节县城附近已经有不少人了，两兄弟便一路讨饭，

往偏僻的大水井方向走。走到离大水井有二、三里路的龙桥时，两兄弟饿昏过去了。龙桥两边是绝壁，中间一条狭窄的山梁，那是奉节到利川的必经之道。

大水井那儿有个姓黄的小地主，那天他从那儿路过，看到两个外乡人倒在地上。他摸了



大水井取水处

一下，还有气，于是他从路边的一个小店里要来两大碗米汤，分别给他们灌下去，把两兄弟救过来。问了他们的情况后，黄地主表示愿意收留他们，让两兄弟在他家干长工。龙凤二公当然愿意。他们在黄家干活，非常勤快，除了干农活，还每天一早做豆腐到路上去卖。黄地主很喜欢他们兄弟两，黄地主夫妻没有后人，一生做善事。他说，他有一块荒地，就是现在我们李氏宗祠后那块坡地，他让两兄弟去开垦出来，归他们自己所有。两兄弟花了一年的时间把地开垦出来，还打了几十挑粮食，日子开始好起来。黄地主看两兄弟这么勤快，干脆把豆腐生意也给他们了。两兄弟干农活、做豆腐、喂猪，有了家产，各自娶了老婆，又各自生了四个儿子。龙凤二公的八个儿子，搞农业、考科举，经营、做官，把家业一步步做大，八大房分家时，李家家产已经达到 2000 多课粮食，一课是多少呢，包谷一课是五百斤，米也是五百斤、谷子是四百斤，2000 多课粮食，你说当年他们好利害！当然，李家的恩人就是那个黄地主，李家给他夫妻立了碑，后代每年都要祭拜。

李廷龙生的四个儿子是李祖德、李祖泽、李祖盛、李祖茂。其中李祖盛又生了两个儿子李永绥和李永廷，大儿李永绥就是我爷爷李亮清的爷爷。李亮清是大水井庄园 1949 年前最后的主人。



大水井外的田地

著名的李氏宗祠就是李廷龙的三儿李祖盛修建的。李祖盛年轻时考取了进士，在宜宾当知县，后来他辞官回乡，在成都看到文殊院，很感兴趣，就把那个建筑的草图画下来，回来就照那个结构修了李氏祠堂。他也是第一任族长。

我生活过的大水井庄园有 172 间房子，占地面积 10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6000 平方米；旁边的李氏祠堂占地 15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800 平方米。这两个著名的建筑群土改后没有像其他地主庄园被毁掉的原因是它们被作为乡政府、供销社、粮站，粮库。我们那个李氏宗祠就是作为粮库。现在它们是重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的旅游景点。（注：现在门票 50 元）

二，我父亲的经历

我父亲叫李次候，生于 1917 年，是李亮清的二儿。他考入国民党的军校，

学的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在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搞电报工作。第二厅属于军统系统，所以解放后就把我父亲当作军统特务。1948年，我父亲在武汉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白崇禧手下工作，也是搞电报工作。当年下半年，我爷爷李亮清去世了，那时国民党有个规定，公务人员的父母去世可以请长假一年，父亲便请假回来安葬我爷爷，同时料理我们这个大家族的家务，一直到1949年下半年，他都没回去。这时解放军打来了，他看到解放军的布告，要国民党的旧政人员主动去投诚，布告上说，主动投诚者既往不咎。当时我们大水井庄园里就有驻军，连指导员叫李金斗，他后来就是我们那个区的区长。我父亲把他的所有证件交给李金斗，交待了自己在国民党部队中干什么工作，是什么军衔（他是少校），表示自己主动投诚了。李金斗说：“好嘛，现在缺少有文化的人，你来帮着征粮。”父亲于是帮共产党征了几个月的粮。当时征粮也从地主手中“征”了不少金银，李金斗就叫我父亲把金银交到奉节县银行去，那时大水井属于奉节县。我父亲把金银交去，银行说金银的纯度不足，不收。怎么办？只有带信回柏杨坝，那时交通不便，往来要好些日子，我父亲便到李先觉家住下。李先觉是他的一个远房大伯，是我们李氏家族八大房之一洋沱坝庄园的人，他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在奉节县中学教书。

一天，突然来了两个公安局的便衣，把他押到县公安局，局长气势汹汹地责问他为什么不到公安局投诚。我爸说，他已经向区长李金斗投诚了，证件也全部交给他了。局长一时没话说，接着他把嘴一翘，对两个便衣说：“把他带去学习几天。”

父亲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直到33年后——1983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人员——他才回到奉节县。

1983年，那天，县公安局突然把我叫去，局长亲自找我谈话。他说，现在中央下了特赦令，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人员，你父亲可以回来了，你愿不愿意接受。我说，自己的父亲，怎么不愿意，但他回来怎么安置？局长说：“你在农村他就回到农村。”我想到我们在农村又苦又穷，父亲已经在劳改农场就业，虽然没自由但还有工资，因此有些犹豫。局长说，放你父亲回来，是让你一家人团聚，这是党中央的关怀。我同意后叫我填了表，寄到劳改农场，这样我父亲才回来了。他同我和我妈在奉节农村生活了十七年，但是，他从不对我讲他那33年的经历，我后来勉强了解到一点。



在劳改期间的李次候

1950年父亲被“带去学习”后就关进了奉节县看守所，在看守所，同他关在一个牢房的是大庄王家的一个乡长。那天晚上，看守所用火把将四周照得通亮，刺刀明晃晃的，每个牢房喊一个出来一个，一共有十多个。一出牢房他们就被捆绑起来，在身上插块牌子后押走了。这些人被押到奉节县老县城那个河坝，一会就传来枪声，全部枪毙了。我父亲想，下一次就轮到他了。十多天后，这一幕又上演，但是没有我爸爸，这批人也没被当场枪毙，而是被押到万县，是在万县宣判后枪毙的。

父亲在看守所一个多月后被判刑五年，押到重庆原国民党中央银行的一个金库里关押。那里关押了两百多人，全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有国民党的县长、县参议长等等。关押期间，他们每天要被押到六十里外的地方去挑盐，挑一百斤。父亲说，只一个多月，他们两百多人中就只剩下六十多个了。他说，那些人挑不动了，走慢了，士兵一枪托打来，人倒下去就起不来了。当时我父亲33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且他从小坚持锻炼，身强力壮，因此他活下来了。



晚年的李次候

五年刑满后，仍然不放他回家，又把他弄去修宝（鸡）成（都）铁路。33年，父亲一直被看管，虽然在劳改队就业，但没有自由，更不准回家。

三，我和妈妈的经历

我妈妈叫彭吉征，生于1918年，是云阳县彭氏庄园的人。彭家1949年前比李家还要兴旺。妈妈在北京读的女子中学，为什么在北京读呢，因为她的爷爷在北京做官，她就在北京生活了八年。爷爷的外号叫“彭金娃娃”，因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他给慈禧送了一个金娃娃。妈妈家的彭氏庄园现在是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在整修。彭氏庄园当年被分给农民了，已经被拆得支离破碎。

我是1946年在重庆沙坪坝出生的，是我父母唯一的孩子。当时我母亲在沙坪坝法院当记录员，相当于现在的书记员。

爷爷李亮清去世后，父母带着我一块回到大水井庄园，我们就在那儿经历了土改运动。

我妈是个非常善良忠厚的人，我们那个大家族，无论男女老少，没人对她有任何怨言。土改时为什么她遭受那样的酷刑？为了逼金银！

最先不是抓的我妈，而是我大伯的妻子刘温贤，她受刑不过，就乱咬，说我

爸爸他们几弟兄，带着我妈他们在龙桥下面埋藏了好几桶洋钱。工作队就派人下到龙桥下面去挖。那地方很不好下去，他们是用绳子吊下去的，结果掘地三尺一无所获。接下来他们就把我妈抓去追逼，我妈受的刑就是炭烤活人，烧烤她的胸脯、膝盖，就在大水井庄园里。后来向贤早告诉我，当时他看到我妈的胸脯上烧烤出一个个大水泡，他赶紧去把区长李金斗叫来，这才救了她一命。烧烤妈妈时我也在庄园里，但是我没有亲眼看到，后来妈妈也不愿给我说这件事，我只是看到她胸脯和膝盖上的伤疤。

（注：我两次问起李宗农看到他妈伤疤的情况和他的感受，侃侃而谈的老人一下子声音低沉下来，不愿多说。）

我大伯夫妇被枪毙、我三伯自杀后，大水井我们李家还剩下八口人：我和我妈、大伯的四个儿女（三儿一女），两个孀孀（即我爸爸的七妹和八妹），都是妇女和儿童。我们全部被赶出门，迁到一个叫施家槽的地方去住。施家槽离大水井有十多里，是高山上，条件很差。我们八口人，只给我们一床铺盖，冬天屋檐上结冰，晚上我们只得挤抱在一起。最痛苦是没得吃的！我们能活下来，全靠以前我们的佃户救济，他们白天不敢来，怕农会说他们同情地主，只有夜里悄悄来，把包谷、米、甚至腊肉放在屋门口，然后悄悄拍一下窗户，表示送吃的来了，让我们出来拿。佃户为什么要救我们，因为我爷爷李亮清当年对他们很好，如果天干了，佃户说交租困难，我爷爷马上就免了。佃户感恩，在最困难的日子救了我們。我妈妈也是大户人家出身，没干过农活，但她会绣花，当时农村喜欢在鞋子、围裙上绣花，我妈妈就给人绣花，换人家帮她干点农活。

1957年，爸爸刑满就业，写信来叫我同妈妈去看他，妈妈带着我离开了大水井，翻过七曜山，走了360多里路到万县，从万县我们到陕西同父亲相见，可是，仅仅过了几个月，父亲那个筑路队就要到阿坝州去修路，不准我们跟着去。没办法，我同妈妈只好回来。但是，不能再回大水井了，爸爸说，他的两个妹妹，即我的七孀和八孀已经嫁到奉节，爸爸让我们到奉节，说有亲人好照顾。这样，我同妈妈来到奉节，无法在城市落户，只好托一个亲戚帮忙在农村上了户口，这个地方就是我妈妈后来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奉节县新城乡（公社）长岭大队六生产队。



特赦后，分离几十年的夫妻团聚

我们母子在长岭的日子非常艰难。1958年我才12岁，没劳力，我妈是大小

姐出身，没干过农活，在田地里干活都是偏偏倒倒。好在我妈为人很好，非常善良，生产队照顾她，给她评（工分）五分。五分算高的了，妇女最高才六分。接下来的大饥荒，是我们这一生最苦的日子，我和妈饿得吃泡桐树叶和棉花叶，我硬是吃不下去，这些叶子猪都不吃。我的脚一直肿到大腿根，如果肿到肚子就要死，非常危险了。是八孃救了我们，当时她在新城供销社，听说我们不行了，就把我们接去吃了一顿猪肉，又给我们一些糖果。接着我考到县城初中，每月可以吃28斤粮。但可惜只读了不到一年，我就被迫回农村了，原因是大饥荒没粮食，初中六个班砍掉四个，还有我妈五个工分，自己都养不活，根本没钱供我读书，我只有回到家干农活。由于人小，只给我评两个半工分。那时，生产队一个工分多少钱？年终结算，我记得非常清楚，最低一个工分才2分3厘钱，有一年最高，一个工分也才4分9厘。

1983年爸爸回来后土地已经承包下户，但他几乎足不出户，成天找了很多旧报纸看，然后练书法，他后来成了我们奉节县很有知名度的书法家。

我父母同一年去世，2000年，父亲是1月7号，母亲是8月20号，都埋在长岭农村。

四，我大伯、三伯和族长之死

我爷爷死后，他长子李蔚廷就成了大水井一家之主，他也是我们那个乡的乡长。土改杀地主和乡、保长他原本就跑不脱，况且他还得罪了区长李金斗。李金斗一来就住在大水井庄园。最初还没有斗地主，他看上了李蔚廷最小的妹妹，即我的八孃李治平，八孃当时在万县读中学，年轻，又有文化。这事被我大伯知道了，他说：“嫁给他那个棒老二？！”（注：“棒老二”是四川土语，即“土匪”。）这话传到李金斗耳里，大伯怎么不死嘛？李金斗是区长，当时区长一句话就可以枪毙人，不需要上级批准。大伯夫妇都被枪毙了。李金斗后来还是娶了我们李家的一个姑娘李先兴，李先兴也是读过书的。李金斗在山东的原配还找来了的，李金斗给了她点钱把她打发走了。

我三伯李询尧是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1948年他从南京回来，土改时也抓他去逼金银。他们强迫三伯和他嫂嫂（我大伯娘）两人面对面跪在一个独凳上，他们两人必须紧紧相互抱着才不会摔下来。三伯觉得这是当众侮辱他，



大水井庄园里的绣楼（小姐楼）

他是有文化的大学生，感到人格受辱。当时三伯被关在大水井的那个小姐楼上，小姐楼是嬢嬢们绣花的地方，那天晚上他乘民兵不注意，从窗口跳下去自杀了。后来有人说他是夜里逃跑从楼上摔下去死的，那不是事实，我妈明确告诉我，三伯是自杀的。

李盖五是我们李家最后一任族长，关于他的死都说是饿死的。饿他饭是事实，但最后他是被烧死的。这是1987年那位修县志的人来我家了解情况时我听我母亲讲的。那位姓罗的人一直问到下午五点钟，他说，他还要到梁平去找李盖五的儿子，了解李盖五的死因。这时我妈在旁边说，他怎么死的我清楚，他最后是被放火烧死的。

1949年共产党打来时，李盖五不仅是族长，还是乡长、民团的团总，手下有一百多团丁。他主动同共产党交好，还救过工作队。

奉节吐祥镇甲高乡有个大庄王家，是奉节县的显赫家族，大庄王家有2800担包谷课，我们才1000多担，大庄王家还出过五个武举人，五个文举人。1950年，大庄王家组织了大刀会，有两千多人，把吐祥工作队的几十个人杀了，其中还包括奉节县的韩副县长。大刀会接着就来攻打大水井的工作队。李金斗的工作队当时只有十多个人，十几条枪，据说李金斗吓得抖。大庄王家本是李家的老亲，王、李两家相互通婚，但李盖五站到了共产党一边。他对李金斗说，不怕，我这儿有百多条枪，还有三挺机枪，把人和枪布置到龙桥口上去，莫说两千人，就是两万人也过不来。大刀会果然被李盖五阻拦了，他救了李金斗十多个人的命。当然，大庄王家的暴动被镇压了，听说平暴后大庄王家连小孩都被杀了。

李盖五因为救工作队有功，成了共产党的朋友，李金斗给他请功，他就到奉节县当了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



李盖五庄园

可是，有一个人一心要整他，这个人就是李盖五当年的马僮。有一次李盖五骑马时，马僮大概是没有把马弄好，他用马鞭抽了他两鞭子。土改时这位马僮当了农协会主席，他一心要整李盖五。要整他必须把他弄回大水井。他跑到奉节县去要人，县政协不给，说需要县长批，当时奉节的县长叫杨正禄。这位农协会主席又去找他。杨县长说，回去解决问题可以，但要保证他的安全，不准斗打，身

上有伤我就要找你，他是民主人士，是共产党的朋友，不是敌人。

李盖五被弄回来，没有打他，把他关在大水井我爷爷修的粮仓里，七天七夜不给他吃喝。粮仓很高，根本跑不出去。李盖五喝自己的尿，把身上棉衣里的棉花都撕来吃完了。七天了，李盖五还没有断气，那个农会主席有些慌了，他干脆把我们李家的煤油搬来，在夜里把煤油淋在粮仓的木板上。火烧起来后，他假装叫喊：“唉呀，失火了，失火了。”等到人们赶来，李盖五已经被烧死了。当时我妈就住在附近，他们都闻到煤油的气味。这是那天我亲自听我妈说的。

采访时间：2017年11月5日

地点：奉节县龙船街114号

采访后记

在2006年采访了向贤早先生后十一年，2017年，我遇到了利川出生的土家野夫，他告诉我，他有渠道找到向贤早提到的那个“八妹”。果然，他不仅得到她的联系方式，还告诉了我李宗农的住址。

我当即赶到奉节县李宗农的家。

李宗农不幸双目失明了，但他记忆极好，讲述也非常清晰流畅，感觉得到，那些往事都深深印在他脑海中。

他讲的有些情节，同向贤早有出入，比如，他三伯李询菟之死，族长李盖五之死。李询菟到底是跳楼自杀还是逃跑时摔死？李盖五究竟是饿死还是烧死？我不想去苦苦求证，因为不管怎样，他们都的确是在那场运动中死于非命。当然，李亮清二儿李次候的命运应当以李宗农的讲述为准，因为他是李次候的儿子，最了解情况。

我是在采访中才得知李宗农就是彭吉征的儿子，彭吉征在我心中已经是一个苦难的象征和同义词，她同她家族（云阳彭氏庄园）另一个受难女性黄姑娘一样，成为我一想到或提到那段历史心中就涌现的血红形象。

李宗农不愿多谈她母亲胸脯上的伤疤，也不愿谈他目睹伤疤的感受。他只是几次提到他母亲是个非常善良忠厚的人。我相信他的话，因为在四个小时的采访交谈中，在他四处摸索给我找照片的举动中，我感到了老人的善良和忠厚。

补记：李宗农老人大约在2020年去世



“世外桃源”鱼木寨

在鄂西、渝东交界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四周皆绝壁，仅一条窄道与外界相连的土家族山寨——鱼木寨。

鱼木寨位于湖北省利川市大兴乡内，占地6平方公里，居住着100多户土家山民。山寨地势险峻，四周绝壁。清嘉庆四年，在进寨仅1米宽的咽喉部建成寨楼一座，它耸立在绝壁的脊背上，两面是垂直高度达500米的悬崖。寨楼一楼把把关，万夫莫开，将寨内寨外几乎完全隔成了两个世界。相传当年土司交战，鱼木寨的险要地势令对方久攻不下。数月后守寨的马土司扔下活鱼挂在前来攻寨的谭土司帐前树上，谭土司叹道：“要攻克此寨犹如缘木求鱼。”鱼木寨因此而得名。

“世外桃源”内的艺术遗存

鱼木寨的险峻地势，不仅使它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也使它成为富豪、地主们聚财藏富，躲避战乱的一块宝地。到1949年时，这儿最大的地主是成家和向家。

在如此偏僻的山寨里，在这样一个悬崖之巅，居然遗存有精美的雕刻艺术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很让人惊奇，但想到曾经有那么多有文化的富豪、地主居住于此，又觉得十分自然。

鱼木寨的文化是刻在石碑上的。寨上雕刻墓碑始于明末，现存大型墓葬共9座。最早建成于道光十五年（1853年），多数建成于清同治、光绪年间。

地主成永高夫妇的墓是现存古墓中保存得最完整的。该墓建于清同治5年（1866年），三门二院，占地近100平方米，俨然一座宫殿。左右开侧门进入墓院，左名“自在宫”，门楣浮雕“迎亲图”，右门与左门对称，外额刻“五龙捧圣”匾额，匾中阴刻“逍



残留的墓地石雕

遥亭”，匾下是浮雕“荣归图”。正碑“窀穸宫”有4柱3层，高5.2米，底层镂空，墓主姓名、碑序、诗词等文字，掩于镂空缠枝花卉之后。碑上二层或刻忠孝故事，或刻本地风物，总数多达100余件。细看这些雕刻精致的图饰，除了上述的“迎亲图”、“荣归图”之外，还有“三国故事”、“征战”、“对奕”、“娱乐”、“仲由负米养亲”等寄托古老伦理道德的图画以及八仙人物。

为我讲解的向富之老人说，该墓之所以能躲过土改和文革的浩劫，全靠成永高的后人吸鸦片。到1949年时，成家已经败落，土地被卖光，成家的后人因此没被评为地主。既然成家现在已经属于贫下中农，就不好去毁人家祖坟。这样，整个鱼木寨保留下来了一座比较完整的墓地。

大地主向梓的墓也在同治五年落成，共修建了三年。向梓生前喜爱隐居之乐。其妻阎氏相夫教子，体恤贫苦，乡民们交口称贤。年逾古稀时，朝廷赐赠向梓九品封典，官虽小而名声显赫。向梓碑墓4柱3层，碑顶高托印绶，中嵌“皇恩宠赐”五龙捧圣匾额。碑上雕刻丰富，楹联多出川东文人之手，如：“千秋功名承雨露，一身啸傲寄烟霞。”、“数声蛙鼓传江岸，万点萤灯绕夜台。”



因祸得福得以保全的成永高夫妇墓

在鱼木寨墓碑千姿百态的石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阳刻于向梓墓碑抱厦顶板上的圆形草书“福”字。该“福”字直径1米，由凤首龙身交尾物组成。凤首张嘴扬冠，相对啼鸣，龙身相应绕动至尾部轻盈交合，其情融融。远观

是画，细看是字，亦字亦画，构图立意极为巧妙。

但是，鱼木寨最大最美的石碑和墓葬艺术已经被彻底毁灭了。

那就是地主向光松和地主向光柏的墓。

向富之详细地向我描述了两座墓的情况。

在一个空荡荡的平台上，向富之指着嵌在石板中的X型石基座说，这就是被毁掉了的向光松墓旧址。向光松的墓雕刻最精美，他是六吉堂的族长，身份显赫，故而墓室墓碑格外讲究。这座大坟整整修了十年时间，最初的石雕师傅带着徒弟来雕刻，到墓修成时，徒弟带出的徒弟已有一大帮了。整个地面全是青石砌成，严丝合缝，墓碑二丈多高，碑前有笑罗汉，四根立柱上蹲石狮，碑面上刻有二十四孝、武松打虎等图案。墓顶从两面环形向墓碑聚拢，层层增高，颇有威严气势。“我们小时候经常顺着立柱，沿碑顶一层层往上爬，爬到碑顶的平台上，看石雕的狮子和海螺，好看得很。”

被鱼木寨人称为“罐儿”的向光柏墓，则是鱼木寨墓葬艺术的顶峰。墓冢隐于地下，巨石雕砌。最独特的是建有两扇可以滑动的石门，石门以机关控制，在石槽上滑动，沉重的石门竟可象现代的铝合金门一样开合自如。整个墓室浮雕精美，金漆涂饰，一片辉煌，象一座地下宫殿。向富之老人说：“小时候，‘罐儿’是整个寨子的骄傲，谁家来了远客，一定要带去观赏。看过的人，没有不称奇的。”

文革时间，鱼木大队党支部书记蒲志权一声令下，“轰隆隆”，石倒碑裂，那些飞龙、凤凰、石狮、蝙蝠、凡人、神仙通通被打倒，那些绝美的石雕艺术连同它们所蕴含的文化连同川东民间艺人的绝技统统灰飞烟灭！

“真的是可惜呀！”向富之非常痛心地说。“拆墓的时候我在场，那么美的东西说毁就毁，每一块青石，都要用铁链子拴住，十几个年轻小伙子使劲拉才拉得动。墓顶上一块石头掉下来，把地上砸了两尺多深的一个洞……唉，要是它还在，鱼木寨怕是连世界文化遗产都申报成功了。现在鱼木寨要发展旅游，



刻在向梓墓碑上的“福”



鱼木寨内残存的将军墓

申报文化遗产，但缺少了最有价值的东西。现在老百姓提起蒲志权就骂。他一点文化意识都没有。”

（而最有文化、学贯中西的才子、向光柏墓主的后代向全怒当时正天天挨批斗，写检讨。他不仅无力保护自家的祖坟，连自身都难保——详见后面“世外桃源内的人物命运”。）



鱼木寨内残存的地主院子

鱼木寨在1949年共产党到来时，尚存清代墓葬60余座，眼下仅剩六分之一。许多雕刻精致的古墓、石碑、牌楼，或形单影只，或支离破碎，或垫了农舍的墙脚，或成了猪圈的围栏，或做了洗衣的衣槽……。

它们的主人们——那些战功赫赫的将军、自尊自荣的二品诰命、身家万贯的名商大贾，修桥补路的地主善人——当年躲进深山，指望鱼木寨的万丈绝壁能保“世外桃源”的安宁，谁会想到，有“土改风暴”劈天而降。



鱼木寨绝壁

“世外桃源”内的人物命运

讲述人：向富之
鱼木寨村民，1953年生



我们村的向全恕虽然划成地主，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收过一天租。他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后又到美国留学几年。解放前，他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据说官还不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个姓黄的国民党老兵从台湾回来，带了好多钱，说起当年，得知他是一个少尉。人们转过来问向全恕，问他当年是个什么官。他笑了笑说：“比他大得多。”对了，向全恕在村里几十年，极少谈起他当年的情况，人们只知道他与蒋经国先后同学，并且同蒋经国关系很好，蒋经国曾要他去给他当秘书。（后来我采访向的女儿向书馥，她证实了这一点，但究竟是要去当秘书还是已经是蒋经国的秘书，向书馥也不清楚。）

国民党撤离大陆时，要向全恕到台湾，但他选择留下来。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走，我与他是同辈，我叫他全恕哥。他说：“当时我想，共产党把这么大的中国都打下来了，小小一个台湾打不下来？”

正好在那个时候他奶奶去世了，他就对上司说要回乡奔丧，安葬了奶奶后再去台湾。他回到家乡后不再走了，共产党来后，他主动去交待了自己的情况，应当说算是投诚吧。但是，土改时还是把他划为地主，没有杀他，把他抓进监牢关了七年。

向全恕家虽然家大业大田土多，但向全恕并没有在家当地主，家里全部是他妻子刘达梅（音）操持。刘达梅是个非常贤惠善良的女人，佃户到她家，不管为什么事，她都招待吃饭。她还开了一个药铺，村民生了病，只要家境贫困，一律免费抓药。至于一些伤风感冒的小病，全部免费为村民医治。向全恕每次



唯一还留在鱼木寨的向家后代向书馥

回乡，都要叮嘱刘达梅，要善待佃户，善待乡民。我当时虽然还没出生，但我后来听长辈和村民说起，都说刘达梅是个大善人。对了，忘了说，我是地道的贫农后代，当年我们家穷得房子都没有，一家人住在岩洞里。



鱼木寨地主院子中残留的夫子训

土改时把刘达梅弄来斗，斗不起来，农民们对她没得一点仇恨。土改工作队发动一些不懂事的年轻娃上去打她耳光，结果那些年轻娃被他们父母一顿臭骂：“她是个莫子（什么）人你不晓得？一个大善人！上面来政策要斗地主，做个样子就是了嘛，你好耍不分就去打？！”

其实我们这儿的民风是很淳朴的，很少有打架斗殴的事发生。听老人们讲，当年地主和佃户的关系也很融洽，交不起租就算了，从来不逼。虽然土改发动农民斗地主，但村民都很温和，搞得不火，我们村也没有枪毙一个地主，刘达梅后来是病死的。

再说向全恕，他劳改回来后就呆在家里，坚决不下地劳动。他以他有痔疮为理由，拒绝出工。随便怎么说，就是不去。向全恕这个人生得高大威武，个头接近一米八，双肩宽阔，颧骨突出，双目有神，看上去很有气度。我经常想，他要是穿上军服，戴上军帽，肯定更威武。他靠什么生活？他懂医，给村民看病，抓点药。大多数时间他在家抄药书。还有，他的英文相当好，他自己写东西全部用英文，没得一个人看得懂。那时我们家没得石磨，他家有，所以我常到他家去磨面，摆谈间，觉得他很有知识，比如讲起长江这一带的地理、历史，他清楚得很。还有，他说话的方式、神态，与众不同，不紧不慢，温温和和，对，就是你说的“儒雅”。（他女儿后来告诉我，她父亲一直读书读到30来岁。）

也许是书读多了，他变得很犟，除了前面说的坚决不下地劳动，他还坚决不



鱼木寨地主院子门上的标语

喊“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文革时把他抓来斗，强迫他喊。他说：“哪里有‘万岁’？政权还是个人？秦始皇想万岁，也想他的王朝传万代，做到了？历史上哪朝哪代哪个人生存了万岁？”

斗他的人强迫他弯腰90度，成直角，他个子高大，受不了，我亲

眼看见，那个汗水大滴大滴从脸上滚下来……

后来又强迫他写检讨认罪，他写了交上去，过不了关，他们说那不是检讨，又写，还是过不了关，这事折腾了好久，后来怎么解决的我就不清楚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地富全部摘帽后向全恕总算走出家门做了点事——到5里外的大兴乡中学教英语。是上面来人找的他，当时恢复了高考，要学英语，我们这一带英语教师奇缺，所以找到他。这一次他倒是答应得爽快，可惜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只教了几年就又回了家。

向书馥：爸爸是1995年大年初一那天去世的，早上他还吃了几个汤元。他活了78岁。

采访时间：2006年7月14日

地 点：湖北省利川市大兴乡鱼木寨

采访后记

沿一条惨不忍睹的山间土路，弯弯拐拐，颠颠簸簸赶到鱼木寨，已是夕阳西沉时分。听说寨里的向富之比较了解鱼木寨的文化和历史，我便住到了他家。

看完几个墓地归来，夜幕已降临。晚饭后，同向富之坐在凉风习习的院坝里，头顶满天星光，听一个贫下中农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原本是在听唱一首控诉地主罪恶的歌中长大的，那首歌叫《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
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
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
……”

歌声凄凉、哀怨、悲凉，把“妈妈”的悲苦和地主的凶残渲染得淋漓尽致。

歌唱之后，“革命群众”（包括我们这些接受阶级教育和阶级仇恨的中小學生）一边热泪滚滚，一边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万恶的地主阶级”、“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谭松、向富之合影于鱼木寨

歌唱和口号之后，押上来几个面色惨白，魂不附体的地主（或地主子女）。被歌声和口号点燃的仇恨转化为暴力，劈头盖脑砸向那几个“落水狗”。

我亲眼目睹过歌声之后的斑斑鲜血！

我亲耳听见过口号之后的声声惨叫！

……

几十年后，我坐在山乡高高的岩顶上，听一个贫下中农讲那过去的事情。

“地主刘达梅是个大善人”、“地主向全恕温和儒雅”、“免费为农民治病”、“对佃户很和善，交不起租就算了”……

向富之的故事与“妈妈的事情”哪一个是真的呢？

向富之没有必要向一个匆匆的过客撒谎，而“党妈妈”则有太多的需要向它统治下的顺民（愚民）撒谎。

况且，“妈妈的事情”中至少有两点让人困惑：一是“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这几十年“社会主义农村”有多少“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是饿死几千万农民的日子、是被捆在乡下动弹不得的岁月、还是在“三农”问题一直严重的年代？二是“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因此只得去给地主种地，受剥削，过悲苦的日子）。那么，“妈妈”现在有土地了吗？我们那首歌一唱多年，“妈妈”的土地在哪儿呢？

听向富之讲完，已是下半夜。月亮升起来，清光无语，蛙鸣更静，徐徐的夜风越过万丈绝壁，吹来满怀的惆怅和淡淡的忧伤。



绝壁上的石梯



鱼木寨外的崇山峻岭

血红的土地

——从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财政

谭松

这是一块养育了一个古老民族，承载了一部悠远文明的土地！

它辽阔浩瀚、丰润厚重。山峦、江河、荒漠、高原；森林、牧场、草原、田野……千百年来，土地和人民，相依相存，相争相斗。

天苍野茫，铁血刀枪，演绎了多少乱石崩云惊涛裂岸的千古大戏！

1921年，一个幽灵——一个外来的幽灵——悄然降临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九十多年前，没有人预计到，弱小的它含蓄着一种中国五千年之未有的巨大能量——一种高超地利用、驾驭、强暴土地和人民的巨大能量。

几十年后，它成功了，它君临天下，成了这块土地的唯一地主和绝对主宰。

只是——不到一百年，从打出一个“新中国”的土地革命，到“一举改变两千年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再到卖地、“强拆”的土地财政，一波又一波血雨腥风，使这块古老的土地，浸透了华夏五千年未有之血红。

（一）、土地革命，夺得天下的法宝

1927年，国共分裂，两党刀枪相见。弱小的中共靠什么来招兵买马、抢夺天下？

马恩的理论太崇高太高深，一般百姓听不懂，他们看得清楚的，是土地、是财物。

那就从“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下手，以富人的钱粮，农民的生命，作为拼杀的力量，打天下的资源。

中共的土地革命最早发生在广东省海陆丰根据地。1927年11月13日，陆丰苏维埃政权通过《没收土地案》，决定没收一切土地，统一分配，实现“耕者有其田”。一时间，烧田契、斗土豪，杀地富……。到1928年1月14日止，仅海丰县即烧毁地主田契47118张，租簿58027本。到2月，海丰县没收和分配的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80%，陆丰县占40%。〔1〕

接下来便是井冈山土地革命。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

地法》，该法依然决定没收一切土地。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该法改“没收一切土地”为：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一概无任何代价地实行没收。

从《没收土地案》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理由一直都很神圣很崇高：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使贫苦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让“耕者有其田”。

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真的到来了：天上突然掉下一个大馅饼——凭空得到了别人的田地和财物。

该感谢谁？当然是“大救星”共产党。

那么，既出于感激，更出于要保住“馅饼”，当然得跟共产党走：参加红军并支援前线。

《土地革命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中写道：“土地革命使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为独立的主人。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他们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他们谋取利益的，因此积极地从事各项工作，参加红军并支援前线。……比如，在湘鄂赣根据地，从1930年9月到1931年3月，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三万多人，翻身农民以实物上缴的土地税，解决了红军的军粮问题，农民还经常以粮、肉、鸡、鸭、布、草鞋、香烟等慰劳红军。”〔2〕

把别人的土地财物抢过来，分给他人（也包括给自己），再让他人既为自己卖命拼杀，又为自己提供后勤供给，同时自己又博得杀富济贫、解放民众的美誉——土地革命，一箭数雕！

于是，弱小的中共四两拨千斤，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能量，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的，为着自己的利益战斗的。”〔3〕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据共产党说，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于是，在这特殊时期，共产党把激进的没收土地，改为了相对温和的减租减息。1942年1月28日，中共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这种权宜之计的“温和”，绝非暴力革命的共产党的本性。果然，当抗战结束，国共争斗又起之时，“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土地革命”法宝立马又被启用。

战争动员需要仇恨，为了挑起仇恨和阶级仇杀，把农民拴在中共的战车上，中共发起了“土地改革”运动。这一次来势更猛，地域更广，涉及的人口更多（近亿人）。从1946年5月4日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

土地法大纲》，中共不仅重返“没收地主所有土地”的老路，而且斗、打、关、杀更为惨烈。在解放区“朗朗的天空”下，一时暴风骤雨兼腥风血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革命史研究室主任杨奎松说：“1947年春天开始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激烈斗争中，不仅划阶级标准不清，而且乱打乱杀极其严重，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5万人被杀。”〔4〕

（中共搞土改为什么要大开杀戒，这种暴力手段对中共夺权之前的征兵、建政之后的立威等起什么作用，我将在下一章讲述。）

在1947年血流成河的土改中，双手沾血、分得土地的农民，被捆在中共的战车上，为其出生入死打天下。

1947年8月29日，新华社在《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社论中指出：现在我们是处在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之中，中国人民要以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最重要的保证之一，就是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首先是解放区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

这个“彻底解决”就是通过杀人彻底夺取地主的土地和平分土地。

中共把土地从地主手中抢来，一边分给贫农，一边发动他们打、杀地主。干了这种杀人越货的事之后，共产党告诉农民：要阻止地主们报复，要保住分到手的田地，必须彻底打倒地主的总后台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当时解放区流行的一个口号就是“保田参军”。

1946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说：“三个月的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执行得不坚决……，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都要坚决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5〕

在1947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刘少奇直截了当地说：“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6〕

所以，共产党要疾风暴雨般地搞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让得到土地的农民“保田参军”，成为共产党源源不断的兵源。

共产党能在短短的三年里，打败强大的国民党，自然有多种原因（对此，不少学者已经有成熟的研究），在这些原因中，调动（或者说绑架）千千万万农民参军打仗、踊跃支前的土地革命，是共产党夺得江山的重要原因（法宝）。

重庆市五一技校的李恩章，是当年参加了“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工作队员，他说：“在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来分给农民，告诉他们，你们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你们要保住分到手的土地，必需彻底打倒剥削阶级和他们的代表蒋介石。农民是很讲实际的呀，土地是命根子，

拚死也要保。那个参军、支前才叫踊跃！打起仗来一个个奋不顾身。……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同那些无数要保卫土地、不怕牺牲的农民士兵有极大的关系。”
(7)

在三年内战期间，仅在东北，参加共军的农民就有 160 万人，在淮海战役中，仅支前的民工就有 543 万人。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内战中鼓动如此众多的民众为他卖命，血流成河的土地革命是其“阿拉丁神灯”。

1936 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关于革命、农民及土地等问题的提问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8)

毛泽东赢得了中国，因为他和他的党用暴力的“土地革命”赢得（绑架）了农民。

（二）、土地改革，坐稳天下的绝招

1949 年，共产党以千千万万农民的生命为代价，夺得了天下。按理，天下已经是自己的了，暴风骤雨兼腥风血雨的土地革命可以休了。

可是，一场更大范围更多残暴更多血腥的土地革命开始了。

只是，这时不叫“土地革命”，而是把几年前“解放区”用的名称搬来，叫做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字面上很好理解，中国的土地制度不合理，要进行改革。

一、中共的“土改理论”，欺骗天下的谎言

1922 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苏共在会上指示中共，要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

智效民在《刘少奇与晋绥土改》一书中写道：“这次会议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解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打倒军阀，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这次会议是中共关注土地问题的开始，而后来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不过是脱胎于此罢了。”(9)

辛灏年在《以血的手段建立极权专制》一文中写道：“1927 年 11 月，苏俄派来的第三国际代表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中共上海政治扩大会议’上，就已经在‘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和‘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中，开始命

令‘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不顾惜的消灭政策，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要极端严厉地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10〕

从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中，是很难产生如阶级斗争、剥削压迫、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全人类等等一大套理论的，但有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有了苏共这个老师，有了祸害人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大地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就在所难免了。

中共借马列这个外来的“幽灵”，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游荡”，它石破天惊地诊断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中国有一个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和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史》前言中写道：“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使广大农民长期受地主阶级的残害、剥削和压迫，生活极端贫困和处于破产的境遇，这正是中国被侵略、被压迫、贫穷落后的根源……”〔11〕

“反动的封建社会”、“残暴的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土地制度”、“地主剥削是农民贫困的根源”、“消灭剥削压迫”……这些话语，既是中共宣讲了一辈子的“革命理论”，更是其拉大旗闹革命的“合法性”所在。

《中国土地改革史》前言和绪论中说：从1921年算起到1953年为止，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为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奋斗了32年。终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而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12〕

这样，中共宣称他同中国历史上打江山坐江山的农民造反不同——他站在一个道义高度——消灭剥削压迫，救民于水火。

这儿，姑且不论其“宣称”是否是其真实目的，只谈其“理论”的错误。

1，中国存在中共所说的那个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吗？

马克思以西方社会的发展为参考，划分了人类社会的五种类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共照搬这种划分，说中国也经历了这五个阶段，为了同西方保持一致，秦至清的两千多年被称为“封建社会”。

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指出，这种划分法对中国而言“有名实不符、削足适履之弊。”〔13〕

所谓封建，就是分封建制（建藩），指国王把爵位和土地（包括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封赐给他的臣属。它由“宗主”或“领主”与“封臣”之间层层分封的金字塔形结构所组成。封臣又可以再往下分封，政权、土地逐级承包，形成大贵

族——小贵族——骑士——农奴的封建结构。在这种封建关系中，封建领主既是贵族又是地主，在封邑中拥有绝对的权力——政治、经济和司法权。但这些赐封的土地只能继承不能买卖。封邑中的老百姓（农奴）没有土地所有权，不能自由迁徙，对封建领主有依附关系。贵族地主对他们则有随意处置的权力（甚至有“初夜权”）。在欧洲的封建社会中，如果国王侵犯封臣的权利，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

中国从秦到清的社会结构，是这样的“封建制度”吗？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郡县制，从此以后，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一言九鼎，“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同西方完全不同，毫无“封建”可言。还有，中共常说的一个词是“封建专制”。其实，封建和专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在欧洲的社会发展中，恰好就是用专制来克服了封建（先是英国，后是德国）。“因此，把这两个合在一块说很滑稽。”（赵林，武汉大学哲学教授）〔14〕

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经济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这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

冯天瑜教授提出，将先秦至清朝两千多年统称为“封建社会”“名”、“实”相离。因为，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土地可以买卖、转让，地主—自耕农经济占据主导；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制覆盖全社会。冯教授说，中、西的根本差别在于西欧的土地不可买卖，而中国的土地则可以自由出售。因而“地主阶级不是封建产物”。〔15〕著名民国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在《我认识了共产党》一书中说：“中国的情形（同西方）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说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16〕

中共硬搬马克思的社会划分，发展出了一个错误的封建社会和荒谬的封建地主剥削理论。于是，从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到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再到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共都强调，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同封建社会存在了两千多年，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中共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便是要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

2，农民与地主是这个“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吗？

抗战时期（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说“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17〕

《土地革命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一书写道：“地主阶级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权，可以随意打死或者处死农民。在这种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奴隶式生活。他们曾被迫举行过大小数百次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18〕

这是又一个同划分“封建社会”一样荒谬的理论。

丁弘教授在《地主经济》一文中指出：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租赁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合同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什么强制性的封建关系。〔19〕

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在《该给地主翻案》一文中说：“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并从中收取地租，这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正当的经营活动。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从中收取房租是一样的性质。〔20〕

董时进在《共产党的封建和反封建》一文中说：“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崩溃了，然而到现时中共却狂热地喊出一个‘反封建’的口号，把它当作他们革命的三大目的之一。这本来是等于无敌放矢，但是他们却创造出了一些假想的敌人。他们第一号的封建标帜便插在地主和富农的头上。他们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的，可中国的土地制度与任何民主国家的土地制度没有区别，而且中国的土地是很零碎地分散在极多数的贫富不等的人们手中。”他指出：中国的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自由买卖、自由租佃，无论什么人，只要有钱并愿意买地，同时又有人愿意卖地，就可以进行交易。买主有了土地以后，自己愿意耕种就耕种，自己不愿意耕种就租给别人经营，收取一定的租金或实物。这种租佃关系完全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任何人不能向对方提出强制性要求。因此，这种关系是一种正常的自由契约关系，而不是剥削被剥削关系。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制度与其他物品的买卖、占有、租佃，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与所谓“封建”也完全没有关系。〔21〕

中国以前自由买卖和出租土地，同现在自由买卖和出租房屋在性质上是相同的，现在是房产证，以前是田地契，都由政府收税盖章。以前出租土地也同现在出租房屋性质一样，哪里来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当然，地主群体中也有贪婪、残暴和为富不仁之人，但这占多大的比例？是不是这个阶层的主体？难道贫下中农、工人、商人、共产党人的群体中就没有这种人？

可是，中共编造了妖魔般的四大地主——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南霸天，说他们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形象，或者说，地主个个都像这种妖魔。

还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由于“地主的剥削压迫”造成的吗？从陈胜吴广到黄巾起义，从黄巢造反到太平天国，几十次农民起义是因为土地制度不合理和地主剥削吗？

学者蒋祖权在《地主，历史的冤大头》一文中说：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暴动，没有一次是地主剥削直接导致的。没有一次是因为在土地问题上和地主的矛盾激化导致的。他说，中国农民运动的三大直接诱因是：1. 天灾、瘟疫导致衣食无着。2. 官府的横征暴敛，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3. 宗教组织的趁机煽动。蒋祖权强调：历史一再证明，最后激化矛盾导致农民暴动的导火索，是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官员的胡作非为！（22）

谢幼田在《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中说：“许多农民暴动都有绅士参加，他们联合反对暴政，相依共存，指向政府，主要问题是政府官吏对老百姓的压迫问题，他们都是暴政的被压迫对象。”（23）

还有，在中共划分的“二千年封建社会”里，地主犯法与农民一样要被告官受审，这原本是历史的常识，可是，中共非要说，地主比官府还利害，“可以随意打死或者处死农民”。（这种现象倒是在中共发动的血腥土改中出现了，只是对象被颠倒——本书对此有不少真实案例的记载。）

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今天买了田地，成了地主（阶级），他便因此拥有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权，可以随意打死或者处死农民”了吗？明天他因为种种原因把田地卖了，转而租地耕种，他便因此要“在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过着极端贫困的奴隶式生活”？还有，今天他因为挣钱买了几亩地，成了地主，于是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黑五类），明天他因为种种原因把地卖了，成了贫农，于是他就成了革命所依靠的好人（红五类）？如果今天有人对一个房东说，你因此拥有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权，可以随意打死或者处死租户。”人们一定觉得他疯了。如果他对有房产的人说，你（因此）是一个坏人，对一个无房的人说，你（因此）是一个好人。人们也会觉得他疯了。

一个人拥有了土地，无论多少，也无论这个土地是怎么来的，便成了罪人，将土地出租，便被认定是剥削压迫，这就是中共的革命逻辑。

不幸的是，这种极其荒谬的“地主剥削压迫”“理论”，成为中共革命起家的“合法性”，更成为他们暴力镇压地主（包括其子女）的理由。

3，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土地制度”吗？

中共搞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者说“革命理论”），

那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极少数的地主富农手上，他们残酷地剥削农民，这便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极不合理”按中共的说法，体现在“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了极少数人手中。中共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协会议演讲中，都引用这两个百分比的“理论”作为“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的根据和理由。

这个百分比，据说是“根据广泛调查和统计资料”的结果。农业经济专家董时进在《理论的和统计的根据》一文中对这“两个百分比”提出质疑。他说，根据他研究农业问题三十多年的经验，他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统计。因为这样的所谓“广泛的调查和统计资料”，在中国是绝对没有的。原因是：这种调查是极其烦杂的工作，就连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容易做到。〔24〕他在《中国土地分配状况》一文中写道：中国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情形，从无普遍和精确的调查。比较规模稍大的抽查，当推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 16 省 163 县 175 万余户所举行的一次，兹示其结果如下：

每户所有亩数	户数百分率	亩数百分率
5 亩以下	35.61	6.21
5 亩至不满 10 亩	23.99	11.42
10 亩至不满 15 亩	13.17	10.63
15 至不满 20 亩	7.99	9.17
20 至不满 30 亩	8.22	13.17
30 至不满 50 亩	6.20	15.54
50 至不满 70 亩	2.17	8.83
70 至不满 100 亩	1.31	7.16
100 至不满 150 亩	0.72	5.71
150 至不满 200 亩	0.24	2.76
200 至不满 300 亩	0.20	3.17
300 至不满 500 亩	0.11	2.63
500 至不满 1000 亩	0.05	2.30
1000 亩以上	0.02	1.57

〔25〕

从此表可以看出，五十亩以下占了农户的 95.18%，占了土地的 66.14%；一百亩以下占了农户的 98.66%，占了土地的 82.13%。而一百亩以上只占了农户的 1.34%，土地的 17.87%，千亩以上之户数只占 0.02%，其地面则只占土地的 1.57%。

董时进说：“本表所示与共产党人所说的土地集中情形，迥乎不同。共产党不能亦不肯说出确实亩数，而只用一些‘地主’、‘富农’等空泛模糊的名词，以淆惑听闻。照此表，一千亩以上者可勉称为大地主，即使将他们的土地全部分出来，亦何济于事。”

梁漱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方进行乡村调查，他指出，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况下，有土地的人占多数。他写道：“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数人都有土地。……（郑平）全县90%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过有些人的地很少罢了。这情形正与河北定县——另一乡村工作地区——情形完全相似。定县则有《定县社会调查》一巨册，此中有关此问题之报告，据其报告，分别在不同之三个乡作调查：……结论如下：一，90%以上人家有地。二，无地者（包含不以耕种为业者）占10%。有一百亩以上者占2%，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26〕

1980年代末期，几位学者在进行农村社会文化调查时，在浙江省北部找到了一些土改时期的宝贵资料，其中就有1951年5月村民张榜公布的各户田地占有情况的原始表格。例如，在海宁县，土改前在全县范围内，有76%的土地分散在构成农村户数总数86.4%的中农和贫农手中，仅有11.6%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们调查的陈家场行政村，68%的土地分散在占总数83%的中农和贫农手中，而仅有1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27〕

这份真实的土地占有分布表格，可以让我们管中窥豹：土改前中国的土地，并不是如中共所说的“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极少数的地主富农手上。”

《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一书中说：“民国时期中国耕地若以14亿亩计算，人口以4.5亿人计算，那么人均拥有的耕地则为3.11亩……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与其他国家相比属于很低的一类。”作者列举了欧美南美等21个国家，其平均人均耕地为11.37亩。〔28〕

本书主要采写的是川东土改，那么，川东的地主平均有多少土地呢？《解放初四川土地改革及其意义》一文中披露：“土改结束后，地主每人平均从14.59亩下降为1.47亩。”这就是说，那些被说成“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下的“剥削阶级”——地主们，平均只有十几亩土地。而这个14.59亩的平均数，是全四川省的，川东地区大多是贫瘠山区，地主们的平均亩数，应当更低。〔29〕

正因为中国人多地少，绝大多数地主们也没有多少地，于是，在划地主和分土地时就乱来，把拥有土地比该村平均数多一点的中农的土地也拿来分，成汉昌说：“例如在晋绥解放区老区，在被平分的土地总量中，40%是抽动中农的，河曲、保德、兴县三县抽动中农土地的比重45%以上，还有的地区竟有高达80%以上的。”

〔30〕

中共在虚构了一个“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同时，又指出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不劳而获。

在中共造反闹革命时，中国的确存在着贫穷，也的确落后。但，这是由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残酷剥削”造成的吗？

《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一书说：“近代以来中国的耕地面积不仅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相反还表现出了停滞式下降的趋势。从1873年到1933年的60年中，中国人口增加了31%，而同一时期全国的耕地总面积仅增加了1%，从1893年到1933年的4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23%而耕地面积却没有任何增加。”〔31〕

中国的人口，从秦汉到明清2000年间，增长了约20倍，其中从汉到明一千五六百年间，中国人口无大变化，历朝人口最多时只有五、六千万，中国人口猛增始于清朝前期，前清近百年间，人口翻了一番多。乾隆五十年期间，再翻一番。以后45年间，又净增一个亿。

下面是我国古代几次重要的人口统计数字：

公元2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59594978人。

754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52880488人。

1066年（宋仁宗治平三年），2909万人（不包括边地政权人口）。

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5883万人。

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60692856人。

1741年（清高宗乾隆六年），143411559人。

1790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301487115人。

1835年（清宣宗道光十五年），401767053人。〔32〕

学者赵文林等在《中国人口史》中以研究的数字表明，在清代两百余年间，人口从明代的不足一亿猛增到四亿多（405.484，单位：百万），激增的速度前所未有。〔33〕

正是由于清朝人口猛增，导致了人均土地和人均口粮大减。吴慧先生对中国历代粮食产量进行了深入和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列出了两张表。其中一张表如下：

西汉末	人均原粮 993 斤	成品粮 597 斤
唐	人均原粮 1256 斤	成品粮 665 斤
宋	人均原粮 1159 斤	成品粮 605 斤

明	人均原粮 1118 斤	成品粮 626 斤
清中叶	人均原粮 628 斤	成品粮 350 斤

〔34〕

这张表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到清中叶，人均占有粮食数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人口迅猛增长。由于人口数量猛增，耕地面积的增加跟不上人口的增长，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农村危机的情势也越发明显了。

所以，成汉昌在《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中说：“人口与耕地数量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及农业产量的减少，是造成中国近代农村危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另外，他还指出，民国时期，农村的一个矛盾“主要是农业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结果。”〔35〕

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矛盾不是中共说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而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和生产落后的问题。其贫穷落后的原因主要也在于此，而不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董时进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

“共产党的基本理论的谬误，所根据的事实的虚假，和他们的真实意图之所在……这乃是共产党最大的错误和最大的罪恶之所在。”〔36〕

二、中共的土改暴行，震惊天下的血腥

中共在 1949 年夺得整个江山后，一下接收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三亿多民众。面对这么辽阔的国土和庞大的民众，如何尽快地立威、立权、立意（意识形态）、俘获人心？

很简单，一手杀人，一手分地！

中共在大开杀戒的镇反运动血腥未消之时，又擎起了在“老区”血腥土改的法宝。

一场疾风暴雨更是腥风血雨的土改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

董时进说：“中共所谓的土地改革，无论讲到毁灭财产数量之大，残杀人民之多，以及所造成的恐怖之普遍，都是空前无比的。”〔37〕

本书所记录的，就是这一时期无比空前的残暴和血腥。

2013 年 7 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川东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学术演讲，在讲到逼地主财产所用的酷刑时，在座的一位中大女教授受不了，当场退场。

其实，在采访和写作时，我同这位女教授的感受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不能退场，正如我在回答那位女教授“不要再讲了”时说的：“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

下面是我在演讲中谈到的部分内容：

1，川东地区地主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1949年之前，川东地区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1，祖传家业；

2，在外地做官、经商发财后回乡购买田土；

3，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这几点与陈沅森在《土改，中国传统道德崩溃的开始》一文中提到的完全一样。）

川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如地理的原因、析产制（子孙分家产）的原因等，少有良田千亩的大地主。这三种来源中，占大多数的是第三种（如本书中记录的胡永安家）。这一点正如董时进在1949年12月致毛泽东信中所说：“他们大都是一些勤俭的、安分守己的分子，他们的财产多半是由辛苦经营和节省积蓄而来。”“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

2，川东地区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

在民国时期，政府的职权没有像中共当政时那样，党管到村组。当时乡村的管理，大都是由地主乡绅来操办。他们主要起以下作用：

（1），兴办教育。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相当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

（2），兴办公益慈善事业。

当年政府在县级以下比较软弱，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上，如怜贫恤老、救济鳏寡、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

（3），调解纠纷，主持公道。

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有相当财产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此，当年地主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作用。

3, 中共的土改步骤

整个过程由中共派出土改工作队，领导土改运动。

(1) 发动群众。

工作队到农村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发动群众。这有几个步骤：第一，理论教育：剥削压迫，谁养活谁；第二，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改执行机关；第三，诉苦会、批斗会。（过程中伴随打、杀人）

前面我们谈了，中国的土地制度是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承包的，如果哪个地主收租高了，佃农可以选择不干；如果哪个地主对人刻薄，佃农也可以选择离去。因为当时的农民不像后来的人民公社共产农奴，有很大的自由度。千百年来，地主与佃农基本上是平和相处相依相存的，大体上维系了社会的平衡和平稳。如果它真的如中共宣传的（像刘文彩逼租）那样残酷血腥，它还能等到中共这个“救世主”来改变它吗？因此，千百年来，在中国广大农村，人们并没有什么剥削压迫的概念。中共要在农村进行阶级斗争和暴力土改，首先就要撕裂这种平和与稳定，用建立在谎言上的剥削理论和建立在刺刀上的血腥杀戮，双管齐下，煽起仇恨，屠杀无辜。笔者采访的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说：“批斗完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我记得最少杀了3个，最多的有20多个。杀完人后就上场演剧，永远只演一部剧——《穷人恨》。剧的内容有些象《白毛女》，讲地主、地主婆如何凶残，如何剥削压榨农民。”

（注：中共发动土改的程序一般是先“发动群众”、灌输“剥削压迫”理论，挑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然后才斗打和杀害地主。但是，也有一登场就大开杀戒的，如本书中记述的“先轰开，后深入”手法。所谓“先轰开”，就是一入村就把当地的地主和乡绅们抓来乱枪打死，在制造恐惧，杀人立威之后，再来“后深入”——发动群众搞土改。）

(2) 划分阶级成分。

土改根据中共1950年8月20日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划分阶级成分，共分为五种：

- a, 地主（二地主：其他成分兼地主，或地主兼其他成分）；
- b, 富农（半地主式的富农）；
- c, 中农；
- d, 贫农；
- e, 雇农、雇工。

（过程中伴随打、杀人）

划分阶级成分有几个特点：

一是随意性：如果没有地主，便矮子中选高子，把比大多数人富一点的划成地主（在川东很穷的巫溪县，曾把有两个以上煮饭鼎罐的人家划为地主）。甚至有小学教师（如本书中的冉德瑜和李曼）因为“教书就是不劳动，是剥削阶级”被农会划成地主。二是报复性：得罪过农会的人，被划为地主（或富农）。三是可怕性：被划为地富的人，除本人外，子子孙孙都要遭受长达几十年的残酷迫害。四是荒诞性：人为地制造等级，制造人间的不公。

关于划分阶级成分，《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一书在“错划阶级成分”一章中写道：

- a. 把占有土地量超过本地平均数量定为地主、富农。
- b. 用查三代、查历史的办法，把应定为中、贫农的定为地主、“破产地主”、“下坡地主”等。
- c. 把政治态度和思想列为划分成分的标准。（如曾是国民党员的，对新政权态度不好的就提升为地主、富农。）
- d. 乱打乱杀的极端现象十分严重。
- e. 破坏工商业。（38）

（注：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土改划成分不仅随意性很强，而且十分混乱，成分多达十几种，比如：地主就有恶霸地主、大地主、二地主、破产地主、漏网地主、工商业兼地主、地主兼工商业等；富农有自耕富农、佃富农等；中农有富裕中农、佃中农等；还有小土地出租、小土地经营、自耕贫农，小商小贩等等。）

（3）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财产

由农民协会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农民，发土地证。（过程中伴随打、杀人。同时还动员参军“抗美援朝”，川东忠县因此死亡 527 人，丰都县死亡 443 人——见该县县志。）

1950 年 6 月 30 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二条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即“五大财产”），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但是，在土改中，地主的粮食和房屋几乎全部被没收，而不是“多余”（本书对此有大量记录）。更可怕的是用极其残暴血腥的手段把“其他财产全部没收”（即所谓“浮财”——金银财宝）。整个土改中，最血腥、最残暴、最恐怖、最下流的现象就发生在这个阶段。土改也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的酷刑运动，仅川东地区我所了解到的酷刑种类即多达数十种。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犯罪，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纵观中共几十年的所作所为，能够看到它执政的一个大特点，那就是：他所说的同他所做的可以是刚好相反。（比如，它说它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土改中，为了给大开杀戒创造方便，中共将杀人的审批权下放到区乡，最草菅人命的现象就发生在下放杀人权的“人民法庭”；最充分执行的就是“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

（4）健全政权等

土改后期，一是土改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基层政权；二是进行复查（所谓复查就是又补划一些地主分子）。

（5）土改的成果（官方说法）

到 1952 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实行了土地改革。

- a, 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土地制度，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
- b, 使全国 3 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 7 亿亩土地、近 300 万头耕畜、近 4000 万件农具，以及 3800 万间房屋和 105 亿斤粮食；（仅第三期土改中，川东从地主的赔罚果实中每户贫雇农平均分得米 224 斤。）
- c, 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
- d, 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 e, 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 f, 摧毁了美蒋反动集团的社会基础。

4，土改为什么非要杀人？

“土改杀人，没得道理呀！土地要收就收吧，如果地主不干，要反抗，你再镇压、再杀人。不！不仅把土地、财产全部收缴，还要杀人！不仅杀地主，还要整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整几十年。世上没得这个道理。”——这是本书中一个被整了几十年的地主后代的“困惑”。

这也曾经是我的“困惑”。

和平手段本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如台湾土改），但中共弃而不用，非要杀人，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1956年9月):“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39〕

从刘的政治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非要搞血腥土改是有其“锦囊妙计”或者说“伟大韬略”的。

这个“伟大韬略”就是,中共希望借助土改达到其秘而不宣的目的。

有人说,唐吉科德臆想了一个风车敌人与之作战,共产党也臆想了一个地富敌人与之作战。这话不准确。地富究竟是不是凶恶魔鬼和仇敌,中共高层心里有数。以毛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有不少自身就出身于地富。毛泽东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亲口讲述过他父亲从贫农到中农到富农的发家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写到:毛泽东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40〕《刘少奇传》中说,刘少奇的曾祖父还很穷,是靠着勤劳能干,善于管理,才成为地主的。〔41〕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里叙述了她父亲家的发家史,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贫困,由于俭朴勤劳,慢慢攒起家业,到邓小平父亲时就是地主了。

〔42〕社科院杨奎松说:“地主都像我们书里写的那么坏吗?为什么我婆婆一点也不坏呢?……后来再看毛泽东、刘少奇,包括后来邓小平女儿等等谈自己地主富农家庭的回忆,发现他们多半也都对自己的父辈或祖辈没有恶感,而且都直言不讳地认为他们都是勤劳致富的。”〔43〕因此,中共非要把地富树为恶魔和仇敌打杀是另有原因。

中共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它需要塑造敌人,强化阶级仇恨,地主不幸被选中了。中共首先将地主彻底妖魔化,以激起仇恨,土改时,则借他们的人头达到自身邪恶的目的。

中共在夺权后,让前国统区人民对新政权尽快臣服和畏惧的“高招”是什么呢?

是杀人!

他们启动了打天下的法宝——暴力土改。

土改运动是与镇反运动同时进行的,杀人也是同时进行。毛泽东嫌杀人太少,1950年10月,他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再督

促各地要“大杀几批”。在毛泽东的强力推动下，杀人的枪声响彻了神州大地的城镇和山乡。

暴力土改，一箭三雕：

(1) 杀人立威。

陈沅森在《谈谈“土改”“杀地主”》一文中写道：“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44〕

我在采访中，不少人讲到了为了展示红色恐怖而杀人。比如，一位当年的目击者说：“枪毙李镇宇前有600多人联名来保他，说他不该杀。区土改工作团说，解放后他还有这么大的势力，解放前不知有多大的势力呀，杀！”

中共一来，把多年来在乡村中的头面和受尊重的人物一番斗打之后再一枪打死，这样便在很短的时间里，颠覆和改造了农村中传统的人际关系，让人害怕，从而树立起新政权的威风。

（在这一场杀人权下放到区乡的狂风暴雨式杀人运动中，大量无辜生命被祭献在土改血腥的祭坛上。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在极短的时间里被彻底改变。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变革中，暴风骤雨的枪声和腥风血雨的虐杀是它的显著特色。）

(2) 让农民双手沾血，从而紧跟党走。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大赞暴力流血的群众运动。中共通过这种发动群众用暴力抢夺土地的办法，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双手沾血的农民就只能跟着共产党走。毛泽东明确讲，要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毛泽东曾亲自指示说：“每到一处，必先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45〕

制造恐怖，有利于建立和巩固党的基层政权，让老百姓目睹恐怖和参与“恐怖活动”，使他们不得不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否则，他们也可能成为被镇压和被专政的对象。所以，土改不仅让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感恩，而且也害怕。

由此可见，这个“伟大韬略”其实很简单，就像黑社会为了胁迫人入伙，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他去杀人。身负人命，双手沾血之后，“入伙人”没有了退路，只得死心塌地跟他干。正如学者秦晖在《暴力搞土改是逼农民纳“投名状”》一文中所说：“要让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让你没有退路。”“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的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

他们就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刘少奇曾多次谈到为什么要搞血腥土改，如1947年4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要以复查（土地）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秦晖说，这种再三复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再找一点土地，而是再流点血，要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氛围，只有这样，高强度的动员扩兵才可以实现。（46）

（3），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让外来的马列主义登堂入室。

地主乡绅们大多是中国农村中有文化的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承者。谢幼田在《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中说：“他们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代表者，他们主导了中国社会以和谐、平衡、统一为基本特点的文化价值系统……他们根据儒家的文化精神遏制对财富的贪婪欲求，改进土地制度，使得中国社会能够基本保持稳定，使得乡村社会成为密不可分整体……”（47）中共要在中国广大农村一下子彻底铲除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道德观、是非观和价值观，远非易事。面对这个“难以解开的节”，中共采取了“快刀斩乱麻”——杀人！直接从肉体上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承者——地主乡绅，从而让那外来的“阶级斗争、暴力专政、消灭私有制”的“马列文化”占领中国的农村大地。

一方面杀人立威，一方面让你双手血淋淋地拿到土地，从而死心塌地“加帮入伙”，同时，把代表中国精英文化的地主士绅从肉体上斩草除根（城市里则是强迫“思想改造”），从而尽快让外来的马列主义登堂入室，这，就是中共非要搞暴力土改（也就是“杀人土改”）的全部奥秘。

共产党成功了，他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有的地方还没有两年），不仅一举废除了中国两千年的土地制度、消灭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颠覆和改造了农村中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是非观和道德观，而且迅速在广大的农村土地上建立起了他的基层政权。

5，中共的土地改革后果

不过，中共这种为控制和坐稳天下所使用的反天理反人性手段，虽一时得逞，但却产生了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201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列举了十大恶果：

（1），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

土改在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人

大多是有经营头脑，勤劳能干而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乡绅。

第一，地主大多都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就是当时乡村的文化精英。

第二，地主大多具有较好的道德素养，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受儒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熏陶。

第三，地主大多是农村中最有经济头脑而且善于经营的人。

第四，地主大多都是省吃俭用不事奢华的人。

(2)，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

土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暴力，在广大农村煽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仇恨和虐杀。中共为了自己打下天下坐天下的真实目的，以消灭剥削制度，解救劳苦大众为幌子，人为地制造仇恨，把人性中的恶疯狂地激发出来，中国乡村的和谐被破坏，维系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被彻底颠覆。恐怖开始像瘟疫一样四处泛滥，中国农村从此失去了田园牧歌式的宁静。土改所使用的那些暴力手段在随后的反“瞒产”、“四清”、“文革”等运动中反复出现。文革中湖南道县杀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补课”。土改之后的杀人风和种种残暴血腥，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操作方式，都是暴力土改的继续和重演。（包括后来残酷虐待法轮功学员的那些下流手段。）

(3)，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

土改前，农民以富为荣。土改后，富就是坏，是不仁。穷则成了一种资本（出身好）。这种价值观念的改变，破坏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人们不再（也不敢）辛勤耕耘，发家致富。

(4)，培养灌输了恩人和救星意识。

土改使贫苦农民不仅分得了土地和别人的财物（“胜利果实”），还被新政权当作依靠对象，因而使农民产生了强烈的“翻身感”，他们对新政权、对党和领袖充满感激。这就为树立起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在农民中大救星、大恩人的权威，为中共和毛泽东后来随意整治农民、折腾农村奠定了基础。（一个强大到可以随意给你一切的政权，也可以强大到随意夺走你的一切。所以后来合作社、人民公社，农民们不仅乖乖地把土地交出来，连私人的物品和自由耕种的权利也交了出来。因此可以说，土改形成了新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共通过土改，强化了对农民的控制力。）

(5)，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

革命行动。

农民们对本乡本土的地主是怎么发家的，他们是怎么挣得那些财产的，心里十分清楚。平白无故地去抢夺别人的财产只能是土匪。可是，中共却用谎言、暴力和利益引诱，发动农民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土匪行径。中共的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乱象埋下了隐患。

(6)，建立了恶质的乡村政权。

中共通过土改，摧毁了几千年来的传统社会基础，建立起一个由他严密控制的社会。土改利用一些“积极分子”——流氓无产者（大多是地痞、流氓、恶棍、懒汉等）——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冲杀在前。土改要造成一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但中国农村原本没有这种对立，大家乡里乡亲，不少地主与农民还沾亲带故，或者同宗同姓，要斗杀地主，农民们“革命积极性”不高，怎么办？毛泽东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就发现并大加赞扬了一种“革命先锋”，这就是：地痞流氓。这种流氓无产者都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冲杀在前，敢斗敢打敢杀，成为“革命的依靠对象”。在土改结束后，这批“积极分子”纷纷入党做官进入政权，成为了中共农村的基层干部。以前中国广大乡村没有党团组织和庞大的行政机构，中共借土改建立和健全了农村的党政组织，培养了一大批集权统治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从而把党的神经伸到了每一个偏僻山乡。而这个组织系统中的成员很多就是土改中涌现的这种“积极分子”。中国的乡村政权便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品质低劣的人手里。

(7)，摧毁了乡村的文化艺术。

一是烧书：

中国长期是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知识精英大多出自乡村（而且还往往“告老还乡”回归乡里），因此，中国乡村也是文化艺术的聚集之地。当年，不少地主家里都有多少不等的藏书和字画，土改时，这些书画也被抄缴。但是，农民协会和分“胜利果实”的“翻身农民”们，一心想要的是金银财宝，他们对诗书字画不感兴趣。另外，中共当局教育农民，地主之所以坏，就是因为读了这些封建毒物。因此，在杀掉地主乡绅的同时，大量民间藏书也被焚毁。比如川东忠县花桥乡土改农民将书画当柴烧，整整两月，将举人沈氏世代藏书烧完。又如利川大水井著名学士李孟洋的书画（包括不少珍本）被10个人专门焚烧，烧了半年才烧完。焚烧后的书灰被作为肥田的上等肥料。

二是毁物：

1949年之前，在中国乡村，有不少规模庞大而又古色古香的地主庄园。这

些庄园往往集建筑艺术、手工雕刻、传统民俗、儒家文化于一身。1949年土改之后，这些庄园不是灰飞烟灭就是被五马分尸。（本书的第五章中对此作了专门的记载。）

（8），人为制造等级，造成不公与欺压。

首先是不公：土改把人分成了地主、二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小土地出租、贫农、雇农等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人享受不同的政治、文化教育、招工就业等待遇。这种划分不仅缺乏合理性，而且随意性极大。第二是欺压：被划为贫、雇农的等级，被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不仅有优先享受政治待遇、文化教育、招工就业的权利，更有欺压（甚至虐杀——如文革时期）地富等级的特权。

（9），造成了一个庞大的不幸群体。

土改划分了阶级成分，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和他们的子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肉体上遭受了长达几十年的歧视和迫害。阶级成分论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本书对此有详尽的记述）

（10），把“杀人越货”赋予一种“崇高的革命性”。如：

- a，土改废除了反动的中国封建土地制；消灭了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 b，土改消除了贫富不均，让贫苦农民翻身作了主人。
- c，消除了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解放了生产力。
- d，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摧毁了美蒋反动集团的社会基础……

杀人越货如果已经不是一种犯罪而是一种由国家和政党推动的崇高的“革命行动”，那么，它一旦轰轰烈烈展开，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破坏之烈，远在一般的犯罪之上。实施者毫无心理障碍，受害者无法申冤叫屈。文革中红卫兵满怀激情地打砸抢抄（家），湖南道县贫下中农义愤填膺地屠杀地富反坏，都是这种把杀人越货当作崇高革命的恶行。

中共1949年当政后的许多恶行现在都已经多少得到了揭露和批判（如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但土改的“铁幕”还远远没有掀开，其“合法性”还“伟大、光荣、正确”地巍然挺立。今天，我们回头看去，中共的这种“崇高的革命性”全是一派谎言。如：中国农民现在“耕者有其田”了吗？中国农民现在翻身作了

主人了吗？土改之后，农村的生产力得到解放了吗？中国的贫富不均现在消除了吗？中国老百姓现在不再被欺压了吗？

6, 土改杀了多少人？

1950年底到1952年的土改运动是同镇反运动同时进行的，杀人也是同时进行。对地主和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关（押）、管（制）、杀”。关于这期间“关、管、杀”的总数，官方直到1989年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公布：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类反革命分子129万、管制123万，杀71万。（48）

不少学者不认同这个数字。

土改研究学者、《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的作者谢幼田认为，这是大大缩减的数字，他经过研究，认为“杀人数目至少是五百余万人。”（49）

曹长青在《中共杀人记录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一文中写道：“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在《中国的民主》一书中的数字：50年代初期，中国有二千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Death in Mao's China, 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至400万之间。”（50）

学者胡平在《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一文中写道：土改中一共杀了多少地主富农？保守的估计也在200万以上。（51）

历史学者、教授宋永毅在《重审毛泽东土地改革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一文中写道：“当年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到底有多少地主在残忍的暴力下死于非命？在时过境迁七十多年、而中共又严密封锁档案的情况下，比较准确地计算出受害的地主的人数是很困难的。但是，根据一些已经公开的官方的统计材料，做一些合理的推测还是可能的。”

宋永毅根据多种官方文件推算出，在三年的暴力土改中，中国所谓的地主阶级的非正常死亡（被杀和自杀）人数大约高达470万人。它应当是中共建政后所有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

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杨奎松说：“全国许多省份出现乱打乱杀的情况。后来毛泽东有过一个说法，他说中国有3600万地主，其中有400万地主是坏的，因此

在土改中杀了 100 万，关了 100 万，管制了 200 万。但实际上，整个土改以后，地主、富农连同其家属基本上都被管制了……。当年被管制的农村人口之多，恐怕也是 200 万的几倍吧。”〔52〕

我认为，中共在土改中究竟杀了多少地主和所谓的反革命，在中共各地的档案公开之前是很难有较准确的估计的。其实，即使有一天中共相关档案公开（如果没被有意销毁的话），也不是实际准确的数字，因为，当时有好些杀人根本就没有记载（自杀的更是不被公安关注和记录），比如，四川秀山县 1951 年 4 月在溶溪小学的一次杀人（杀了 12 人），公安档案中就没有任何记载。〔53〕

中共为了自己稳坐天下，据一切财富、资源、权力于自己一身，不惜冤杀数百万生灵，迫害数千万他们的子孙，并且至今还让他们背负着“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罪名，与此同时，他把自己打扮成“解放”众生的救世主。它一方面编造地主剥削压迫的理论、编造刘文彩《收租院》之类的罪恶，一方面实施剥削压迫的统治，在谎言的欺骗和暴政的淫威下进行疯狂的掠夺，这，就是中共统治几十年的历史真相。

（三）、土地财政，享乐天下的盛宴

一，“耕者有其田”，一个世纪的大骗局

多年来，中共把“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把自己抬到一个“普救众生”的道义高峰，在这个高峰，他君临天下、指点江山，气吞万里如虎。

他的确曾把从地主那儿抢来的田地分给了农民，农民也的确喜滋滋地领到了印有“大救星”毛泽东头像的土地证。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农民现在“耕者有其田”了吗？那一张珍贵的“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的土地证又在哪儿呢？

农民不会知道，就在他们领得土地证，甚至尚未领到手时，当局已经在制定收回全部土地的“社会主义宏伟蓝图”。1951 年 9 月 9 日，在土改仅仅进行了大半年时，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由毛泽东主持的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准备收回土地。他们更想不到，短短几年后，他们不仅将失去土地，而且将失去自家的耕牛、农具，失去迁徙、打工的自由，成为“人民公社”牢笼里的“共产农奴”。（当然，还有一个绝对想不到：他们中的几千万人将会从“共产农奴”变为冤死饿殍。）

他们的命运，其实早就注定了。因为，由苏共一手扶大的中共，它一定要重蹈苏共这个“奶妈”的复辙。

苏共在1930年初实行了强制合作化，农民在苏共的威胁下不得不加入集体农庄。“许多州提出这样的口号：‘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许多地方建立的不是集体农庄，而是公社，用强制办法把农民的全部小牲畜，家禽和自留地公有化了。”〔54〕

苏共和中共的革命目标之一是要消灭私有制，因此，他注定不可能让农民拥有土地，“耕者有其田”只是他打天下的手段（正如他当年高喊“民主”、“自由”一样），一旦大功告成，所有财产就要“归公”——归到自己手中。

苏共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中共强迫农民加入人民公社；苏联农民在集体化后两年（1932-1933年），饿死几百万，中国农民在公社化后两年（1959-1961年），饿死几千万；苏共在大饥荒后大搞“阶级斗争尖锐化”，抓、关、打、杀，腥风血雨，中共在大饥荒后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关、打、杀，血雨腥风；苏共要牺牲农民，榨取农民的血汗聚积发展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资源，中共要残酷剥削农民，以“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聚积发展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资源……

1951年离开中国的农业经济专家董时进是个天才预言家，当中国农民欢天喜地分田分地时，他就在《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一书中预言了中国农民在土改以后的悲惨命运。他指出，共产党搞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耕者有其田，而是要把土地收归国有，从而使它的政府变成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因此他在该书中写道：

共产党慷他人之慨，
聪明无比；
它把别人的田地和耕牛分配给农人，
博得他们一场欢喜；
……
分来分去，最后把一切都归了自己；
田地和耕牛收为国有，
农场变为集体，
农人都作了共产党的奴隶；
共产党聪明无比。〔55〕

中国农民的命运，在中共诞生的那一刻起，已经被注定了。

二，城市私有地，一夜变为国产

1958年，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后，土地便全部“集体化”了，农民手中的土地证成了一张废纸。那么城市的土地呢？1956年中央批转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已经有“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的条款。但是，以巍巍宪法明文抢劫土地是公元1982年。当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就这么短短的十一个字，一劳永逸地将城市的私有土地一夜间变为所谓的国有，而没有给公民的财产损失任何补偿。如此石破天惊的掠夺在任何国家和任何社会都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但在中国大地上，微波不兴，一片安宁。（也许，刚从文革血泊中走出来的民众觉得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

既然城市土地都是国有，那么，就想法把农民们“城镇化”，让他们彻底失去土地。过去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在毛泽东时代还可以算是生产队这个集体所有。邓小平时代搞“承包制”，把集体所有权剥夺了，改成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接下来，通过“城镇化”，中共又把使用权剥夺了。因为一旦“城镇化”，土地就国有化了，农民连土地使用权也没有了。中共热衷“城镇化”，就是要让土地成为党产，然后不断地卖土地。2010年，重庆市所有高校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村学生把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就是为了这种掠夺。另一方面，即使还未“城镇化”的土地，农民们也只有使用权，而一旦拥有所有权的党国要征用、倒卖土地时，其强征强拆便合法合理。学者东夫先生说：“这种掠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连前苏联都没做到。”

经过一次次的巧取豪夺，这样，当中共大搞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弟们“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时，中国的土地，无论城乡，已经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

三，卖田卖地，财源广进

学者熊飞俊在《中国在这里反思》一书中写道：特色中国的极端贫富悬殊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是“公有制”！因为“公有制”的本质就是“官有制”。公有制中国最大的富豪群体是官僚。当今中国最容易发大财的机会是“圈地炒地”。而“国有土地”的管理权、处置权和利益分配权掌握在“公有制”国家的各级官僚手中，所以，名义上的“国有土地”就演变成事实上的“官有土地”。（56）

1986年11月11日，历史学者辛灏年在武汉大学的讲演会上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就是中国层层统治集团中人最完美无缺的私有制！”

这些新时代的拥有对土地管理权、处置权和利益分配权的“地主”们，虽然官职大小不一，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姓），那就是，他们都姓“党”。

在一党独裁、国产等于党产的“党国”里，中共成了广袤土地上的唯一地主！他手中有地，心中不慌，轰轰烈烈启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土地开发”。

“开发”——卖地——财源滚滚的“土地财政”！

这几十年来，“党国”通过卖地收入了多少银子？

经济学家吴敬琏 2013 年 3 月 23 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过去几十年来，政府赚取土地差价至少 30 万亿。笔者所居住的重庆市，据市长黄奇帆披露，重庆卖地获利颇丰。2012 年重庆市全年的卖地收入为 897.5 亿元，“土地收入一般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1/3，是重要的第二财政。”〔57〕

“党国”以极低的价格，支付只有使用权的老百姓（你不干就强拆甚至关押、打死），然后以极高的天价再把土地卖出去。这个“天价”曾达到什么高度呢？看最新的数据：2013 年 9 月 4 日，北京卖东三环农展馆地块，收入 43.24 亿元，每平方米土地卖了逾 7.3 万元！（58）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当中国经济只剩下房地产时》（2013 年 9 月 16 日）一文中说：“北京上半年卖地收入已超千亿，比去年全年的 600 多亿还多好几百亿。”〔59〕

由此可见，“30 万亿”的价差正是“党国”卖地的一本万利。这个巨额价差的背后，是对农民以及城市拆迁居民的残酷掠夺。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学者李楯所说，巨大的收益和低廉的土地成本对比，显示出政府对公众的一种掠夺。

“党国”在卖地之外，还有巨额的税收。《今日财富》2013 年 3 月 20 日报道：据统计，仅针对房地产业征收的五大税种，其总收入从 2003 年的 900 多亿元，暴涨至 2012 年的 1.01 万亿元，增幅高达十倍有余。土地与税负成本占房价的 60% 左右。另据《第一财经日报》2013 年 10 月 12 日报导，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鲁桂华计算，房价中 61.33% 被中共政府以地价、税费的方式拿走了，13.03% 被银行以利息的方式拿走了，两者合计 74.36%，即政府和银行拿走了房价中的近 3/4。中共地方政府是高房价最大的受益者。

由此可见，老百姓挣得的血汗钱，大部分都流入“党国”这个中国唯一的大地主口袋中了。这是不是中共所宣扬多年的“地主的残酷剥削”？

用暴力将私有财产变为所谓的公有，然后又用权力将公有变为权贵们的私有，这两件伤天害理的绝活，都被号称要“解放劳苦大众”的“幽灵”干了。

“大地主”卖地暴发，于是，他宝马香车、锦衣玉食、小密二奶、儿孙移民……他不仅创造了世界一流的“三公消费”（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公费吃喝），而

且创造了世界一流的“维稳经费”（镇压百姓）。

一方面有钱享乐，一方面有钱维护这种享乐——土地财政，真是享乐天下的盛宴！

远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在卖地的银子哗哗入囊之时，强拆的悲嚎声声入耳。巨大的利润（差价）加上土地“党国所有”，中华大地上，强拆强征方兴未艾。

一方面，土地财政通过出卖土地养活庞大的地方政府官员；一方面，中共各级官员在卖地中大肆私饱中囊。（土地卖给谁，卖多少钱，完全由中共官员说了算。）原《百姓杂志》主编黄良天说，中共官员腐败，60%以上都与土地有关。

土地，这个中共权贵集团眼中的巨大摇钱树和聚宝盆，注定是中共层层官员们拼命要抢夺的资源。

巨大的利益让中共不惜与土地上的“主人”（“耕者有其田”）激烈对抗。中共官方杂志《半月谈》2013年10月14日刊文称，每年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达400万件左右。群体性上访事件60%与土地有关，土地纠纷上访占社会上访总量的40%。

被剥夺了土地和一切权利的老百姓唯有上访、自杀和被杀了。

不堪剥削无力抗争的唐福珍自焚跳楼了；

不堪压迫起而维权的钱云会“被车祸”了；

.....

行文至此，看窗外强拆强征正风腥雨烈，一如当年分田分地雨烈风腥。

这片承载了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土地，正经受着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几十年的“开发”后，资源耗尽、江河断流，草原枯萎、沙尘弥漫.....

几十年的“豪卖”后，大地母亲已经被卖得所剩无几（“大地主”也因此吃得脑满肠肥，捞得钵满盆溢）。

今后又卖什么？

不要紧，“党国”这个大地主早已未雨绸缪。

他卖出的土地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

也就是说，七十年后（大多已经没有七十年了），卖了的这块土地又将回归党的怀抱！

“红二代”、“红三代”、“红四代”的“革命接班人”们，到时手中有地，

心中不慌，子子孙孙不愁吃喝。

我从小饱受“要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教育，这一刻，我理解了这句话的深刻含意。

只是，几十年后，会不会又是一次暴风骤雨兼腥风血雨？

——这一片血红的土地啊！

2013年10月

注释：

- (1)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 (2) 《土地革命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 (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190页。
- (4) 杨奎松：《中共土改的若干问题》，大学论坛第53期，2011-06-03。
- (5)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 (6) 《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 (7) 谭松：《长寿湖》，（美）Trafford Publishing 2011年，第87页。
- (8) 路易斯·维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第47页。
- (9) 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台湾秀威资讯科技出版，2008年，第3页。
- (10) 《开放》杂志社，1996年。
- (11) 何东等：《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
- (12) 赵效民主编：《中国土地改革史（一九二一——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1990年。
- (13) 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 (14) 赵林，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视频讲课《西方文化概论》。
- (15) 冯天瑜：《封建社会再认识》，武汉大学学术研讨会，2006年10月14日。
- (16) 董时进：《我认识了共产党》，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见《致书毛氏劝阻土改》一章，第53页。
- (1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 (18) 同（2），见该书“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一章。
- (19) 《地主经济》，2013年，第15页。
- (20) 《北京之春》，2004年7月号。
- (21) 董时进：《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4-8页。

- (22) 选自“蒋祖权说历史”（网页已被删除）。
- (23) 谢幼田：《乡村社会的毁灭》明镜出版社，2010年，第116页。
- (24) 同(21)，第20-25页。
- (25) 同(21)，111-112页。
- (26)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香港集成图书公司出版，1963年，第151-152页。
- (27) 曹绵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江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5-26页。
- (28) 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第10—11页。
- (29) 赵黎、张兰：《解放初四川土地改革及其意义》，《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文化与历史）2003年第1期。
- (30) 同(28)第607页。
- (31) 同(28)，第11页。
- (32) 此数字来自笔者讲授《中外文化交流史》课程时借来的一本参考书，写此文时一时未找到该书。
- (33)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36-543页。
- (34)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194-195页。
- (35) 同(28)，第18页，第12页。
- (36) 董时进：《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序言，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
- (37) 同上。
- (38) 同(28)，第608页。
- (39) 原载1956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后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 (40)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 (41) 《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 (42) 《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 (43) 杨奎松：《中共土改的若干问题》，大学论坛第53期。
- (44) 《大参考》2005.03.17。
- (45)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1217页。
- (46) 《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
- (47) 同(23)，第228页。
- (48) 何理主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
- (49) 同(23)，详见该书“杀人比赛”一节。

(50) 香港《爭鳴》杂志，2001年7月號。

(51) 《北京之春》2004年12月号。

(52) 《中共土改的若干问题》，大学论坛第53期。

(53) 见本书“我两个父亲，同一天遇难”。

(54) 罗维奇·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8页。

(55) 同〔21〕，第69-70页。

(56) 自印书籍，第三七章：《“公有制”的本质就是“官有制”》，第314页。

(57) 《重庆土地生意》，《时代周报》，2013年3月22日

(58) 《北京新地王诞生 融创7.3万/平楼面价夺农展馆地块》，人民网，2013年9月6日。

(59) 英国《BBC》，2013年9月16日。

土改运动中的杀人和酷刑特性

谭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改运动是以国家名义开展的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的全国性大运动。这场运动极其残暴和极其血腥，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杀人，二是酷刑。因此，土改运动也是一个杀人运动和酷刑运动。我写下此文，是想对这场杀人和酷刑运动中的手段进行初步探讨，以揭示其残暴性、野蛮性、随意性、公开性、奇特性、下流性以及它所要达到的目的。

（一）杀人特性

一，大肆宣扬

中共土改运动中的大屠杀，有一个很显着的特点，就是把杀人现场布置得轰轰烈烈，热闹非凡。首先广泛动员，尽可能让四面八方的人都前来观看，人越多越好，学校则停课，全体师生列队前往。其次是组织文娱活动，如打腰鼓、扭秧歌、演唱（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演剧（当然是宣扬阶级斗争的内容，如《白毛女》、《穷人恨》之类）等，以此来吸引农民。还有就是组织啦啦队，像观看体育比赛一样，把杀人现场搞得热火朝天。此外，在杀人的场地和时间上也有讲究，尽量选择赶场人多的日子甚至传统节日（包括大年三十）和人来人往容易聚集的地方。至于杀人前山呼海啸般的口号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事先都有专门的安排。

当年纳粹在屠杀犹太人时，曾在通往毒气室的路上布满鲜花，空中播放着柔美的音乐。中共则是充分运用当地特色，敲锣打鼓，歌舞齐上，口号震天，啦啦队助威……

忠县老人阎宗裕说，枪毙人，各个地方的人要组织起来，举着旗帜敲锣打鼓去观看。1951年腊月30除夕日，她去参加枪毙地主陶华轩父子两的公审大会时，就是一路敲锣打鼓前往，公审的时候还搭了台子，像唱戏，锣鼓一阵阵地敲打，把杀人的过程搞得像赶喜庆的春节庙会。（1）

熊安明老人目睹过多次杀人，他说，杀人场面很热闹，银元贩子呀、一贯道呀、刀儿匠（土匪）呀、小偷扒手呀都当作反革命杀。他清楚记得在杀场上啦啦

队呼喊助威，当杀到“刀儿匠”时，啦啦队呼喊的口号是：“刀儿匠、刀儿匠，枪打不钻，刀杀不进？我才不信！”〔2〕

把文娱活动同血腥屠杀相结合，也是中共土改杀人运动的一个特色。比如组织儿童团的人在公判大会上表演骑“高脚马”（土家、苗寨的民间体育活动）。

二，杀人如麻

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犯罪，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纵观中共执政几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他所说的同他所做的可以是刚好相反。土改中，最草菅人命就发生在下放杀人权的“人民法庭”；最充分执行的就是“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

土改运动是与镇反运动同时进行的，杀人也是同时进行。在那之前，毛泽东嫌杀人太少，1950年10月，他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再督促各地要“大杀几批”，随后他又定下了杀人指标。在毛泽东的强力推动下，杀人的枪声响彻了全国城镇和山乡。

为了让杀人更便利更快捷，中共在土改中把杀人权下放到了区一级，一个区长就拥有定人生死的大权，而且，中共一再鼓励多杀。

土改时王光宪是忠县拔山镇的工作人员，忠县属于万县地区，万县地区的夏戎政委专程前来对他们指示：“宁可错杀一个，也不可放走一个。”于是，忠县也杀得血流成河。〔3〕

古昭永是奉节县吐祥镇的“翻身农民”，采访时他告诉笔者，当时他们那儿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漏掉一个”。〔4〕

张轩美是长寿县双龙乡人，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杀人是1951年5月1号。他们被学校组织前往观看。那次共枪杀了二百多人，他所在的双龙乡就杀了七十多人〔5〕

为了让农会和民兵们放手大杀、多杀，工作组还专门出台了一个政策：

杨通思土改时是秀山县石耶乡余庆村农会巡查大队长，面对大规模的杀人，他们最初心里不踏实，如果把人错杀了，追究刑事责任怎么办。为了让农会的人放手干，让民兵们放心杀，工作组出台了一个政策：叫做“错办（案）三、五百（件）不追究”。杨通思解释说，这就是说，如果杀错了，不追究你责任，错了就错了，杀了就杀了。〔6〕

（2018年12月29日，中共公安部发布新规，从2019年2月1日起，公安人员办案、执法造成损害将被免责，并受到全方位保护。这使人联想起土改时的作法。）

三，滥杀无辜

在这一场杀人权下放到区乡的狂风暴雨式杀人运动中，有大量无辜生命被虐杀。运动中屠杀的对象一是地主、乡绅，二是所谓“反革命”。这个“反革命”包罗万象：有旧政权的人员；有土匪、小偷；有中共划定的所谓封建组织“一贯道”、帮派组织“袍哥”；有无意中说过错了一句话的人；还有一字不识的农民……此外，也有不少为了侵占别人财产或妻女的杀人、公报私仇的杀人、为寻求（体验）刺激的杀人等等。

中共为了让那外来的“阶级斗争、暴力专政、消灭私有制”的马列文化占领中国的农村大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承者——地主乡绅，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手法。同时，在杀人运动中，中共对国民党政权留下的军政人员也采取了不分青红皂白的肉体灭绝。我在调查中发现，在旧政权当过乡长的几乎全部被杀，当过保长的绝大部分被杀。（本书中记录了大量滥杀无辜的案例。）

在调查中我了解到，虽然杀人权下放到区上，由区长或区委书记审批死刑，但实际上定人生死的权力往往在更下面的村农会，甚至是一个普通的农会干部。原因是，土改时在四川广大农村担任区一级领导的，大都是随军进入西南的“南下干部”（他们往往是军人，多数来自山西、山东），他们握有生杀大权，但却对当地情况不了解，农村地域广阔，杀人任务又急迫和繁重，他们哪儿有精力和时间去了解谁该杀谁不该杀？在上至毛泽东，下至各级领导都要从重从快大杀特杀的鞭策下，在每天都有各个乡村报上来的一串串杀人名单上，他们唯一做的就是打勾。在忠县，曾经发生过有几个地主和所谓反革命在一次屠杀中意外“刀下留人”的“喜剧”。事后一了解，原来是审批的区长晚上在一大摞报批名册上打勾时，因疲惫走神，翻页时翻夹了一页，于是漏掉了几个红勾，也就留下了几条生命。

四，草菅人命

前面说的杀人由区长批准，虽然大量冤杀，但总还算是有一个形式上的报批程序，在杀人运动中，还有许多根本没有任何报批手续的杀人，就是我们说的“就

地正法”。

例如本书中“错办（案）三、五百（件）不追究”一文中所记载的案例：杨通思说，土改工作团的领导告诉他们，对“现行反革命”抓住后不可以不经审讯，就地正法。什么是“现行反革命”呢？就是要破坏土改运动的人，如“投毒”的、“暗杀”的等等。如何认定呢？很简单，说你是你就是！一个叫田岩保的六十多岁农民就这样被“就地正法”。

忠县官坝区有一次枪毙 12 个人，同时拉了一些人来陪杀场，主持公审会的区长范远茂一声令下：“把他们拉下去枪毙！”行刑的民兵们便像拖猪一样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不料忙中出错，一阵枪声之后清点尸体，发现多了一个——原来把陪杀场的人误杀一个。范远茂说，这在当时不算什么，补一个手续就行了。他说的补手续就是写一张纸条，就这么轻松。（7）

曾经担任过土改工作队员的陈先生记录了他目睹的一次杀人：那天，在忠县西山公园开公审大会，要杀 15 个人，其中一个县中学的教师张国锦，罪名是参加过“一贯道”（当时定性为封建反动会道门）。张国锦不服，说他根本不知道一贯道，更没有参加过。他说，在场的人很多都认识他，只要有人看见他参加过或者看见他有相关活动，就站出来揭发。公审大会顿时一片寂静，有人开始议论，怎么没有一点证据就定人死罪呢。审判台上的县长陈杰，秘书范梓里等人有点慌了，此时此刻去哪里找证据呢？审判台于是临时决定，号召在场群众揭发张国锦另外的反革命罪行。在范梓里的示意下，一个叫谭祥云的教师揭发说，解放前他看见张国锦在十字街贴壁报，内容全部是反动的。另一个叫邓觉的人说，他曾看见张国锦在厕所解手时拿着一张解放前的报纸在看，已经解放了还在看解放前的报纸，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有了这两个“反革命证据”，张国锦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张国锦等 15 人遂被押往西山公园东侧的草坪枪毙。（8）

五，专杀有名望人士

在土改时，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头面人物，也就是有名望有威望的人士，这些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大多深得民心。可是，他们却成了杀人运动中被重点屠杀的对象，甚至一些帮助过共产党、对“革命”有功的人士也被杀害。

本书中的“枪毙啦枪毙啦”、“天灵盖上一枪及其他”、“一个土改民兵队长的述说”等对此都有记述。

中共专门要杀当地有名望的人士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震慑民众，建立自己的权威。他要让民众看到，你们眼中的头面人物或者德高望重的大善人在我的

权威下一文不值。另一方面，也让民众感到，他们的诉求也是一文不值（在要利用他们时例外），这个政权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百姓必须臣服。

六，红色恐怖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中共非要搞暴力土改，目的之一就是要杀人立威，通过血淋淋的屠杀来震慑民众，让人们对新政权恐惧，从而臣服在中共脚下。正因为如此，中共在屠杀时就要极力放大杀人的恐怖效应。我在采访调查中发现，为达此目的，它采取了如下手段：

- 1，广泛动员和组织最多的人前来观看（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
- 2，让屠杀现场尽量血腥恐怖。

镇反和土改时杀人，要把头打得越烂越好，这样才有更大的震慑力。四川人把这种打法叫作“敲砂罐”（砂罐的形状像人头，一棍子敲下去，砂罐就破成碎片）。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起源于土改杀人，但我知道川东土改杀人几乎全部都是“敲砂罐”。为了达到把整个头颅打碎的效果，行刑的民兵把子弹头磨薄，然后从后脑斜着射入，磨薄了的子弹在人的头颅里炸开，从而产生头骨破碎、鲜血飞溅、脑浆涂地的震慑效果。家属来收尸时，已经不能从面容上辨认死者。例如，原合川县龙市镇土改工作队员杨正秋说，一个叫任笃青的地主，被枪毙后只剩一点山羊胡子吊在下巴上，他的后人就是凭这点山羊胡子来认的尸。这种恐怖景象，自然收到了恐怖的效果，例如，忠县有一个叫熊安明的老人说，他几十年来，每当看到夕阳的血红，就不寒而栗，原因就是当年在“敲砂罐”时，溅起一大片血红，正好映对着西沉的夕阳。（9）

另外，在杀人前，有的地方把要杀的地主用铁丝穿进肉里或者锁骨里捆绑，把他们血淋淋地立在那儿让参加公审大会的农民观看，以增强恐怖效果。还有，一些主持公审大会的人，故意不说当天要杀谁，玩猫戏老鼠的“游戏”，以渲染恐怖气氛。四川省万源县井溪乡土改工作队干部汪金山说，他们把一群地主捆绑解押到会场来，要枪毙的人就在他们中间，但不说是谁。斗争会结束时，主持人把“斗争大会”的会标翻过来，背后就是事先写好的“某某人民法庭”几个大字，然后命令民兵去那一群地主里找要被枪毙的人。民兵拖出一个地主到台前，问：“是不是他？”主持人说：“不是！”民兵就又拖下一个，主持人又说：“不是。”这样反复好多次，让整个会场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恐怖。最后主持人才大叫一声：“就是他！”这些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恐怖，没有被杀的地主也吓得半死了。（10）

- 3，陪杀场。

在那场杀人运动中，中共大量使用了“陪杀场”的手段来制造和增强恐惧。陪杀场的人既有地主，也有地主的家属，甚至还有中共想要“敲打”、恐吓的人。

土改工作队员杨正秋说：“陪杀场被杀头还可怕，杀死了就算了，但陪杀场的人目睹和经历的一切会深深印在脑子里，可怕得很。”他的一个堂叔杨希伯就是陪杀场的当天就疯了。

在“我们夫妇的母亲都是自杀身亡的”一文中，卢国柄的岳母陈玉贞陪杀场后跳翠湖自杀。

在“那种日子，你一天都过不下来”一文中。梅景的母亲因陪杀场心脏严重受损，落下心痛病，不到一年便去世。

中共杀地主，为了让他们的子女恐惧，也对他们实施陪杀场。四川冕宁县的谢成陶有个同学叫朱万荣（当时16岁），他被夹在他爹妈中间被推上刑场，只听得“砰”、“砰”两枪，朱万荣的爹妈被打死了。但是没打朱万荣，杀了他爹妈后把他拖了回去。（11）

（当我提出想采访朱万荣时，谢成陶说，他不敢说。前不久他们搞冕宁的征文集，朱万荣不敢写，害怕。中共达到了杀其父母并让其子女永远恐惧的目的。）

4, 现代“满门抄斩”。

中国在皇权社会时，往往一人犯罪，诛其九族，或者说“满门抄斩”，这一点人们都了解。但是，对土改杀人运动中也使用过类似手段，人们不一定清楚。在采访时，我听到了不少把父子、兄弟、叔侄等同时杀害的案例。

例如，本书“一个敢怒敢骂地主后代的讲述”中记载的胡家四兄弟全部被枪杀。又如彭氏庄园里五兄弟也同时被枪杀。再如邛崃县冉义乡一个吴姓家族，土改时就杀了吴泽芝、吴志诚、吴福田、吴三素、吴世昌、吴必成、吴炳生、吴作成、吴仁安、吴庆华、吴纯一等十一人。

中共这样做，有斩草除根的目的，因为被同时杀害的人，并不是他本身有什么罪恶，而仅仅是因为他与被杀的人是父子或者兄弟关系。例如在四川天全县始阳镇，杀了一对父子徐福原和徐和新，父亲徐福原被作为“一贯道”枪毙，儿子徐和新是刘文辉24军的起义人员，农会的人不放心，找个借口把他抓来一同杀了。

枪毙进入高潮时，到处一片血腥恐怖，一些地主家的男性全部被杀光。川东石柱县一对父子临刑时，其父还留下诗句：“父子今朝同赴死，黄泉路上我不孤。”

与古时不同的是，土改时的这种“满门抄斩”主要针对男性（当然也有不少其配偶），但把他们的女儿一块“抄斩”的还少见，原因是土改时中共依靠那些“积极分子”们大多都是地痞流氓，他们留下这些地主的女儿作另一种“抄斩”——对她们的凌辱和折磨达到登峰造极！

5, 地痞流氓使用残暴手段。

在运动中利用（唆使）地痞流氓冲杀斗打是中共的一贯作法，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考查报告》中就盛赞了这种“革命先锋”。土改运动中中共把这种作法发扬光大，让地痞流氓冲杀在前。在杀人过程中他们更是表现突出，越是心狠手辣、越是突破人性底线，越是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党性”，也越容易受到提拔：入党、做官。

“我在几十年的恐怖中成长”一文中讲到地主小老婆胡正馨之死，几个行刑的民兵故意把削得很尖的、写有“恶霸地主胡正馨”的标牌从她后颈插入她肉中。胡正馨面色惨白，痛得已经走不到刑场，半路上躺在地上被民兵把枪插入她口中一枪打死。

又如，“抗日将领刘湘侄孙的悲喜人生”中的吴庆华之死。在枪毙他前，一个地痞在工作组的怂恿下，将吴庆华的后领子扯开，把通红的炭火从他颈子倒下去，炭火把吴庆华的后背烧得吱吱作响……。

6，暴尸示众。

中国曾有杀人后把头割下来悬在城门上示众的传统，土改时有的地方继承了传统。例如在酉阳县龙潭镇有一个叫张少清的乡绅，他的头被砍下后挂在龙潭中山公园的树上示众。

不过，土改时主要是枪杀，因此，普遍的作法是杀完人后，不准家属收尸，必须暴尸三天（有的更长）。中共这样做的目的一目了然，仍然是为了加大恐惧。由于杀人现场一般都选在人来人往或者人群集中的地方（甚至是学校的操场），因此这种现代版的“枭首示众”（实际上是“无头示众”——头已经被打爆）所起的震慑作用绝不亚于古时。笔者在采访时，不少人都谈到他们后来经过那个刑场（也是暴尸场）时的恐惧。

中共通过这些手段，成功地把恐惧植入了民众的心中，不仅是地主和其家属，那些分得土地和“胜利果实”的翻身农民们，在喜滋滋拿到土地证的同时，心中也产生了对这个新政权深深的恐惧感。他们看到，一旦成为这个政权的敌人，或者说被它认为是敌人，下场是多么可怕。在随后而来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集体化运动中，那些不仅失去土地，而且失去耕种自由、迁徙自由的农民是极其不满的，但是他们却不敢反抗，甚至在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中都鲜有铤而走险的抗争。为什么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土改时的残暴也把他们吓怕了。

七，不准同情

土改杀地主和所谓的反革命，不能流露出丝毫的同情与怜悯，土改工作队员、

民兵如此，贫下中农也如此，这是革命意志是否坚定、是否坚决跟党走着的考验。如果做不到心狠手辣，中共轻则将你清除，重则加以惩罚。

例如，为了检验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是否仇恨地主，不仅要她次次亲临杀人现场，还专门安排她在尸体旁边住宿。戴廷珍进出住地，必须从血淋淋的尸体中穿过，她害怕，路过时闭上了眼睛，结果被认为同情地主，阶级立场不稳，她因此没能入党。

忠县县大队有一个叫桂华的战士，在枪毙一个叫苏达三的地主时，因为同他相熟，便没有打爆他的头，而是用了锁喉枪（子弹从后颈入，咽喉出）。这次杀人之后，桂华便被逐出了县大队，原因是同情了地主，打得不狠，没有把地主的头打烂。（12）

另外，中共对地主的亲属也如此要求，否则他们也会大祸临头。

土改时刘培生是涪陵县中学的学生，枪杀他爷爷刘复亨的刑场就设在他就读的县中学里。他的一个好友提醒他，杀他爷爷时千万不能哭或露出悲伤，否则前途就全毁了。枪响时刘培生拼命隐忍，面无表情。专门观察他的人事后说他划清了阶级路线。

刘培生不敢露出悲伤还因为他亲眼目睹了一幕杀人。有一个地主被枪毙后，他妻子上去抱着丈夫的尸体哭，说：“共产党为什么要杀你呀？你一辈子没有做一点坏事……”刚杀完人，正离开刑场的民兵听见她的哭诉，马上返回。“你敢说共产党不该杀人？！”一枪就把她打死了。

八，奇特现象

在那场杀人运动中，还涌现出了一些让人“耳目一新”、记忆深刻的奇观。

1，乞丐抢卖尸体。

（见本书中“我在几十年的恐怖中成长”）

2，小学生前排就坐（组织小学生观看）。

中共的宣传教育，特别注重从娃娃抓起，土改杀人也不例外，每遇杀人，学校便停课，组织学生前往刑场，并被安排在前排观看，就像观看精彩的演出一样。小学生们也不仅仅是观看，他们要在老师的带领下反复高喊口号：如“打倒封建势力”、“坚决镇压反革命！”等等。当年亲临现场的小学生周成益（忠县退休教师）说，学生人数多，喊口号整齐，效果最好。（13）

让未成年人来观看这种血腥恐怖场面也是中共有意为之，他们也要把恐惧植入小孩的内心。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或社会用这种恐怖手段来培养下一代，但我了解到，中共又成功了。几十年后，当我采访这些当年的小学生时，他们一

提到那个场面，无一不露出极度的恐惧表情。

例如，1952年时，忠县甘井镇小学学生关德仁（9岁），曾被学校组织前往观看一个场面恐怖的屠杀。他不仅目睹了血腥屠杀，而且还看到有人把一个叫柳天香的脑浆挑了出来。几十年后，关德仁讲起那一幕时，几乎声嘶力竭。（14）

3，吃死者器官。

在杀人现场，有不少割、挖死者器官的现象。第一种是晚上有人对那些“暴尸示众”的尸体下手。见本书中“土改时，我曾写过杀人布告”一文。

第二种是当场割、挖死者器官。

这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割、挖之后拿回家吃。见本书中“我亲眼目睹开膛挖心”一文。第二种是当场吃。见本书中“一个敢怒敢骂地主后代的讲述”一文。

（二），酷刑特性

土改运动中，残暴野蛮是它的一个显着特征，从减租退押到划分成分、从批斗大会到分田分地、从追逼浮财到复查收尾，捆绑吊打、凌辱强奸贯穿了整个过程。其中，尤其是在追逼浮财这个阶段最为残暴和血腥。

浮财，主要指金银财宝。按照中共的土改政策，“浮财”原本不在收缴的范围内，因为中共1950年6月30号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这个“其他财产”主要就是“金银财宝”。前面我说过，纵观中共执政几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他所说的同他所做的可以是刚好相反。在土改运动中，不仅地主的“五大财产”（土地、耕畜、农具、粮食、房屋）全部被没收，而且“其他财产”也全部被收缴。

为什么说最残暴和最血腥就发生在收缴这个“其他财产”（即“浮财”）的阶段呢？原因是，“五大财产”是明摆着的，按物收缴就行了，而金银财宝地主可能隐藏起来，因此需要追逼。下面所讲的种种酷刑不少就发生在追逼金银这个阶段，而很多下流的酷刑也假借这个追逼发生。

一，品种繁多

土改中使用了大量酷刑，仅在川东地区就多达几十种，有的有专门的名字，有的叫不出名字，本书举了不少例子，如吊“鸭儿鳧水”、抬“穿心杠子”、苏秦背剑、“吊半边猪”、摸夜螺丝、吹土电扇、“点天灯”、“吃喱酒”、“背火背篋”、吊木脑壳、灌水葫芦等等。

这些千奇百怪的刑罚在土改时公开地四下交流，干部、民兵们互相学习，交流经验。遭受了几十种酷刑的幸存老地主李曼在接受采访时激愤地说：“当时发明一种整人的办法就给予奖励，这儿传到那儿，那儿传到这儿，到处传开。”

针对女性有许多专门的酷刑，我将在下面专门展示。

二，恐怖血腥

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这又是一个所说与所做刚好相反的“生动”展示。在土改中，中共明文严禁的“各种肉刑”在它统治下的广大农村遍地开花。这些肉刑（酷刑）的恐怖和残忍，已经突破了人性的底线，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极其丑恶的一笔。

例如本书“一个被摧折了‘阳根’的老地主”中所记录的种种血腥酷刑。

三，残暴下流

中共发动那场土改运动，在最充分地煽起了人性的残暴与贪婪之外，也最充分地展示了人性的邪恶与丑陋。在形形色色的酷刑中，有大量残暴和下流交织一体的刑罚。

本书中对此有大量案例

四，蹂躏女性

在中共发动的各类运动中，都有一批冲杀在前的所谓“积极分子”，土改运动也是如此。土改中的那些“积极分子”主要就是农村中的地痞、流氓和无赖。这种人以前在乡村都属于令人唾弃之辈（自然也很难找到女人）。当有一天他们突然被赋予可以任意作恶而又不受惩罚的权力（他们大多当了拥有执法权的民兵、农会干部）时，他们身上会迸发出多么可怕的兽性就可想而知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曾盛赞了地痞流氓的“革命性”，他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有这种“伟大领袖”与流氓地痞相结合的“革命”，土改怎么不遍地腥风血雨？这些由地痞流氓组成的“革命先锋”，突然拥有了可以对女人为所欲为的权力时，这场中共宣称的“伟大改革运动”会呈现出怎样的下流性和残忍性就可想而知了。

下面列出一些专门针对女性的刑罚（有些有专门的名称，有的叫不出名字）。

1, “钓美人鱼”。

将女人的长发扭成一股绳，用绳索打结后悬吊在梁上。这种刑罚很可能将受刑女性的头皮撕下。

针对女性乳房的折磨是土改民兵们干得最欢的事。

2, “吊称砣”。

脱光女人衣服，把两个沉甸甸的铁称砣用绳子栓在女人的两个乳头上，然后再推动女人，让悬挂在乳头上的铁称砣摇荡，从而给受刑者带来痛苦，给实施者带来刺激和快乐。（秀山县的胡祖暖老人目睹过一个18岁的刘姓姑娘在批斗大会上受此刑。云南保山的李存厚老人也目睹了这一酷刑，只是称砣改为砖头。段希文将军的弟媳因此被扯掉一个乳头。）

3, “吊乳头”。

“吊乳头”是川东土改时普遍使用的一种刑罚，用细麻绳捆住乳头，然后悬吊，受刑女性的乳头会被扯掉（如忠县的陈英女士）。忠县地主冉良臣被枪毙后，他的妻子被抓来斗打，在一百多人的会场上，冉妻被当众吊乳头，她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传到会场外很远的地方。（15）

4, “猪鬃毛戳乳头”。

猪鬃毛是猪背脊上长的比较粗和硬的长毛，用猪鬃毛从乳头的孔中戳进去折磨女人，也是川东地区土改中普遍使用的一种刑罚。

对女人下身的折磨更是土改积极分子们乐此不疲并且花样百出的“壮举”。举几例：

1, “烧飞机洞”。

“烧飞机洞”是把女人的衣服裤子脱光，双腿分开，点起木炭烧烤下身。在忠县拔山乡五星村由土改工作队干部冉泽民主持的斗争大会上，他把地主十多岁的女儿扒光裤子，双腿分开站在两个马凳（木工用具）上，用火烧她下身，参加大会的颜恩统亲眼目睹了这一幕。（16）

另一种是把女人的衣服裤子脱光，手脚绑起来，再往下身插一根粗大的点燃的蜡烛，直到把蜡烛烧完。忠县拔山镇花桥乡乡绅沈家的女人差不多都受过这种刑法。沈修五17岁的女儿沈瑚珊受不了这种酷刑（还有下面提到的包谷球球插下身），半夜逃亡，不幸被抓，她跳塘自杀。（17）

2, “包谷球球”。

川东土改中，还普遍使用了一种手段折磨女人，这就是用“包谷球球”插入女人的阴道反复捅和转动。“包谷球球”就是脱粒后粗糙不堪的包谷棒棒。

3, 裤裆里放动物。

将蛇或者黄鳝、螃蟹、猫、老鼠等塞进女人的裤裆，让动物在女人下身乱钻乱咬也是土改中针对女人普遍使用的刑罚。据说，这种酷刑原是老“解放区”土改时的发明，到了四川又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行刑者把动物放进女人裤裆后，扎紧裤管，再用树条抽打，猫或老鼠便乱抓乱咬，蛇或黄鳝，都是钻洞，就往上面钻入阴道。

4, 用铁条（或竹条、木棍）插入阴道。

由于土改中的那些“积极分子”大都是地痞流氓，因此，他们在折磨女人时，并不仅仅满足于强奸和轮奸，他们还要用种种下流而残忍的手法摧残女人，其中一个常用的手法就是用铁条（或竹条、木棍）插入女人阴道往里捅。一些受刑女性就是死于这种折磨。如本书中记录的地主女儿胡秀华和地主小老婆“黄姑娘”。

五, 公开展示

同土改杀人时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前往观看一样，上述的种种下流和酷刑（除了强奸和轮奸），当年都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大会上公开上演，土改工作队、农民协会还要强迫人们前去观看（连受辱者的子女都必须到现场观看）。这些作恶者没有丝毫的羞耻感和罪恶感，除了土改工作队的人要显示仇恨地主的“革命性”、“党性”，土改“积极分子”中不少人本身就是毫无道德底线的地痞流氓之外，还因为鼓励煽动他们的中共当局把这种行为当作打灭地主威风的“革命行动”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地主乡绅的尊严，毁灭人性，让人们臣服于邪恶。

试举两例：

1, “看风景”。

在忠县拔山乡龙凤村，有一个姓刘的地主，他的一个儿子在重庆工作，娶了个城里的姑娘。土改时，结婚只有几个月的儿子和儿媳被押回龙凤村斗争。那些民兵和农会干部们，从来没见过重庆大城市的太太小姐脱光了是什么模样，都想见识一下，土改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一幕：

斗争会上，民兵们把刘地主儿媳的衣服裤子脱光，推到一张八仙桌上，让她坐在一条高凳子上，双腿大大张开，然后强迫她岳父趴在大桌子上，头就在他儿媳的两腿之间，眼睛要目不转睛地把她阴道盯着，转了眼就要把他往死里打……（此外还有当众强迫公公去舔儿媳阴户的下流手段等。）〔18〕

2, “摸洋钱”。

老地主李曼曾提到土改民兵去李先昭女儿的阴道里挖金子。这种下流有一个名称叫作“摸洋钱”。忠县土改工作队干部冉泽民特别喜欢折磨年轻女人，在追

逼金银财宝时，他说，地主李 XX 还有银元没有交出来，藏在他女儿的阴道里，于是他把李地主才才 15 岁的女儿拉出来坐在一张大桌子上，当众强行脱光她的裤子，分开两腿，说洋钱（银元）就藏在她的阴道里，强迫她父亲去摸出来。会场上众人观看了这一幕，以至这位不幸的女孩后来一直嫁不出去。（19）

当年公开上演的这一幕现在已经消隐在岁月的流逝、特别是人为的封杀中，后来者也许难以相信。但是，它的确真实地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那场运动中。

总结：最大化地制造恐怖

中共土改时的大屠杀，自然是要对地主乡绅和所谓反革命进行肉体消灭，但是，在屠杀过程中所使用的这些手段，它所呈现出的公开性、随意性、残暴性、奇特性等，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最大化地制造恐怖，要让那些活着的人对这个刚刚登场的红色政权心怀恐惧从而服服帖帖不敢反抗。

那些残酷血腥的酷刑，自然是要追逼金银财宝，但是，这些酷刑在公开场所（往往是在人数众多的批斗或公审大会上）公然实施，也是有同样的目的——让人恐惧——在目睹血肉横飞，惨叫声声的酷刑时不寒而栗。

中共达到了他的目的。

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使用这种反天理反人性的极端方式，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把恐惧深深地植入了民众的心中。别说当时，就是几十年后的现在也是这样。我在采访中，不仅地主后代们不敢公开谈论那段历史，连一般的亲历者都害怕讲述他们当年的目睹。他们担心中共会因此迫害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还有，在我采访的五十多个地主后代中，只有一人（已经是第三代）表示了“清算”和索赔意愿，其他的大多数甚至连控诉的胆量都没有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到这种“杀人立威”的效果：土改后短短几年，农民就被强迫加入合作社、人民公社，甚至在大饥荒时还饿死了几千万。但是，农民们却鲜有反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改时中共的铁血手段也把他们吓坏了。

我在《长寿湖》一书的后记中说：“共产党在这 50 多年来最‘伟大’的治国韬略之一就是：它成功地把一张铺天盖地的恐怖大网严严实实地笼罩在神州大地上，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久而久之，外在的恐惧幽灵内化为奴性的行为自觉。”

而这种恐惧，首先就来自六十多年前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那场血腥残暴的土改运动。

注释：

(1) 讲述人：阎宗裕（女），1931年生，忠县城关镇人，采访时间：2006年9月22日；地点：忠县香山宾馆。

(2) 讲述人：熊安明，1932年生，忠县甘井乡右溪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1月15日；地点：忠县乐天路一巷。

(3) 讲述人：王光宪，1930年生，忠县拔山镇人，采访时间：2008年1月17日；地点：忠县东坡路县园艺场。

(4) 见本书“一个当年地主放牛娃的讲述”。

(5) 见本书“土改复查——从中农到地主”。

(6) 见本书“错办（案）三、五百（件）不追究”。

(7) 虞廷：《恐怖年代回忆之一——枪毙》，《黄花岗杂志》2008年第7期。

(8) 同（7）

(9) 同（2）。

(10) 讲述人：汪金山，1925年生，万源县旧院镇龙潭村人。

(11) 见本书“我在几十年的恐怖中成长”。

(12) 同（2）。

(13) 讲述人：周成益，1940年生，忠县人。

(14) 见本书“枪毙啦枪毙啦”。

(15) 讲述人：郭亚卿（女）四川汉中人，大约1922年生，采访时间：2008年1月17日；地点：忠县乐天路

(16) 见本书“这是人做的事吗”

(17) 讲述人：毛世麒，忠县花桥乡人，1947年生，采访时间：2008年8月4日；地点：重庆市渝中区春森路

讲述人：沈瑚琳（女）忠县花桥乡人，1941年生，采访时间：2008年8月6日；地点：忠县花桥乡沈瑚琳家

(18) 同（17）

(19) 同（3）

无声的冤魂

——本书记述的死难者名单

我不知道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在 1949 年中共当权后“非正常死亡”；我也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人死于土改“有组织的虐杀”。不过，透过本书所采访的受害者和亲历者，我知道，就在很小很小的范围内，当年就有以下有名有姓的人遇害（包括朋友撤走篇章中的遇难名单）：

彭达楠（枪杀）	彭达杞（枪杀）	彭达桑（枪杀）	彭达渠（枪杀）
彭达操（枪杀）	彭绍文（枪杀）	彭寿柏（枪杀）	黄世英（整死）
彭河生（枪杀）	彭叔康（整死）	涂延桂（自杀）	陈一村（枪杀）
陈德宽（枪杀）	陈德厚（枪杀）	陈德宣（枪杀）	陈世屏（枪杀）
陈希颐（整死）	李蔚廷（枪杀）	刘温贤（枪杀）	李询堯（自杀）
李盖五（烧死）	李汶舟（枪杀）	李鸿钧（枪杀）	李沛东（枪杀）
李沛诚（枪杀）	李孟洋（斗死）	王石泉（枪杀）	王万木（枪杀）
王在新（枪杀）	陈俊峰（枪杀）	周定芬（枪杀）	颜桂轩（卡死）
韩茂生（枪杀）	张仁强亲戚（枪杀）	朱耀庭（自杀）	陶华轩（枪杀）
颜恩统之父（打死）	陶馥轩（枪杀）	陶华轩侄子（枪杀）	倪氏（自杀）
范氏（自杀）	熊德超（自杀）	熊实之（烤死）	熊昌明（自杀）
吴泽山（枪杀）	熊德国（自杀）	傅良臣（枪杀）	傅良臣之女（自杀）
彭善庆之妻（自杀）	李镇宇（枪杀）	杨天香（枪杀）	冯国翠（整死）
熊异能（打死）	熊异能之母（打死）	杨泽勋（枪杀）	冉德瑜之女（饿死）
谢锡九（自杀）	黄本立（自杀）	李淑兰（自杀）	黎定镐（枪杀）
何瓚（枪杀）	郑度之（枪杀）	卢增辉（枪杀）	陈子明（枪杀）
黎定武（枪杀）	黎琼瑶（整死）	黎华举（自杀）	黎心安（枪杀）
黎华敬（枪杀）	刘玉章（吓死）	刘玉双（枪杀）	刘玉双之妻（枪杀）
甘世伯（枪杀）	刘仁山（枪杀）	王润民（自杀）	刘丹贵（枪杀）
刘丹阳（枪杀）	周相乡（饿死）	魏廉周（枪杀）	魏律民（整死）
魏律民之妻（自杀）	朱化成（整死）	柳启厚之母（打死）	柳直武（整死）
王汉章（自杀）	王汉章之妻（自杀）	梁露仙（枪杀）	梁露仙之女（整死）

伯永梁（枪杀）	朱惠卿（枪杀）	梁文华（轮奸致死）	罗广瀛（枪杀）
刘春长之父（自杀）	刘祖宣（枪杀）	刘雨涛之母（自杀）	梁树棻（枪杀）
马仁庵之妻（自杀）	吴泽山（枪杀）	吴泽山之妻（打死）	杨星五（打死）
杨星五之妻（自杀）	杨鹤（自杀）	张大柱（枪杀）	孙达 X（枪杀）
周德浩（自杀）	张国锦（枪杀）	马剑秋（枪杀）	秦月浦（自杀）
赵西千（枪杀）	冯启全（枪杀）	高化东（枪杀）	石大军（枪杀）
赵洪儒（枪杀）	赵洪烈（枪杀）	贾欲雄（枪杀）	江远璋（枪杀）
胡德武（枪杀）	曾长天之妻（打死）	曾朝定（打死）	吴持恒（枪杀）
邓必夏（枪杀）	宁惠溥（枪杀）	宁子敬（枪杀）	刘昂然（枪杀）
刘集云（枪杀）	汪金文（枪杀）	张其山（枪杀）	谭克昌（枪杀）
吴善之（枪杀）	赵泽之（枪杀）	廖代兴（枪杀）	吴廉生（枪杀）
张二老荐（枪杀）	张书毓（枪杀）	罗精益（枪杀）	张民用（枪杀）
吴际才（枪杀）	吴宇辉（自杀）	徐衡山（自杀）	胡益业（自杀）
曹尽成（枪杀）	张尽如（枪杀）	高占田（枪杀）	杨光宝（枪杀）
肖达辉（枪杀）	王永涛（整死）	谭迅如（枪杀）	谭尧（枪杀）
冯宗山（自杀）	贺启坤（整死）	刘志齐（枪杀）	陈太侯（枪杀）
雷夏电（枪杀）	“魏到”（自杀）	陈月轩（枪杀）	颜海清（自杀）
周德益（枪杀）	韩孟生（枪杀）	黄仲举（枪杀）	骆云峰（枪杀）
陈俊峰（枪杀）	王海明（枪杀）	邱宏安（枪杀）	郭达旦（枪杀）
杨世君（自杀）	邱必坚（枪杀）	杨永青（枪杀）	刘顺清（枪杀）
肖方炳（枪杀）	何光超（枪杀）	赖能中（枪杀）	张世春（枪杀）
黄明礼（枪杀）	刘继直（枪杀）	刘复亨（枪杀）	胡耀英（饿死）
钟季卿（自杀）	胡秀华（强奸致死）	成正安（枪杀）	成正安之妻（自杀）
成守义（吊死）	成从仁（打死）	施仲渝（枪杀）	施伦（枪杀）
施祖光之父（枪杀）	王德清（饿死）	熊朝刚（自杀）	熊建成外婆（自杀）
赵成章（枪杀）	刘自然（枪杀）	罗玉池（枪杀）	罗玉池之妻（整死）
曾四（打死）	李伯融（枪杀）	李隆熙（饿死）	冯国祺（枪杀）
何顺贤（整死）	冯光和（饿死）	冯光和之女（饿死）	陈德珍（自杀）
苏达三（枪杀）	曹新煌（枪杀）	周康杰祖母（打死）	冉崇惠（打死）
沈士骝（整死）	沈联峙（饿死）	沈联军（打死）	吴庆蓉（饿死）
梁文熙外婆（饿死）	梁大刚（整死）	秦士淮（饿死）	莫树堂（自杀）
陈英（打死）	谢时宽（打死）	寇向文（饿死）	谢启善（自杀）
冯立朝（骇死）	李立纲（枪杀）	陈玉贞（自杀）	杨琼英（自杀）
卢邦纯（整死）	段 X X（枪杀）	肖正静（自杀）	黎大雪（自杀）

吴之阳（枪杀）	何克强（枪杀）	罗连山（自杀）	罗连山之妻（自杀）
谭 X 宽（枪杀）	罗建阳（枪杀）	刘管事（自杀）	刘管事之子（自杀）
石大英（枪杀）	傅光忠之父（自杀）	“疤三”（枪杀）	谭宜胜（枪杀）
陈大脚板（枪杀）	陈华轩（枪杀）	周有烈（枪杀）	杨仲华（整死）
刘世伦（迫害致死）	陈贵伟（迫害致死）	陈启贤（整死）	刘元明（饿死）
柳兴忠之妹 1（饿死）	柳兴忠之妹 2（饿死）	张继蹇（整死）	张立夫（枪杀）
李育滋（枪杀）	张绍伯（自杀）	张绍伯之妻（自杀）	张森楷（自杀）
张庭楷（自杀）	陈出新小娘（自杀）	吴仁安（枪杀）	吴庆华（枪杀）
吴纯一（枪杀）	吴泽芝（枪杀）	吴志诚（枪杀）	吴福田（枪杀）
吴三素（枪杀）	吴世昌（枪杀）	吴必成（枪杀）	吴炳生（枪杀）
吴作成（枪杀）	刘秀容（自杀）	吴杨氏（自杀）	吴素华（整死）
吴俊成（饿死）	刘世泽（饿死）	刘世泽之妻（饿死）	吴世伦（自杀）
龚泽浦（枪杀）	张伯函（枪杀）	吴华廷（枪杀）	曾道成（枪杀）
江聚原（枪杀）	丁尔康（枪杀）	唐绍林（枪杀）	唐绍林之子（枪杀）
戴纪奎（枪杀）	戴廷珍岳父（自杀）	谢文丹（枪杀）	胡从德（自杀）
胡正馨（枪杀）	谢成陶的姑祖（整死）	谢云芳（自杀）	邓宇雄（枪杀）
李明善（枪杀）	余选道（枪杀）	曹晓亭（枪杀）	邓宇俊（枪杀）
户锦堂（枪杀）	陈蕴山（枪杀）	邓 佳（枪杀）	郑胄平之妻（自杀）
焦东山（饿死）	刘家锐（枪杀）	胡裕发（饿死）	余晓放（枪杀）
韩树凡（枪杀）	黄云成（枪杀）	张学忠（逃亡遇难）	张姚氏（自杀）
么太太（打死）	二太太（迫害致死）	陈德木的妈（自杀）	陈林表（自杀）
陈胡氏（自杀）	夏云方（饿死）	邬筱藩（枪杀）	邬锡荣（枪杀）
邬柏氏（打死）	邬百僚（枪杀）	邬月丹（枪杀）	邬秉文（枪杀）
邬仲明（枪杀）	邬锡雅（枪杀）	邬子赤（枪杀）	邬孟生（枪杀）
邬辑光（枪杀）	邬河光（枪杀）	邬锡纯（枪杀）	刘元贵（劳改而死）
刘世伟（绳索勒死）	刘世伟之妻（斧头劈死）	刘世伟之子（两人，斧头劈死）	
高成武（枪杀）	徐福原（枪杀）	胡钟氏（自杀）	李载承（整死）
李先昭的三个女儿（轮奸迫害而死）		徐和新（枪杀）	毕光奎（枪杀）
李先昭（整死）	胡 祥（枪杀）	唐和玉（自杀）	李怀清（烧死）
李先 X（轮奸致死）	黄 锜（枪杀）	李斗寅（整死）	柏 联（整死）
李先藩（枪杀）	李伯清（整死）	王大湜（整死）	陈文昭（枪杀）
陈叔伦（整死）	沈联福（饿死）	郑少鼎（枪杀）	彭氏母子（整死）
李元舟（枪杀）	沈联平（饿死）	李鸿钧（枪杀）	李宗列（整死）
李先佐（自杀）	王必辉（整死）	沈联泰（饿死）	李盛榭妻（整死）

陈克益（枪杀）	李先贵（打死）	陈光武（枪杀）	杨希伯（枪杀）
任笃青（枪杀）	杨正秋两个舅公（自杀）	吴肇修（枪杀）	吴龙文（枪杀）
胡光楣（枪杀）	鲁柏林（枪杀）	敖传禄（枪杀）	田家乐（枪杀）
杨友琴（枪杀）	杨登云（枪杀）	胡传宗（枪杀）	胡署东（枪杀）
鲁世义（枪杀）	孙志禄（枪杀）	王仲清（枪杀）	杨欣然（枪杀）
胡光爵（枪杀）	鲁晋权（枪杀）	敖海门（枪杀）	张裕龙（枪杀）
田岩保（枪杀）	杨欣然父母（自杀）	胡光伦（枪杀）	鲁映辉（枪杀）
敖朗然（枪杀）	陈进国（枪杀）	杨继川（枪杀）	董志高（枪杀）
杨举柏（枪杀）	刘武祥（枪杀）	刘启良（枪杀）	杨云（枪杀）
黄存孝（枪杀）	陈国芝（枪杀）	辛跃廷（枪杀）	吴可达（枪杀）
吴可达之父（枪杀）	何勋臣（枪杀）	吴甫仁（枪杀）	郑云（枪杀）
杨保珍（枪杀）	陈老谦（枪杀）	王志纯（枪杀）	王志武（枪杀）
胡蒙元（枪杀）	鲁世洋（枪杀）	鲁世俊（枪杀）	鲁世蒸（枪杀）
鲁世荫（枪杀）	鲁世全（枪杀）	鲁泽乡（枪杀）	杨习候（枪杀）
杨吉云（枪杀）	王佛生（枪杀）	李月秋（自杀）	李胡氏（自杀）
洪老四（自杀）	陈淑清（自杀）	吴蒲柳（饿死）	吴世奇（饿死）
杨正安（打死）	刘克雄（自杀）	鲁晋权妻子（自杀）	鲁符文之女（饿死）
鲁晋权之女（两人，饿死）	李怀庆大姐（吓死）	李裕昆管家（自杀）	
李曾氏（自杀）	任福成（打死）	任达荣（枪杀）	任明俊二婶（自杀）
向单兵（枪杀）	向华斋（枪杀）	胡喜贤（枪杀）	刘元塘之妻（自杀）
张少清（砍头）	张书行（斗死）	徐国武（枪杀）	梅景母亲（整死）
梅景姑父（枪杀）	李存厚表哥的父亲（枪杀）	李存厚叔叔（枪杀）	
李存厚外公（枪杀）	徐学成母亲（毒蛇咬死）		

以上共计 453 人

其中枪杀 261 人；自杀 77 人；饿死 26 人（不包括大饥荒饿死的）；其他 89 人（包括打死、整死、卡死、烤死、摔死、骇死、斗死、吊死、强奸致死、迫害致死等）。

此外，下列 17 人被整残、逼疯或失踪：

冯光珍（烧烤致残）	彭吉征（烧烤致残）	何代群（打残）	周则林（整残）
周武灿（打残）	李曼（整残）	李春容（打残）	陈德宗（入狱失踪）
陈德章（打残）	陈渊明（入狱失踪）	杨天清（死因不详）	白 X 秀（打残）
梁文熙妹妹（失踪）	梁文熙弟弟（失踪）	莫益华（失踪）	李廷贞（逼疯）
刘世海（逼疯、失踪）			

注：由于土改已经过去了60多年，讲述者又大多是70多岁甚至8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提供的姓名中也许有拼写或记忆的失误，但这并不影响我写下这句话——

——让这些无声的名字，在民族苦难的记忆里燃烧！

